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

[美] 柯文 著

雷颐 罗检秋 译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aul A. Cohen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

［美］柯文 著
雷颐 罗检秋 译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aul A. Cohen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作者:[美]柯文

译者:雷颐 罗检秋

ISBN:978750866397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中文版序言

我的王韬传要出中文版了，这使我深感荣幸。然而，此书原文的出版毕竟距今已有近20年了，而书籍并非美酒，不一定愈陈愈醇。所以我觉得眼下重提此书时，有必要做某些分辩。

使这样做显得合乎情理的原因之一，与这部专著（共9章）的前8章所探讨的对象——王韬本人有关。王韬是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以及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虽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韬传记印行于世，注 但该书作者却未能接触到我所查阅过的某些英文史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由于这些史料对了解王韬生平中许多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重要方面——他去世的日期、他皈依基督教的实质、他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大有裨益，故此这些信息对中国读者似乎更有用处。

除此之外，在原书的最后一章，我力图探讨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它们关系到19—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虽说倘若今天重写此章，我会在结构上做部分调整，但这些问题本身对我来说却与20年前同样重要。的确，可以雄辩地说，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毛泽东之后“四个现代化”的领导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对外来影响已日渐开放，遂使这些问题比以前更加凸显出来了。

我先概述一下本书末章的主要内容，然后再说明若让我重写此章，我可能会做哪些修订。我所使用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前提：第一，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第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可被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第三，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在努力阐明沿海地区于晚清作为改革启动者的诸方面之后，我在这结论性的一章中从写个人传记转而写集体传记，探讨了12位开拓者的经历，其中8人（包括王韬）与沿海文化密切相关，而其余4人则是中国内陆的产物。

当初，我便公开承认这一构架“本质上是尝试和探索性的”，并对之做了许多限定。但直到我能使自己与此书保持一定距离以后，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了它的瑕玷所在，以及补救之方。我要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换句话说，我把变革过分地等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过分地等同于上述三个忽视或贬低了内在变化的论断；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即本书所谓“合法化”，又极易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中国化”（或反西方化）；最后，我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对变革的阻碍，而几乎只盯住了精神、文化和心理的蔽障。

当然，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会保留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我将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等，而更要紧的是，我将费点儿笔墨来说明——对这种变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在合法化外来变革时所产生的问题有何不同。例如，冯桂芬提出的改革中国地方政府的深远主张，主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受到了内生的刺激；在把这种主张融入19世纪60—80年代的中国世界时，其遇到的障碍可以说不亚于王韬之流在努力改革时所面临的障碍。[注]但就王韬的情况而言，由于他的改革方案有那么多都反映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碍本质上更多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而冯桂芬的障碍则更多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更充分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与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本土的“被动变革”不同），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使这种作用不大容易被说错。例如，重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在若干处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曾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如果不是统统）归结于“西方的挑战”。除了从目前的观点出发我将尽力避开“挑战”这一术语外（因为它太基于主观的价值偏好），我还要在此指出更基本的一点，即中国所推行的受西方启示的变革（开始是在技术领域，但最终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常常被论证为一种防范战略，以阻挠部分或完全源于本土的更为根本——因此也更具威胁性——的变革，而且当改革的提倡者为政府成员或社会精英时，尤其如此。换句话说，与西方有关的变化在特定环境下亦能与中国社会中本质上较为保守的力量联合。

所以，并非仅因其受西方启发，就能保证它必然具备更为“激进”“根本”或“威胁体制的”品格。

最后，也许从我刚才的几点陈述来看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如果现在重写此书的最后一章，我将不会如此匆忙地否认沿海地区在20世纪后半叶仍是中国革新的主要源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策倾向的主要特点已经是向外部世界开放，而且其速度之快是在70年代初完成此书时难以想象的。虽不能说近年涌入中国的外来影响全都由沿海输入，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这样，而且就对受外来启发的变革的接受性和容纳性而言，在上海、天津、广州这类沿海贸易集散地与辽阔的中国内陆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反差。

由于同一原因，在毛泽东之后的岁月里，整合与接受由外来专利（尤其是西方专利）所引起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仍然受到一贯的重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和自足性的特有感情，仍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力量。

虽说——而且部分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到了所有外来影响的冲击，深深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库仍在放水，而且在中国辽阔的内陆地区和官僚部门，尤其是在形势危机时水流特别湍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不确定的“中国的”标准，外来观念可与之协商，但却不易与之聚合；同样，它还使深受外来观念影响的人在更为广阔的中华世界中居于极端边缘和十分脆弱的地位。虽然这些受西方影响的个人的实际观念与一个世纪前的改革开拓者差别极大，但他们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诸如使自己在中国社会合法化，及他们的某些思想倾向合法化，仍使人想起王韬及其同时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后一部分所探讨的主题无论多么幼稚，却仍可以说它并非只涉及了晚清，还针对着中国历史的较晚阶段。

柯文

1992年元月于美国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

1. 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冯桂芬的改革论文于1860—1861年写于上海，题为“校邠庐抗议”。由于文章十分激进，所以在他生前从未刊行。他死后其子仅印行了其中一些无关痛痒之作。直到1885年，即在这些文章写成1/4世纪后，才得以全部发表。也只有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激烈变革时，根据光绪皇帝本人的谕令，这部著作才在中国官员中被广为传播和研究。

第一篇
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曲

1894年初，一个活跃而性急的年轻人，为了给这方土地上最有实权的官员李鸿章上书宣传其改良主张，从华南家乡出发上路。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结识了一位颇为著名的主张改良的老者。这位老者帮他润色上书，使之更易为人接受，又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引荐信。这位年轻人便是孙中山，而本书的主角儿则是这位老者——王韬。[注]

王韬的经历预示着孙中山一生的某些重要方面。他的著述可能对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有着直接影响。[注]但1894年他们相逢的重要性却仅具象征意义。前途无量的孙中山不久就以中国革命家的身份而闻名世界。而王韬却在度过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于1897年5月，[注]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于默默无闻中溘然长逝。

在某种意义上说，“预料”变化便是促进变化，使之成为可能。在称之为革命的巨变能够发生之前，必须有一渐变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首次认真思考激烈变化的可能性。这便是中国19世纪后60年所发生的情况。无疑，这一阶段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基本模式仍一如既往。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精神方面的不断变化，却堪称革命性的。

学者对19世纪中国的认知往往通过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比较而界定——更诱人的说法是被此限定而难以自拔。从日本“成功”之处出发，把晚清概括为“失败”；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作为“停滞”的化身而与“动态”的明治时代并肩而立。这种观点的麻烦之处在于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各自与西方相遇时，并无共同的出发点。跨文化比较是一桩扑朔迷离之事，对确认异同虽极有价值，但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变化速度）却颇有问题。现代化毕竟不是赛马。即便两种文化碰巧都处于“前现代”状况，也并没有共同的“基线”。

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19世纪中国的变化尺度是更恰当有效的方法。我们只有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1840年的中国做一比较，才能理解变化之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1800—1840年这一时期称为“盛清”（High　Ch’ing）的最后阶段。[注]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

从观念和心理上说，英、法、美与中国的距离仍极遥远，这与罗马时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感觉一样。许多中国人（我指受到教育者）从未听说过这些国家。甚至几乎无人有这些国家位于地图何处的粗疏印象。如果中华帝国有任何人略知法国大革命或听说“震动环球的枪声”，[注]他肯定是守口如瓶了。这些年中，中国与西方的唯一接触点是广州受管制的贸易。但与荷兰在日本长崎的贸易不同，在广州的接触并未成为西方思想影响的传输渠道。出于自我抉择和完全的自我欣赏而孤立于世的儒教中国，无法得知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19世纪末，经历了4次对外战争、5次国内动乱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被强加的条约之后，这种骄傲与舒适的世界已被粉碎。但这可能并不是指外在的物质世界而言：可以想象一位来自鸦片战争前的访问者，如果他绕开受西方影响的沿海而专注于中国内陆，可能发现不了多少惊人的变异。阮元在1900年仍可幸存。巨变发生在中国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两三代人之前把中国学人禁锢于儒学天地中的无形栅栏此时首次暴露出来，随后经过许多痛苦的努力之后已被撬开。一种全新的宇宙观，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蜂拥而入。应该承认，在1900年确有不少有知识的中国人仍不知道英国的确切位置，犹如某些美国大学毕业生，在东南亚地图前指不出越南的位置一样。而英国与越南一样，却意味着与每人都密切相关之物。但毕竟有许多中国人，粗略地说在1900年有几万人，其世界观经中西交往60年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中山不可能生活在1800年的中华世界。

同样，严复、康有为或梁启超也不可能生活在那个世界。关键并不在于生活、写作在1800年之后的这些人碰巧受到了西方人的影响，而在于他们处在从根本上说受到西方影响的历史之中。这一环境比其他一切更能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年的中国区别开来。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直到1840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但到1900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在这动荡的过渡年代，一种精神觉醒首先为某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和并非每一代人都能经历的大规模变革所激发。然后，一两个人便大胆将这种变革描述为“前所未有的”，即此前任何一代均未经历过的。就像尼采笔下的疯人，在即将黎明的黑暗中提灯游荡，宣称“上帝已死”。开始，这些敏感人物并不能让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但随着时间流逝，疯人渐多。到1900年，人数已多到能谈论革命性变革而根本不被视为疯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对于这个文明的永久合理性，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未敢稍有怀疑，但此时它却陷于毁灭的

边缘。

之所以说孙中山不可能生活于1800年，只是为了说明，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这是历史变迁进程的否定方面。就正面来说，每一代人都为世界贡献了某些新东西，并就此为下一代人改变这种限制提供可能性。根据这种“代际逻辑”，注孙中山在20世纪初之所思所为，部分是建筑在他的前辈当年所思所为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并非在不成熟的氛围中创造革命（事件）。实际上，在他出生之时（1866），中国已经孕育了革命（进程）。

但在王韬出生之时（1828）却并非如此。每一代都产生自己的新人。但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更新程度却可能极不相同。人类从得到火车到拥有飞机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为了得到火车却费了几千年之久。相对于这个意义而言，由于王韬这一代一只脚还站在革命前的中国，其更新的程度就比孙中山更大。因为王韬这一代，也只有这一代，才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无火车到有火车的巨大跃进。这些也同样适用于王韬和孙中山个人。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而非累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要新。

的确，展望法到处可用。当我们从孙中山的观点来看王韬，我们的确会应用“有限的”“并非很先进的”“仍非常传统的”等字眼儿。但若我们从他的起始，即他出生时的中国来展望，王韬的创新性就会使我们印象深刻。这两种展望都是合理的，这取决于作者所写的书。本书所论是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开端”，即开创阶段。因此，本书的中心不在于王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在于他如何成为一个开创者。

---

1. 有关王韬与孙中山会见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第1卷，第28页。

2. 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第1卷，第27页。

3. 一些史料称王韬稍早些时候去世，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他是1897年去世的。

4. 魏斐德，《盛清：1683—1839》，载《近代东亚：论文解释》，詹姆斯·B. 克罗里编，纽约，1970年，第1—27页。

5. 美国文学家、思想家爱默生（1803—1882）描绘美国革命爆发的诗句。——译者注

6. 这是艾伯特·克雷格的一段话。见他所著：《导论：日本历史中的个性透视》，载

《日本历史中的个性》，克雷格与D. H. 夏夫利编，伯克利，1970年，第10页。

第一章 早年在江苏

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在沿海的江苏省甫里镇，该镇位于苏州东南约50里。王家在明代曾颇为兴旺，但当17世纪中叶与南侵的满洲军队激战时，家族成员被大肆杀戮，王家再无往昔的强盛了。待王韬出生时，已岌岌乎濒于破败。王韬的父母所生的前三个儿子，都是在出生后10天之内就患天花夭折。王韬是在他父母专门进香求愿之后，才来到人间的。[注]

王韬成年后，仍深深地眷恋儿时情境，只要一有机会，就返乡探访。他最为留恋的是镇边的一座老庙，这里是欢庆新年时各种活动的汇集处。正像王韬晚年回忆的那样，此时这里钟鼓锣钹、唢呐笛声充耳不断；且有无休无止的戏剧和杂耍；在庙门外，卖玩具的小贩把各种玩具摆在两旁，琳琅满目。对甫里的孩子来说，这是最快活的时光。[注]

大约3岁时，王韬的母亲就开始对他进行学前教育。她是王韬的启蒙老师，每逢夏夜她总给王韬讲述古代名人的生平逸事，使漫长的夏夜充满温馨。这些故事使王韬深受感动，据王韬自己说，这亦使他在7岁左右就对中国的传说、笔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注]

王韬的父亲王昌桂以设馆授徒为生，教学生通过科考。当时的中国，只有跻身官场才能荣华富贵。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梦想进入官场，而通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考又是踏入仕途的主要门径，所以对能担负起学习的人来说，对经典和历史的训练及早就成为一桩严肃的人生事业。大约从七八岁始，到十几岁止，王韬一直在其父的严教下接受正式教育。无论王昌桂是在家还是在邻村或镇里设馆，王韬总是跟随其父。当后来他忙于事务少有时间学习、勤思时，曾感激地回想起正是这时为他的儒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

科考共分三级。王韬于1845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级考试（乡试），[注]主考官因其文有“奇气”而对他赞扬备至。[注]当上“秀才”之后，他也可跻身低层士绅之列。但按照正常程序，只有通过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的第二级考试，他才能被任命为官员。

1846年王韬与他父亲一起去南京参加举人考试。但省试的竞争十分激烈，他终未获通过。虽然考试失败远不能证明天资低下——许多中国人都对此大持异议——但对考生的生活前程却立即有决定性的影响。通往仕途之门被暂时关闭，直到再次参加考试，才可能考虑人生选择。王韬与他父亲及处于此境中的其他人一样，选择了虽有荣誉却实惠不大的教书生涯。[注]

科举失败给了王韬一个攻击这一“制度”的现成机会。1848年他在给好友和妻兄杨引傅的信中抱怨清朝承袭明代科举制，使应试士子只会写呆板僵化的“八股文”。这样，许多杰出之士皓首穷经仍黯淡无光，无法谋得一官半职。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人们以孝廉升迁，因此官吏廉洁、学者纯正，此种情况没有得到承继，并非没有人才，而在于选才机制的根本缺陷。从八股文怎么可能得到行政才干！[注]

王韬对科举制度的攻击，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来看待。当然，也可以简单地在表面价值上来理解。毕竟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中国人指出过这些方面。[注]也可以将之说成是一个恃才傲物、雄心勃勃的青年人因自尊心受伤害所做出的愤愤不平的反应。这一制度既然未给他留一席之地，所以他也拒绝这一制度。第三种可能是，王韬在参加这次考试前已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他的失败仅仅是证实了他以前的观点。王韬后来力称他还在孩童时代，即憎恶八股文。[注]更进一步的是，他不顾朋友要他再考一次的催促，坚持认为尚有光宗耀祖的其他更佳途径。[注]

不管真相是哪一种，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由于对科举取士制度取批判态度，王韬此时已部分地对现实不满了。在随后的年代，这些不满更为强烈。

1847年，王韬的父亲到上海设馆授徒；翌年初春，王韬也赴沪探望父亲。在此之前，王韬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中国人的世界之中。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及其他几个沿海城市开口外贸——几乎没有打扰内地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在1848年，也无法得出这些将影响中国人生活的结论。因而，在王韬对跟西方人初次接触的描述中充满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就的确使人惊讶：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

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麦君有二女……皆出相见。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

《漫游随录》，第9809—9810页

在一首初至沪上的感怀诗中，王韬表露出一种完全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预料之中的感情。他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大批“蛮夷”聚集沪上经商深表忧虑，并鞭挞朝廷的求和政策，强调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国海防。注

王韬对他所置身其中的上海氛围的种种反应，随时间发展而各不相同。前者是几年后的反应，而后者却是当下的反应。这种说法，对这种不对称现象其实只提供了部分解释。而一个更为根本的解释是，这正是王韬的本性。我们将会看到，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扮演了一系列使人惊讶的外在角色，而且还过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情感和社会生活。这些往往发生着翻来覆去、使人错愕不已的迅速变化。

我们已对王韬青年时代外在生活的特点做了简单扫描，但他还有内在生活的一面。王韬告诉我们，在17岁到20岁之间，没有一夜他不做梦，梦见某些白天使他印象尤深的场景。大约在1849年春夏，这种夜间奇想突然停止，他在名为“华胥实录”的小书中追记了这些梦幻。但不幸的是，他的梦境日记从未出版，我们只能从他当时为此所撰之前言中略见一斑。他做了如下描写：

尝闻意之挚着，神或得而通之，神之注者，地不能以域之，此梦之所由来乎？且夫一往深者情耳，而缘之已定，境每限之，遇每制之，至使思之不得，徇之不可，乃凭虚造为奇境幻遇，而托梦以传之，则我之欲言无可言，欲见未由见者，毕于是乎寄。如是即欲日求在梦中而不可得。何也？……故余以生为至悲，以梦为至乐，人虽觉而如梦，余虽梦而犹觉。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机，尔我莫辨。使余长梦以终其身，勿觉以迷其性，则感促欢淹，亦云达矣。

1849年夏，大约就在他写上述文字前后，王韬面临着他生活中的第一个真正危机——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使他必须立即承担供养母亲、兄弟、妻女的责任。对于像王韬这种经济状况的人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梦幻时节已经结束。当年秋天，王韬从前就认识的麦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聘请王韬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当中文编辑。王韬虽不甚情愿，但报酬优厚，仍得接受。[注]

青春时代在上海

起初，王韬在上海的境况颇为凄惨。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还不是它日后即将变成的令人激动的繁华大都市模样。而且，王韬居住的小屋紧邻城北郊的一片墓地，很难使他不被某种恐惧感所缠绕。[注]

更严重的是，虽然王韬不久就搬到较好的环境中，并将家人接到上海，但随后又发生了一场悲剧。1850年10月，王韬染病已久的娇妻回乡探亲后返沪才一周左右，病情突然恶化，终于不治。王韬悲痛已极。在包办婚姻时代，男女双方往往必须尽力改善并不匹配的关系，王韬与其妻子似乎就有深深的互相依赖之情。他悲痛欲绝地叹道：“苟逆知如此，何忍一日离之而他适哉？”他总认为自己移家上海对妻子的遽尔长逝负有部分责任，直到后来他再婚之后，这种阴郁的情绪仍在折磨着他。[注]

王韬对墨海书馆的工作也时有抱怨。虽然实际由他执笔，但受外国人监督，终使中文被糟蹋得令人不忍卒读，恰如王韬所形象描绘的那样：“即使尼山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注]而每日被人将其与看不上眼的外国人联系起来这一明显的事实，则比工作本身更令人恼怒。总有一天，像上海这样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口岸城市将产生一种全新的中—外文化，中国人将可以丝毫不丧失自尊感而与外国人一起密切工作。但在19世纪50年代，这还有待一段漫长的时间。此时像王韬这样向外国人“卖文”的文人，仍受他们同胞的怀疑和鄙视。

但为什么王韬还继续这一工作？显然，最重要的原因是金钱。在书馆所得报酬不仅有保障，而且数额之高是甫里的私塾先生所不敢企望

的。注另一原因，很可能是为外国人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王韬所描绘的那样枯燥。物质环境还是宜人的："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注而且，王韬对他的雇主麦都思极有好感。论年齿，麦都思可算王韬的父辈，总在王韬需要安慰时给他以善意的慰藉（一些年后，当麦都思的死讯传到上海时，王韬悲痛万分，向一位朋友坦诚表示这是他觉得最为真挚亲切的一位西方人注）。

有助于王韬忍受上海生活的最后一点，是他不断扩大的中国朋友圈。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者们在注重家庭的中心地位时，往往忽视朋友关系的重要性，而对中国的男性精英而言，这点尤为重要。不仅他们的事业使之时时离家，其业余时间往往也习惯在家庭以外度过。与他们的现代美国同行不同，这些人很少或根本没有摆脱家庭束缚的可能，所以朋友关系和其他非家庭关系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放松的最基本渠道。

不久，王韬便发现满上海皆有他的同道。王韬的日记（大多是从1852年7月到1855年5月，为手稿注）亦可极好地说明他是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并充分表明朋友对他的重要性：

> 六日甲寅：午后读《前汉书》。薄暮，正斋来舍，与之散步城闾至大境阁访壬叔……
>
> 十有八日丙申：午后至正斋舍，同往画舫轩啜茗……既别，经天主堂观剧，为扫秦一出，极佳……
>
> 二十六日戊辰：……上灯后至正斋舍。余数日青蚨飞尽，爨火将虚。正斋贷余以二洋，稍救燃眉。余初意至此盖愿稍苏涸辙耳。而今困迫又若此，不知穷鬼何年送去也！
>
> 《茗芗寮日记》，咸丰二年七月初六日（1852年8月20日）；
>
> 咸丰二年八月十八日（1852年10月1日）；
>
> 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852年10月9日）
>
> 十有八日乙丑：薄暮，偕舍弟至城北茶寮……是夕正斋购得稻蟹，留余夜饭，持螯置酒，剪灯清话，其乐何如也？
>
> 二十四日辛丑：……轰饮后，枕书、壬叔与余共游教坊，绝无粲者，重貌则牛鬼蛇神，重心则魑魅魍魉，余见之废肽而返。
>
> 《瀛壖杂志》，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1852年10月30日）；

咸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52年12月5日）

二十七日辛丑：午后蒋剑人来，剧谈天下事，以文集相示。

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自言曾至英国览海外诸胜。余即书其所道，作《瀛海笔记》一册。

《瀛壖日志》，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53年6月3日）；

咸丰三年七月中旬（1853年8月中旬）

十有七日辛丑：午后同剑人、壬叔往访某伯，清谈良久，至酒楼小饮，继复拉至勾栏访艳。是夕往老闸，得见许春山，导至福云校书室。福云颇有媚态，惜芙蓉面上多生桃花点矣。

十有一日癸酉：下午微雨。是日慕牧师馈余芦橘一枚，礼意殷优。

《蘅华馆日记》，咸丰五年一月十七日（1855年3月5日）；

咸丰五年三月十一日（1855年4月26日）

王韬的朋友乃何许人也？他们许多都曾深受儒学经典训练，取得秀才资格，而又起码部分是因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的。作为个人而言，他们颇不寻常，甚或有些古怪，不乏才华横溢者。就整体而言，他们代表了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供的才干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

墨海书馆的两个年岁较长的同事——李善兰（1811—1882）和蒋敦复（1808—1867），是王韬19世纪50年代前半段最密切的同事。他们三人密不可分，被称为“三异民”，他们三人做的画就自署“海天三友”。[注]蒋敦复是江苏宝山县人，据王韬说，他自幼是个神童，以行为怪异著称，年少时曾在寺院待过一段时间。但他的朋友力促他不要如此浪费才华，结果他接受劝告，参加乡试。他的文章使考官印象极为深刻，因此其名声不胫而走，引人注目。但不久，蒋敦复吸上了鸦片，把钱财尽用在此物上。其姐姐虽一度帮他摆脱困境，但她在丈夫去世后进

入上海的尼姑庵，他只得再度自食其力。经王韬介绍，蒋敦复在50年代初亦受雇于墨海书馆，帮助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准备《大英国志》一书。据说在此过程中，蒋本人也编纂了一部更广泛的英国史，但一直未能出版。除了成为谙熟某些外国事务的专家（他写了圣女贞德、乔治·华盛顿和儒略·恺撒的小传）外，他还以诗闻名，生前就出了两卷诗集，死后有文集出版。[注]

在蒋敦复去世20多年后出版的其政论文集中刊印了他的一篇攻击基督教的文章。于是，《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对他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但50年代曾在上海住过的伦敦会驻上海的代理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却为蒋辩护说：

> 我对他所知甚深，他被吸食鸦片毁了，却又是一个聪颖的作家……他与我们一同工作并非因其热爱基督教，而是为了能维持他的大烟瘾。
>
> 为什么他会写下如此刻毒的抨击教会之文呢？我怀疑他是为了赢得儒学读者的赞扬。他并未反复散布谣言。他是从儒学立场出发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蒋还苦读佛经，这会使他心怀某种偏见来攻讦基督教……对于像蒋这样沿用长期被神圣化的攻击性术语的作者，我们应当宽容地稍打折扣。
>
> 《北华捷报》，1891年9月18日

李善兰是浙江海宁人。与王韬和蒋敦复一样，他也未能取得比秀才更高的功名。从儿童时代起，他就显示了罕见的数学才能。1846年他写了一本关于对数的书，并总结出一种定理，而据传教士学者伟烈亚力（A1exander Wylie，1815—1887）说，这一定理“若在布里格斯和内皮尔[注]时代，一定会受到推崇”。1852年，李善兰来到上海，在随后的8年中帮助墨海书馆翻译西方数学和科学书［欧几里得、胡威力（今译休厄尔）、侯失勒（今译赫歇尔）和棣么甘（今译德·摩根）以及其他一些人］。在60年代，李善兰曾一度入曾国藩幕。1869年他任北京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直到1882年逝世时，仍就职于同文馆。[注]

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任同文馆总教习，李善兰遂与之成为好友。丁韪良对他的印象非常有趣：李是“中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数学家”。他的“榜样……激发了学生学

习数学的热情，虽然他那讨厌的地方口音使人很难跟上他的推论，这一点使北京人认为他很笨拙”。丁韪良继续写道，在上海与伟烈亚力共同工作时，李逐渐“非常近于正式信教。由于害怕影响仕途，他对此时所接受的东西十分谨慎……他的信仰——如果他有任何信仰的话——是包含东方和西方的”。“强壮笨拙，大头，极有特点，李教授很像左宗棠总管，后者被朝廷派去平叛阿古柏。”[注]

王韬的另一个朋友是龚橙（1817—？），在50年代后半段与之过从甚密。龚橙的父亲是有影响的学者和改革者龚自珍（1792—1841）。[注]王韬曾这样描写龚橙：

> 龚孝拱……性嗜酒，与余交最善。晚间赋闲，必诣其寓斋，与之作康骈之剧谈，为刘伶之痛饮。……家门鼎盛，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孝拱少时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钞录，别为一书，以故于学无不窥。……后毁于火……孝拱生于上海……后随其先君宦游四方，居京师最久。兼能识满洲蒙古文字，日与色目人游戏徵逐。……孝拱固淡于仕进……中年颇不得志，家居穷甚，恒至典及琴书。……时英使威妥玛膺参赞之任……庚申之役，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坐是为人所诟病。晚节益颓唐不振……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而行。……卒以发狂疾死。
>
> 《淞滨琐话》，上海，1934年版，第82—83页

龚橙的确非常古怪。王韬在另一处曾说过，龚橙一度不顾一切地钻研梵语，没日没夜地咏诵梵诗。[注]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他不但为1860年英国远征军引路，而且实际上是他首先暗示英国人焚烧圆明园的。但必须立即说明，这并非不忠于中国，而是出于对满人的由来已久的家族憎恨！无论有关龚的种种可疑行为的说法是否真实，麦克里维（H. McAleavy）所说无疑是正确的：王韬“肯定以能与这样一位世家子弟交往而感到满足……尽管他靠这种制度晋升，但他却对这类制度和官员十分鄙视，这自然抚慰了王韬自己的失望与自尊的丧失”[注]。

王韬与教会

王韬一生中使人最感困惑的一桩事是他与教会的关系。1853年7月，英国领事威妥玛（Thomas Wade）的一个助手——应龙田从国外返回，找到麦都思要求皈依入教。以后，应龙田每日去书馆，在麦都思指导下钻研《圣经》。不久，王韬的另一个朋友孙启榘也加入进来。[注]从1853年夏到1854年秋，王韬几乎完全中断写日记了。当他重写日记时，我们发现他的下述文字：

> 二十四日庚申：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说法，受主餐……
>
> 二十六日壬戌：是日麦、慕二牧师将至云间、洞庭，令予从之……
>
> 二十七日癸亥：……午刻抵闵行镇。维舟上岸，分送圣书……
>
> 二十八日甲子：……申刻至屯村。从麦、慕二牧师上岸分书。彼都人士竞来听讲。所携之书顷刻都尽……
>
> 二月朔甲午：是日礼拜。至五老峰听英人讲解圣书。午刻至城西……继又遇蒋剑人，因与往虹桥左侧访艳，勾栏二室校书扬州人客，不甚媚……
>
> 十有五日戊申：至会堂受主餐……
>
> 《蘅华馆日记》，咸丰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54年10月15日），
>
>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
>
> 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咸丰五年二月初一（1855年3月18日），二月十五日（4月1日）

这些日记令人信服地证明：王韬在1854年下半年已参加教会的宗教活动，而伦敦会的记录名册亦十分清楚地说明王韬已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注]但引人注目的是，在王韬所有已出版的文字中，对此竟毫无暗示。[注]实际上，若把王韬写给理雅各（James Legge）的信件的已刊本与原件相比较，就可看出王韬在煞费苦心地掩盖他与教会的联系。信的原件称理雅各为“牧师”，但出版时却改为“君”。在原件的另一处，王韬这样称理雅各：“其大旨所尚，则以福音诫人为先。欲跻一世于仁寿之域，而俾圣道之光无乎不烛。”在出版时，这段话被另一句与教会无关的话所取代。最后，只有在原件中王韬才表示他写这封信是“香港教会同人”的利益。[注]

在其他许多地方，王韬都明显表现出对教会的矛盾态度。终其一生，他一直与新教教会的各种机构（大多为俗务）保持密切联系。更进一步说，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他明显更倾向于新教，曾称赞耶稣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给予了西方人有关“道”的知识。[注]但在晚年，他又确曾对传教活动和基督教本身做过批评，不断指出——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夫子对“道”的解释最臻完善。[注]

这样，我们如何理解王韬的基督教信仰？他是“虔诚的”，还是投机的？在艾约瑟为蒋敦复的辩护中以及丁韪良对李善兰的评价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人的任何一种公开信教的路径上，都有学理的抑或充满官腔的遁词做障碍。所以，王韬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他为教会接纳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他是“坏”教徒的铁证。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是个好教徒。当然，从基督教的观点看，王韬的行为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更进一步说，虽然直到临死仍是教会同人（1873年给理雅各的信是皈依的最后证明），但在任何一点上他都未能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宗教倾向很强的人（如谭嗣同及康有为）。

有关王韬信教的材料就这么多。但促使王韬皈依的原初动因究竟何在？当然，原因之一是最初几年在墨海书馆的工作性质，即重新汉译《圣经》，并作为定本广为传播。最初的翻译工作是由许多新教传教团体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做的。后来则由一个五人组成的稍小的委员会代理，监督完成这项工作。这一委员会由麦都思为首，从1847年6月起每天在他上海的寓所碰头。1850年7月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1853年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注]伦敦会的美魏茶（W．C．Milne）自始至终都负责此事，他描述这一进程道：“我们的日常工作是：开始时读一段经文，然后祈祷，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半。翻译程序……是逐字逐句推敲，使每人都有机会提出他认为最满意的词句以供选择。代表中一些成员都有自己的当地教师陪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帮助。”[注]

《新约全书》的定本为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接受，迅速成为中国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到1859年就出了11版，该译本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沿用。[注]在1890年的传教大会上，一位发言者在评论该书时发表了许多见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有一种全新的风格。它较好地摆脱了僵化生硬的结构……是它的作者学识渊博的纪念碑……对它最经常的批评不是它的文字上的新颖，而是它

不完全符合规则……严格遵循原意……太多地包容一些使人联想到圣者的条规而不是天国的神秘性的字眼……这使……见识不多、神性不够的读者为这熟悉的节律所欺，极易将基督误认作孔子，十分危险。”[注]

这一定本的文学特色实际上很可能要归功于王韬的技巧。据伟烈亚力说，这一翻译可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麦都思）的产物”[注]，而在这一工程完成的八九个月之前，王韬就开始成为麦都思的“中文教师”。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起码在风格上产生影响。[注]王韬的雇主对他的高度赞赏，可作为王韬对此做出贡献的间接证据。对于王韬，他们感到如获至宝。他们在1854年写道：“他是有超群能力的人。如果他继续当前这种精神探索，从文字的角度看他将对我们大有裨益。”[注]翌年王韬被委派负责为该会修订所有的中文赞美诗，并“使其具有一种让最优秀的诗界天才听起来也不反感的形式”[注]。

但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的性质，对他的皈依基督教只能提供部分解释。同样重要的是他为之工作的传教士团体的巨大力量。半个世纪以后，伦敦会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回忆在上海的岁月，称慕维廉是“基督教教会给予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福音传教士之一”，而麦都思则为“他那时代汉学家中的领袖……传教士中的巨匠”[注]。与能量如此巨大的传教士们的日常接触，必将产生某种压力。传教士并不坚持要他们的“当地助手”成为基督徒。但他们的偏好却十分明显，而许多中国雇员在这种情境中肯定会感觉到对基督教的宗教兴趣的提倡。王韬的中国朋友大多为西方人所雇佣，其中一些自己就表明希望皈依，所以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赞扬王韬成为他们的同道。毕竟，口岸城市新文化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

对西方的初步评价：1859

王韬留居沪上前10年左右所写的作品，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当然也没有他认为西方是主要“挑战者”的暗示。考虑到王韬为西方人工作并居住在一个西人日多的城市这一事实，这是颇为奇特的。要理解为何如此，必须记住两点。第一，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江苏省）正处于内乱的阵痛中，太平军起义（1850—1864）使当时其他任何事件都

显得无关紧要。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详述。第二，在19世纪中叶，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影响下，即它认为中国文明几乎不可能遭遇根本性的挑战。

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最后，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中国人将其统统归于“道”这一概念之下）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

当然，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人才将自己的特殊价值等同于普遍的人类规范。基督徒、穆斯林、马克思主义者及美国人的行为都以这一论断为基础——凡对“我们”有益者，皆对所有人有益。而中国观念的特殊性，在于其对普遍性的紧握以及这种普遍性的程度。主要由于地理原因，这种观念能历经若干世纪而未受挑战地发展起来。中国曾经屈服于更强的军事力量（蒙古人、满洲人），而且中国文明起码受过另一较高文明（印度）的深刻影响。但直到19世纪前，中国世界从未遇到过另一具有巨大资源的文明中心的挑战。更进一步的是，当中国人巡察中华文明给东亚世界打下的烙印之深时，几乎无法不得出“未曾”发生的便“永将”不会发生这一结论。

这种世界观的一个后果，便是对“非中国”的严肃的精神关注予以阻拦。“夷务之学”这一观念本身便自相矛盾，因为“蛮夷”被定义为不值得研究的。所以，中国不但在1840年不理会西方人，而且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仍不理会西方人。这种世界观流行的第二个后果与第一个密不可分，即以这种方式建筑中国人的西方观——把一切有价值的归于中国，很少或根本没有将之归于西方。西方可能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优于中国，为安全原因中国可能有必要钻研这些方面，但就本身而言，这些方面并不重要。

19世纪50年代后半段中国与西方之间未获解放的紧张终于再次导致冲突。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英法提供了所需的借口。秋天，英军开始对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的衙门进行炮击。但由于印度英军中印度士兵的起义，广州迟至1858年初才被占领；叶名琛被俘，后被解至印度加尔各答。英法联军同时在天津进行军事活动。1858

年6月，在与清政府谈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新的条约，以外交平等为名得到了外国使团在北京的居住权。不久美国和俄国得到了几乎同样的条款。但随后将证明，在居住权问题上清廷并不愿意如此轻易地屈服。但1859年夏外国使团的谈判代表返回天津换约时，又爆发了新的战斗。1860年，规模更大的外国远征军最终取得彻底胜利。新的谈判又开始了，《天津条约》也被批准。

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事件，使中国人暂时（当然是部分）从关注内部威胁转而关注外部威胁。随着这种转变，精通西学的专家的行情看涨。这样，王韬这一类人也随之增加了自尊与自信。1859年，当听说友人周腾虎[注]入官僚幕府时，王韬便主动给周写了封长信，概述了他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这封信是以攻击显然在口岸华人中已经流行的3种观点开始的：（1）外贸的增长带来大量关税，因而于中国有利；（2）中国将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而富强，这些技术包括坚船利炮、铁路纺织及农业机械；（3）中国学者掌握像天文、数学、地质、生物、水文和医学等西学，将有实际的益处。

对上述各种观点王韬都做了详细批判。他辩论说，与西方通商无论有什么直接的益处，中国对西方开放终将有害于中国人民。请看印度的情况！中国朝廷宽厚地允许西人在广州经商，但一旦销毁鸦片，他们马上翻脸进攻中国。朝廷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允许五口通商。他们本应对此感恩不尽！但是不，他们反而在京畿之区（天津）寻衅，要求在内地经商。王韬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把澳门让给葡萄牙引起的。现在西方人盘踞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口岸，一旦冲突爆发，中国将不再能控制局势。

西方的威胁并非仅仅是军事一项。对中国的风俗教化更为危险。甚至在通商甫始之时，各种社会中的腐化因素便在与西方人的关系中找到了避风港。太平军首领用以毒害人民头脑的教义，就深受广东教会的影响。王韬写道："吾恐日复一日，华风将浸成西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

王韬自称充分意识到西方技术的优点，并不因为它们源于西方而拒绝之。中国之所以不能采用这些是有实际原因的：中国内港甚狭，轮船无法行驶；土质松软不宜修铁路；采用省时农机将使数千万贫苦农民失去工作，等等。

虽然在前些年的信中王韬曾认为西方的天文、数学水平高于中国“十倍”[注]，但现在却对西方科学持统统反对的观点：

> 至于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故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数者，六艺之一耳……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

但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采用西法吗？王韬的回答是：非也。过去，“哲人取法夷狄，孔子学在四裔”，成功的政策应选学有用之法而拒绝无用之法。这样，王韬详论了学习西方且有益于中国的三个方面。第一，应学西方军火武器，使军队能与其战斗；第二，应学西方轮船，因“轮船用于海，可备寇盗威戎”；第三，应在每一口岸城市都设同文馆，使才智之士能学习西方语言，充当翻译。

提出这三项建议后，王韬立即补充说，他之所以赞同这些，是因为中国别无选择。采用某些西法之所以必要，仅仅是为了战胜西方，舍此并无任何其他方面的合理性。假使西方尚未来到中国，仿效西法不但毫无益处，而且极端有害。王韬也不接受另一种观点，即以为天下大同，而在西方人新法背后的秘密暴露出来之后，将增进中国的知识，因此，中国人无须对之心怀恶意。他提出了中国本身产生过的一长串技术天才的名单，如墨子曾发明精巧的守城机，诸葛亮曾发明运送粮食的木牛流马。但所有这些发明都随发明者的逝去而失传，因为中国人认为人的才智向另一方向发展才最适宜。所以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王韬指出西方政体（实际英国政体）的三大缺陷，以反对那些赞扬西方一切均好而中国一切皆劣的观点[注]：（1）“政教一体”；（2）“男女并嗣”；（3）“君民同治”。然后，他列举了西方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可悲之处：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计；妇女结婚时必须有嫁妆，结果无钱者有时竟终生待字闺中；青年人受到赞扬而老年人却不受尊重；“借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天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

在这封长信的最后一部分，王韬把中西碰撞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对比，并在循环论历史观中找到了未来的保证。他推论说，中国终将以德胜而不是以力胜。俟中国重振政教时四方小国必将俯首称臣；待大道兴时夷教必然灭亡。西方人之所以能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的“力”暂时处于衰退状态。但这并非新奇。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不止一次被比它强大的蛮夷侵略。但毫无例外，当进入中国后，它们的“力”便开始衰落。辽、金、元今日何在？“自昔无常强之国。”[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欧洲历史。“罗马盛于汉，西班牙盛于唐、宋，荷兰盛于明，而今皆衰矣”。“英至今日诚为极盛，然盛即衰之机也。”自满自大将招致毁灭，此之谓“天道”。[注]

1859年1月，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徐有壬（1800—1860）任江苏巡抚。徐有壬非常崇敬李善兰（李在1859—1860年曾短期入徐幕）。[注]很可能是通过李善兰的介绍，他听说了王韬。大概是受到徐的鼓励，王韬在1859年上半年不断给徐上书，就中国当时的困境提出建议。

在给徐在第一次上书中，王韬从应优先考虑之事入手；而在1859年，这一论述大概也只有在口岸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方能提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然欲御戎必先平贼，二者盖有相因之势。而欲平贼则请以和戎始。”简言之，二者之中蛮夷危害更深，但并非当务之急。

王韬对中国先前投降蒙辱感到愤怒，并责备中国的高官对广州的未来和前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命运似乎毫不关心。与他最初的评论一样，他的条陈也是相当妥协的。他注意到僧格林沁在天津备战，便警告说，如果朝廷准备与外国人开战，将导致巨大灾难。

争论的中心是外国人要求增开口岸及外交使团在京的居住权。王韬认为，朝廷在第一个问题上似乎愿意妥协，而视第二点为深不可测的灾难。王的感觉却不同，他力辩中国在第二个问题上也应妥协。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中国并未强大到能从军事上打败外国人。如果朝廷未经反对就对居住权问题表示妥协，外国人将感谢朝廷的善意。但如果朝廷坚持主战，外国人仍将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却毫无感激之情。第二，虽然中国尚不习惯外国官员居留京城，但在外国这却是常规做法。起码就暂时而言，西方人士在华的利益主要局限于贸易方面，

他们驻京的目的也是为了便于照顾他们的商业利益，而并非像所担心的那样，是在华间谍。[注]

在给徐有壬的第二次上书中，王韬直陈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仍难与西方打交道的原因，首先在于军事太弱，其次在于内乱。所以，最要紧的是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自强措施。某些朝臣并未将蛮夷视为紧急问题，因为西方人与从前的狄夷不同，似乎对中国的领土并无兴趣。但承认开口通商的特权果真与割让领土不同吗？前一种灾难虽缓慢且不明显，但实际并不稍轻。王韬继续写到，还有些人相信以夷制夷这一古老的战术依然有效。然而，尽管西方国家之间确有大量摩擦，但果真能设想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与英国开战吗？在最后结论中，王韬重提世上无任何国家能永远富强的观点。但同时，对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即使不采取一定措施也能变得强大的自大观点，他也谨慎地表示反对。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坐待强盛之机来临。中国抵挡西方挑战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某种西方挑战建于其上的强盛之术。[注]

王韬对中西碰撞的初次评价中所包含的许多观点，如循环史观及对西方列强长处的清醒认识等，以后未曾更改。但此时表达的许多其他观点，以后渐有重大修正。虽然在50年代末王韬已经感觉到西方是中国主要的直接威胁，但他仍不拟承认（起码未公开承认）这实际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挑战。要承认这一点，首先须把西方作为一种值得尊重的文明看待，而王韬在50年代仍用“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阴鸷桀黠，其天性然也”[注]来描述的“狄夷”还有待于完全变成“人”。

---

1. 作者此说不确。按清代科举制度，正式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正式考试之前亦有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考生（即童生）通过此三级考试者，即成为生员，俗称秀才，即取得了最初级的功名，方可参加以后的正式考试。下文作者言省城的考试是第二级，也是错误的。——编者注

2.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6—17页。

3. 王韬，《漫游随录》，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编，台北，1962年，62卷本，第9806—9807页。

4.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1页。

5. 同上，卷11，第9—10页。

6. 同上，卷11，第16页。

7. 《漫游随录》，第9808—9809页。

8. 《弢园尺牍》，卷1，第18—20页。

9. 参见倪德卫，《抗议成规与成规的抗议》，载《儒学功教》，芮玛丽编，斯坦福，

1960年版，第177—201页。

10.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7页。

11. 《弢园尺牍》，卷1，第18—20页；卷2，第8—9页；卷3，第9—11页。

12. 《蘅华馆诗录》，卷1，第19—20页；《瀛壖杂志》，卷5，第10—11页。

13. 恒慕义编，《清季名人录》，卷2，第836页。

14. 亨利·麦克里维，《王韬：一个过渡人物的生平与著述》，伦敦，1953年，第5页；《弢园尺牍》，卷2，第1—2页；《瀛壖杂志》，卷1，第7页。

15.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2—23页；《弢园尺牍》，卷2，第4页。

16. 《弢园尺牍》，卷2，第2页。

17. 同上，卷2，第11页；卷4，第6页。

18. 《漫游随录》，第9809页。

19. 《弢园尺牍》，卷3，第8页。

20. 这些日记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中。《苕花庐日志》，1849年6月11日—22日；《茗芗寮日记》，1852年7月17日—10月12日；《瀛壖杂志》，1852年10月13日—1853年4月17日；《沪城闻见录》，1853年7月—9月；《瀛壖杂志》，1853年4月18日—1854年1月29日；《蘅华馆日记》，1854年9月22日—1855年5月4日。

21.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1934年版，第1713—1714页。

22.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2—13页；卷2，第8—9页。

23. 二人皆为英国数学家。——译者注

24. 《清季名人录》，卷1，第479—480页。

25. 丁韪良，《花甲自述》，纽约，1896年，第368—370页。

26. 在王韬日记中并未提到龚橙，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他们是在1855年以后相识（日记中断之年）。

27. 《瀛壖杂志》，卷5，第3—4页。

28. 《清季名人录》，第10—12页。

29. 《沪城闻见录》，咸丰三年六月。

30. “第61届传教大会报告”，伦敦，1855年。王韬的登记名字为王兰卿。

31. 在讨论教会对王韬的影响时，麦克里维见到了唯一的出版物，声称“当然，他的头脑未接受基督教的最轻微痕迹”。

32. 这封信的印行文本见《弢园文录外编》，卷8，稿本重刊于赖廉士的《传记注释》，1960年香港版《中国经典》前言，第16页。另可参见《漫游随录》，第9810—9811页。

33. 例如，可见《瀛壖杂志》，卷6，第11页。

34. 例如，可见《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6页。

35. 见“在华新教大会记录”，上海，1890年5月7日—20日。

36. 伟烈亚力，《圣经在中国》，上海，1897年，第103—104页。

37. R. W. 辛普森，《杨格非：在华五十年》，纽约，1906年，第431页。

38. “在华新教大会记录”，第52页。

39. 伟烈亚力，《新教入华传教记》，第35页。

40. 艾约瑟在1855年10月3日的一封信中写到，当时上海教会有两名“秀才”，“其中之一是翻译《圣经》的主要助手”。明显系指王韬，见《教会杂志与编年》，卷20，第68页，1856年。

41. “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伦敦，1854年，第63页。

42. “第61届传教大会报告”，第53页。

43. 《杨格非：在华五十年》，第47—49页。

44. A. F. 怀特：《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卷21，第233—255页，1960年版。

45. 在《瀛壖杂志》中，王韬为周做一小传，卷4，第24—25页。

46. 《弢园尺牍》，卷3，第3页。

47. 王韬在此明显是以蒋敦复对英国政治的批评为基础的，见《啸古堂文集》，卷7，第2—5页。

48.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8—19页，在王韬稍晚的另一封信中，也可看到本质上一样的思想。

49. 《弢园尺牍》，卷4，第4—12页。

50. 《清季名人录》，卷1，第479页。

51. 《弢园尺牍》，卷4，第12—19页。

52. 同上，卷4，第19—22页。

53. 同上，卷4，第6、20页。

第二章 暧昧的造反：王韬与太平军

太平天国起义可能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它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些，诸如官吏腐败、赋税过重、地租过高等等，都是中国王朝衰败时的典型表现，而另一些原因，诸如人口迅速增长、由外贸引起的经济动荡等等，则是19世纪前半期所特有的。太平天国造反者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其他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仅向王朝统治者，而且向整个传统秩序挑战。就此而言，最好将他们称为革命者，而不是造反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旧约全书》、儒教乌托邦、性禁欲与原始共产主义的古怪熔冶。这一运动的创建者及领导人是一位广东客家人，在梦幻中自称是耶稣的兄弟，深信自己受上天之命，来扫除世上阎罗，建立地上天国。

起义是1851年在中国南部开始的，此地的起事条件格外成熟。起义军迅速北进，不断打败帝国军队，一直打到长江边；然后东进，在1853年建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南京一直是其首都。虽然起义军控制的主要地区只限中国中部，但在约15年的战争中，受影响的省份却达16个。50年代中期的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才被打败。在60年代前期，中部起义军又向沿海发展，上海几度受到威胁。注

就对生命和财产的破坏而言，太平天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长江下游广大地区城乡都被彻底破坏。战斗双方均草菅人命，而帝国军队可能尤甚。数百万人被屠杀，更多的人死于饥馑和疾病。当时的外国人估计，死亡总数约在2000万—3000万之间。虽然这些数字纯系猜测而得，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证明，在某些地区大多数居民灭绝了。例如，来自安徽南部旌德的一个幸存者以如下耸人听闻的文字描绘当时的场景："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该县原有人口逾30万，当起义军被赶走时，却只幸存了6000多。此乃这一地区空前之大灾难。注

按何炳棣的观点，旌德是淮南广大地区的代表。受冲击尤为严重的是赣北、浙北和苏南地区。何炳棣写道："曾十分富庶、人烟稠密的苏南地区，此时人口稀少，以至于整个村庄都被来自湖北的农民占领，他们

希望能耕无主之良田，居无主之华屋。”[注]

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屠杀不仅伤害了直接牺牲者，而且在无数方面给幸存者的生计带来灾难。王韬的情况便是如此。自始至终，王韬一直密切注意起义军动向，从而成为这一事件最重要的记录者之一。[注] 1853年秋，与太平军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华人区，初次对王韬造成了直接影响。以后的几个月，王韬的活动仅限于受外国人保护的租界。几位来自中国城区的朋友（其中有蒋敦复）此时也避居在王韬家中。[注]从此便开始了上海作为战区难民避风港的历史，而上海外人居住区的华人从1852年的500人增至1854年的20000人。[注]

清帝国派了两万军队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将小刀会起义镇压下去。[注]而形成对比的是，起义军在几天之内就拿下了像九江和南京这样的城市。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王韬认为，部分是因为官吏、吸食鸦片者和和尚道士糟蹋了中国的财富。但照他看来，政府的主要困难还不是缺钱，而是缺人。中国急需的是称职的军事将领和官员。太平军之所以能轻易占领长江下游，是因为民众的离心与士绅道德的堕落。1860年他向龚橙抱怨说，这种离心与道德下降，是地方官统治薄弱的结果。[注]

1860年，太平军经过一段低潮后，在杰出将领李秀成领导下获得了新的生机。李秀成在这年秋天占领了苏州及苏沪间大片地区。上海的中国居民迅速突破了50万的新纪录。[注]上海被难民所淹没，其中不少是来自省城（苏州）的官员与士绅。王韬当时这样描绘全城的变化：“沪上繁华远逾昔日。诸名士避地至此，来作寓公，赌酒论诗，几忘兵燹。”[注]

王韬陈言当局

就目前所知，王韬在19世纪50年代一直远避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注]但是，起义军对其家乡的占领和1860年一度对上海的紧逼，迫使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他曾一度在上海西部帮助地方官诸翟训练城防。[注]在1860年秋则更进一步，向当局陈言如何对付造反者。

王韬一开始上书，就注意到上海的财富是叛乱者不遗余力的夺取目标，所以必须准备本城城防。但若仅注重于防守，必使叛贼得到主动权，使其能挑选攻城时机，这样于朝廷不利。由于叛贼在苏南立足未稳，该处民气仍高，所以当局应千方百计立即反攻。上海的最好防御就是进攻。

王韬还两次提出特别条陈，每次10条。第一次条陈可归纳如下：（1）宜招纳两广逃勇，使之支持朝廷；（2）“贼所胁从之众必须设法解散”；（3）“巢湖船之散在外者，宜招回以为我用也”，这样乱军便无法形成水师；（4）“江宁难民宜安置妥密也”，以不给朝廷供给造成压力；　（5）“民团与官军宜分用以责其成效也”；（6）“团长宜简有胆智之士，使团结民心，贼至勿却也”；（7）“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借以箝制也”；（8）“假冒贼之旗帜衣饰混杀并战，以乘其不备也”；（9）为防守上海，“饷不可不予筹，勇不可不广募也”；（10）“闲民客民之新来者，当清其源，或安集，或驱逐，以绥靖地方也。”

王韬的第二次条陈主要是关于如何进行游击战略的。他论证说，农民较其他任何人都更熟悉农村，但他们需要有智识的领导，以形成更有效的抵抗。王韬的特别建议既冷酷又有创造性：“诱敌深入而设计歼之也”；“侦敌出没之时而击其无备乘其疲乏也”；“设空房以焚贼也”；“焚炮贼船或诱贼至舟而杀之也”；等等。(注)

从王韬的建议中，人们得到一种战区形势不断变易的生动印象。这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战争——双方看起来完全不同，操不同语言，代表了极端不同的信仰。这是一次内战。必然如同在其他内战中一样，人们——尤其是受教育者——确乎在保存或摧毁某种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某种观念，一整套价值体系，一种政治体制。但对许多参加者来说，敌与我、亲政府与反政府者之间的界线是非常模糊的。在农民的抉择水平上，主要考虑的是个人生存，而究竟选择哪一方于己更为有利，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的。

王韬的一个条陈使这一点更加清楚。他注意到，当叛军到达一个新村庄时，时时装作宽宏大量，如果村民供给钱物，便严禁抢掠烧杀。由于村民仅为保护自己的家产，而毫无“大义”，然后信任叛军，解散团防。为抵制这些，王韬建议民团首领装作普通村民向叛军献物，然后伏击叛军。这样，当村民真的献物时，叛军将杀掉村民，这样村民将丧失

对叛军的信任！注

就在呈递上述条陈后不久，王韬又给地方当局提出另一套建议。这一次集中于修补上海与叛军控制地区的交通和补给线。上海司法管辖形势的特点使这一问题极为复杂，因为它不仅要控制叛军间谍和反朝廷者以租界为庇护进行的种种活动，而且要控制西方商人偷偷供给叛军军火和补给。由于从许多陆路和水路都能进入这座大都市，使得这一问题更为棘手。王韬提出各种具体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如对难民进行调查登记，对所有进出货船都严密检查，设立水上检查点，所有过往商人和货物都须接受盘查，等等。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外当局应紧密合作。注

王韬大约在1861年底写的另一封信也值得提及，尽管此信似乎没有发出。这封信是写给政府军方面的主要将领曾国藩（1811—1872）的。它的主要观点是叛军在东南地区的成功并非由于其勇猛，而是因为该地区州县官员的职守未能确当划分。如官府控制的城市防备充分，待叛军进攻时，就不仅应让防城官员完全负责，而且应使之大权独揽。注

在此时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王韬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一篇据他自己说是就在叛军占领苏州之前呈送给当局的文章中，他强调有三种解决叛军的基本方法：灭绝、包围与安抚（剿、堵、抚）。但只有有能力将其围剿时，堵截与安抚才有效，而只有用计谋，才能有效地灭绝叛军。王韬清楚地表明，他以为这便是政府的失误所在。注

王韬在第二篇文章中写到，帝国为三种疾病所苦。犹如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一样，当局一直让事情放任自流，并力图使国人相信一切皆好。三种疾病是民穷已极（由于镇压军需所用，赋税过重）、江浙地区荒芜毁坏（中国最富庶的大米产地）、官吏们拘于形式和惯例（最后一点他称之为“拘牵义例，厥病曰痼”）。

上述疾病急需治疗，否则将无可救药。为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王韬提出政府应鼓励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制造和商业财富。一旦政府开道，私人将紧紧相随，10年后将极可观。当然，只有在平定叛乱之后，被战火破坏的江浙经济才能得到恢复。但仅就强调问题的急迫性这一事实，却应归功于他。

使他最感痛苦的疾病，大概是官僚体制及其擢才方法的极度僵化。他写道：中国的巨大危险不是叛贼在腹心的造反，而是政府缺少有才干的人。“人才者，国家之元气，群生赖以立命，诚能朝无倖位，野无遗贤，又何有于区区之盗哉！”在王韬的心目中，这种人不应仅收发公文，而能为政府办理实际事务。而他挖苦地总结说，这种人只有在世上的日常实际事务中才能发现，而绝不可能由通常的科举制度发现。注

《臆谈》

1862年元月，王韬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立即返乡。他在甫里延长了停留时间，据称是由于气候恶劣和战事日紧。直到5月，他才回到上海。在甫里的3个半月中，他对战争的进程及政府的无能感到失望，这激发他写了一系列对中国病症的研究批判文章。

文章总名为“臆谈”，分44篇，该名有意模仿唐、宋时期的两部政治著作（杜牧的《罪言》和苏洵的《权书》）。虽然王韬明显希望把自己的意见呈给当局，但由于不久就变得清晰的原因，这一希望并未实现。不过若干年之后，他的确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注

在《臆谈》中，王韬对政府三项主要政策一一做了仔细检查：经济、军事及政治。他的经济观点新旧混杂。他告诉我们，政府的目的是“富国而足民”。为达这一目标，应该遵循四条途径：减少开支、扩大财源、消除浪费、鼓励节约。王韬还认识到了下述做法的价值——通过应用“西法”来发展诸如开矿、造船及机织等行业。但这颇为费时，当前还需要一些更传统的方法。王韬举例说明了一些可以立即减缩的政府开支：政府机构裁撤冗员，禁止虚造名额多领军饷，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等。注

王韬还对清军状况做了一些批评。军队往往为多得军粮而吃空额；不少士兵老弱不堪，无法战斗；训练不受重视，武器落后；士兵彼此纷争时十分强悍，但在战斗中却畏缩不前。王韬指出，为克服这些弊病，应增加军饷，改进训练，更注重道德和纪律这类较为普遍的问题。但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将领的素质要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此外，将领应为不同领域的专家。有些应负责整体战略，另一些则

指挥某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负责武器装备，等等。王韬提出，为鼓励这种专业化，武举制度应彻底改良，应为不同类型的军事领袖设立不同的考试科目。他进一步要求成立“武备院”，未来的将领可在此修习并举行定期考试。每三年可以从该院擢拔新员，并授以军衔。这样，中国的武备便能常备无患。[注]

在《臆谈》中，王韬的基本关注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他多次表示，中国政治传统中有一种可被我们今天泛称为“激进的封建制”的倾向。所谓“激进”，在于它对既存帝国官僚体制实践（如果不是理论）的彻底批判；所谓“封建”，是因为这种批判从总体上是以“三代”为模式的，彼时的政治格局往往被描述为封建制在中国的盛行。

王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君主与臣民间的裂缝不断扩大。在上古，君民关系密切，民众不满之情可上达统治者。反过来，君主能洞悉其臣子的心灵深处。但从秦代伊始，这些均发生变化。除了谄媚之言外，大臣的忠言要上达君主之耳日益困难，一般百姓则更视“君阍如九重之远矣”。[注]

王韬感到，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得提高官员的素质，增加他们的权力。其次，“君既与臣下略分言情，则臣自倾诚输纳，毋敢隔阂矣”。当然，两种方法是不能分开的。而建立一种更富于生机、更足智多谋的官僚集团，将自动修复统治者与社会之间被破坏了的交流通道。

在古代，君王更平易可亲而不是更令人生畏，官员们能畅所欲言，经常向君王提出警告。然而现在，虽有专司此责的官员，但奉承谄媚更加诱人，因此朝廷少有坦陈直谏的批评。结果，皇上无法得到有关帝国的可信情况。为纠此弊，王韬敦促：敢于犯颜直谏者应受奖励，以广开言路，鼓励所有官员坦率报告自己辖区内的真实情况。[注]

王韬还反对对官员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频繁调动，力辩这将使官吏无法熟悉地方问题，无法提出长期的解决方案。王韬再次回到了古代——这一次是回到了古代根据“舆评”任免官员的实践。普通小民尽管愚陋，却最为公平。若依他们的判断来定夺，肯定会产生良政。[注]

王韬对如何创立更有效的行政体制的关注，自然使他考虑宰相制问题。在明代以前，宰相是官僚机构的最顶层，并往往具有极大的行政权力。而明朝的开国者有鉴于此，便永久废除了宰相制。但王韬告诉我

们，虽无宰相之名，实际上在军机大臣的名义下仍保留其实。军机大臣与皇上来往密切，首席军机大臣行使着与过去宰相一样的权力。王韬对宰相的重要作用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从民众的利益来看，它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价值可谓神圣。由此他明确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中国已有一段时间未享有宰相制的益处。故他争辩说，皇上应置官僚机构中的资历和文牍于不顾，而广求贤才任“宰相”一职。[注]

这类建议都直接或间接考虑到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王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官员素质。由于普遍的贪污及政府为增加岁入而出售官职亦很盛行，“市道”在官场中逐渐兴盛，真正能胜任的官员却逐渐罕见：“问有为国者乎？无有也。问有为民者乎？无有也。唯知有利而已矣！噫！如是安得不病国而殃民。”[注]

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宜之计是严肃纲纪以严禁贪污，裁撤不称职的官员以提高其他官员工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之方是重新考虑录用官员的渠道，主要是科举制度。王韬认为，科举制度主要有两方面的基本缺欠：其一，入选者过多，由是则降低标准，也损害了士大夫的威望，结果反而使政府不能得到士大夫的支持；其二，科考试题范围过窄且不实际，结果使许多本可成为优秀官员的人失利，而其他一些并无行政能力的人却能通过。

王韬建议：克服第一个缺点的方法是缩减录取名额，并将考试间隔时间拉长。他又认为，可通过扩大考试范围来克服第二个缺点，科目应包括经典、历史、诗、策论、行政、时务、地理、天文、自然科学、数学、军事与法律及理财等等。这样，仅某一方面突出的人，便无法踏入仕途。

但王韬仍谨慎地写到，即使最好的考试制度也远非完善，因为没有一种考试能测出人的品性及在实际中运用知识的能力。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改革者都想改良这一点，而且几乎都想以古代的“荐举”作为录用官员的补充形式。毫无例外，王韬也充满热情地赞扬了汉代的察举实践，并相信没有比此更好的制度能使品性较好且有实际才干的人入仕。[注]

在王韬的许多建议中，暗示着这样一个设定：若要把中国政体整体加强，君主必须放弃部分权力。他颇为矛盾地声称，“封建”制的强大之处在于权力的分散，如王室与有影响的大家世族分享权力和土地，这

样，后者便与朝廷有更紧密的利害关系，并且更愿前来解救危难。王韬哀叹这种古代制度的式微，力主要以增加皇族成员的权力来部分地复活这种制度。注

在《臆谈》中，王韬似乎着迷于清初杰出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并在一定程度上也着迷于黄的同代人顾炎武（1613—1682）。王韬论述的许多专门的改革，如恢复宰相制、扩大科考范围、用荐举制作为进入官场的补充渠道、十分强调官员的专门化和实际知识等等，都是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经典著作《明夷待访录》的回声。王韬对这部著作十分熟悉。注而且，与黄宗羲一样，王韬改革论述的基本框架也建立在自秦统一后中国政治便逐步衰退这一前提之上。他由此认定，仅以恢复战前的状态来医治太平军动乱的创伤是不够的。复旧只会延长爆发的时间，现在所需的是，以中国上古理想的政治行为为指导，对整个体制进行根本重建。

《臆谈》标志着王韬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终点。到现在为止，尽管他与西方人士接触较多并皈依了基督教，但他对“中国问题”的感知却似乎很少为“西方挑战”所困扰。王韬曾零零星星地赞扬西方的船炮技术或农业机械等等，但却少有急迫感。中国的当务之急——造反——对中国人说来是太熟悉了，所以寻求中国化的解决方式，就是很自然的。而且，如果说《臆谈》中的思想是前西方的，但并不能因此说他的思想不够激进。传统主义者认为过去是一种静态的不动，因此顽强固守着过去而反对采用任何新法。注王韬则与之不同，他的“退化”史观使他能用过去来为更深的变化辩护。在他看来，认同传统又不否认创新，实际上更有利于传统。

对王韬的指控

王韬在甫里时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使王韬以后的生涯深受影响。1862年4月4日，清军在熊兆周的指挥下于上海西南的王家寺（位于七宝）战役中击败太平军。在落入胜利者手中的种种文件中，有一封署名黄畹、字兰卿的长信，此人为苏福省（太平天国在江苏南部新建立之省）人。此信写于1862年2月3日，是写给太平天国苏福省民务官刘肇钧的，要刘再转呈李秀成。注早在元月初，李秀成在苏州即公开声明准

备夺取上海。他要求清军投降，西方人保持中立，民众保持平静。[注]
黄畹上书即以此为背景，探讨了进攻上海的具体问题。

信件一开始就强调了上海外国人防守的坚固强大。作者颇为冒失地认为，只要外国人居住区不受威胁，他们就不愿与太平军发生冲突，其部队将保持中立。但他继续写到，应牢记英法都是欧洲强国，宁愿死千万战士而不愿屈辱投降。所以，太平军应明智地遵循古已有之的军事法则，当敌人强盛时应尽量避开，待敌人转弱时再伺机进攻。人们为夺取中国在与满人作战，而不是与英法作战。

作者马上又补充说，这并非说太平军不能占领上海，只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与计划。然后他提出一个四点大纲，只要避免与外国人的任何直接冲突，终将占领上海。第一，李秀成应“移文”上海英法领事，表明意识到上海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强调太平军愿意继续与西方人保持友好关系，但要求外国人不要给敌人以援助和便利，以恪守保持中立的诺言。

第二，部队暂时可移驻他处。如上海受到威胁，则外国部队将集中城里，高度戒备。但如果太平军撤走，外国防备将放松。“然后令我兵佯做居民，若为事平而仍迁至沪者，得至洋泾浜赁居潜往，密约日期，同时合举。我之大众夤夜疾趋，刻期大集，内应之人，四面纵火，声东击西……无不胜者。”

在第三、第四点中，黄畹大致勾画出太平军控制浙江及长江流域其他一些城市的宏大战略；如果成功，太平军将会占据上海周围的粮食供应基地，该城必因饥饿而投降。

这封信的作者在结论中重申，他认为太平军暂时应集中进攻清军，而尽一切努力与外国人维持亲善关系。外国人的军事力量令人生畏，不可能忍气吞声。如果他们在上海失败，必将与清军一同进攻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军在上海很快取胜反而对清廷更有好处。[注]

黄畹的这封信被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现代学者视为极重要的文献，因为普遍认为，如果按这封信行事，叛乱的结果便可能有实质性的不同。[注]这种判断可由当时官员的警觉反应得到证明（尽管黄畹的劝告实际根本未被采用，太平军在3月中旬向上海发动了全面进攻）。即将离任的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薛焕立即将此信速呈朝廷。4月25日，朝

廷命令将此计划告知英法驻上海领事；并要薛焕及即将上任的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还着曾国藩查明黄畹下落，“迅速查拿”[注]。

不久，上海当局即得出结论：黄畹不是别人，正是王韬。但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外国雇主对此信毫无所知。在王韬离开一段时间后，慕维廉要他回来。王韬答应之后，慕维廉又担心，由于他在叛军控制地区逗留过久，可能会引起当局怀疑，便要权力颇大的道台吴煦写下决不伤害王韬的书面保证。但王韬返回上海后（大约是5月23日），却险遭吴煦手下的逮捕，遂立即到英国领事馆避难。当时的领事是王韬前雇主的儿子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这样，在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和总理衙门之间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外交交涉。总理衙门要求将王韬移交给中国当局，但为布鲁斯所拒绝。布鲁斯争辩说，5月6日吴煦做出安全保证时，当局肯定已经发现王韬即是黄畹，但他仍做出这种保证，纯系无耻地利用英国的信任。所以，问题不在于王韬是否有罪，而在于中国道台的无信。[注]

王韬在英国领事馆待了135天。10月4日，事情仍未了结，他秘密地乘上英国邮轮前往香港。[注]大约20年后，他才再次踏足上海的土地。

重审这桩历史公案

指控王韬的证据

人们可以争辩说，黄畹上书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意义被夸大了，因为在两年前，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洪仁玕便提出了类似的战略计划。[注]但在另一方面，这封信对王韬人生的意义，却未被夸大。所以我们必须把他即是作者的证据仔细审查一番。

首先，让我们来检查一下王韬自己的态度。在许多场合，王韬都痛苦地承认在甫里时与太平军有所接触，但却明确否认自己是那封信的作者。[注]另外，他强调与叛军接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政府的大计。苏州太平军任命的一些官员是他的旧识。他之所以秘密会见他们，是企望劝告他们说，此时为曾国藩部直接进攻苏州之前的关键时刻，所以应在叛

军中进行离间活动以表明对清廷的忠诚。这样，当政府军进攻时，将较为轻易地收复失地。

当准备返回上海时，他已得悉对自己的指控。但他仍无畏地选择返回。在一些年后给理雅各的自辩信中，他（带着通常的激情）写道：“盖进甘蒙陨首之诛，而退不甘受附贼之罪，退则犹可缓死，进则必无一生，而韬竟舍生取死者，其志亦断可识已。”[注]

在对黄畹上书进行仔细研究的太平天国学者中，只有吴静山接受王韬论述的表面意义，认为他无罪。[注]但吴的主要论点是如果王韬真有罪，绝不敢返回上海。但这一点很难成立。当王韬5月返回上海时，有两点他肯定十分明白：首先，他的建议不被太平军重视；其次，太平军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在这种情势下，王韬完全可能在得到确保安全的书面保证后返回上海，重过以前的生活。无疑，他曾预感到吴煦的保证不值得信任。但他也可能预感到，由于英国的威望，他会受到外国朋友的保护。

吴静山得出这一研究结论时，尚未见到黄畹上书的原件。这封信是1933年在故宫档案中发现的，并被影印发表。随后，谢兴尧、罗尔纲、胡适、简又文及商衍鎏都对此做了分析，一致认为王韬无疑是此信的作者。

此类证据很多。首先是姓名，黄畹，字兰卿，姓“黄”并不足虑，因为在太平军控制的地区，“王”字只有太平天国诸王才能用，所以，原本姓王的人或避讳写作“汪”，或写成“黄”。而在吴音中，名“畹”也与王韬的原名“瀚”字读音相近（王韬原名王瀚，当他到香港后才自改名为王韬）。而且“畹”字在著名的古诗《离骚》中，与王韬的字“兰卿”中的兰有关。而且，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根据，即在1862年，“兰卿”确为王韬的字。[注]

罗尔纲和谢兴尧把黄畹的信与王韬的文章做了全面的细致对比，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王韬有罪：（1）王韬与黄畹的个人经历一样（黄畹自称是来自苏州的儒生，但一直住在上海，而母亲、妻子和孩子全被送回家乡）；（2）文句相同；（3）这封信中力主和戎的战略，正是王韬19世纪50年代后期文章的经常主题[注]（读者可回想一下前一章讨论过的王韬给徐有壬的上书）。胡适和简又文提出了最确凿的证据，两人都

认为王韬的字迹与黄畹信中的字迹一样。[注]

当然，也并非不存在王韬所说他是受人陷害的可能。在上海的地方官中王韬肯定有不少仇人。他过度纵酒使自己的形象极度受损（经常酩酊大醉是他的重要弱点）。而且，他对官僚多有批评，并极不明智地为此向当局上书陈言，误以为他们将为之动容。但对像吴煦这样心胸狭窄的官吏来说（王的一些建议正是呈进给吴的），则将此视为冒犯。[注]但王韬被地方官陷害这种说法，是以三个非常不可靠的假设为前提的，所以在认真采用这种说法之前，有必要对这三种假设做一分析：第一，拥有全权的地方官没有更简单方便的方法对付王韬；第二，王韬的文风、个人经历、观点，甚至字迹，都为陷害者所熟知；第三，黄畹的信既没有交给太平军也未在王家寺被发现。对清政府来说，若此信送达太平军领袖手中，信中的想法就太具颠覆性了。而且，如果将此信交给太平军，并不能保证它会再次落入清军手中。[注]

王韬的动机

另一个方法，是考察一下使王韬冒此大险的动机。中国与别处一样，视背叛为大逆不道。

弗里德里克·布鲁斯先生曾提出一种可能，即王韬上书是为了保全家人性命。自1860年秋幼弟死后，他一直住在甫里的母亲就来到上海，与他一起生活。但1861年下半年，当上海受到李秀成军的进攻威胁而外国援军尚未到达时，王韬便将他母亲、妻子及两个小女送回甫里。甫里虽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却可免于战火。这样，为了确保他以前对清王朝的效忠（例如帮助训练团防）不至于伤害其家人的安全，他才写了这样一封同情太平军的信，交给太平天国苏州民务官刘肇钧。据信中表明，他与刘有私人交情。[注]

罗尔纲还提出过另一个可能，即王韬劝说太平军离开上海或至少延迟对上海的进攻，实际上是为英国人的利益效劳，甚至可能是受英国人指使。1861年春，英法官员溯水而上到南京去恳求太平军不要进攻上海时，王韬曾陪同前往。还有证据表明，在王韬的建议下组建了保卫上海的常胜军。[注]但这些都不足以像罗尔纲那样将王韬称之为“外国侵略者的走狗”。因为，如果说王韬在上海为英国人工作了13年后，就全部实际目的而言，他的利益与英国的利益密不可分，可能更近于事实。

在罗尔纲的解释中暗含着的一个前提更有问题，即只要王韬的行为在为外国人谋利益，就不可能为太平天国谋利益。但一些学者（如谢兴尧）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如果太平军遵循黄畹上书的建议，起义的结果可能非常不同。这当然不能说明王韬是太平天国事业的忠诚支持者。但同样，他也不可能是清廷的坚定拥护者。所以，最有把握的可能是，起码在1861—1862年之交这内乱双方胜负不明的瞬间，王韬实际上向双方效忠。

王韬此时的个人情境也能为这一结论提供佐证。虽然王韬以自己深通实务自诩，并有强烈的从政欲望，但他的建议却极少受到青睐。他自视甚高，却未得到与之相应的一官半职。王韬的一些密友却要幸运得多。在徐有壬死前（1860），李善兰曾入徐幕。另一朋友赵烈文（周腾虎的妻弟），在1861年夏即与王韬结拜后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当王韬看到他的朋友一个个志得意满而自己仍身陷困顿时，肯定会沮丧愤怒。当1862年初返回苏州地区受到刘肇钧的欢迎时（黄畹的信中曾提到此点），在太平军中功成名就的诱惑肯定十分强烈，足以战胜他对清王朝迟疑不决的忠诚。[注]

而1862年以前王韬与一些太平天国领袖的交往，无疑会使这种诱惑更具吸引力。但此点却为学界所忽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洪仁玕。1859—1864年间，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和密友。[注]当初起事时，他几经努力却未能加入，遂于1852年到香港避难。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他从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学习基督教教义。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主要就是根据洪仁玕有关他那颇有恶名的亲戚的早年历史的叙述写成的。

1854年5月，洪仁玕（受韩山文洗礼后）来到上海，希望与南京的太平军接触。但他的希望落空，只得滞留上海直到当年冬天。这期间，他与伦敦会来往密切，一连几个月“每日与麦都思博士读一小时书”。而此时王韬正是麦都思的主要本地人助手。[注]所以，他不可能不认识洪仁玕，尽管可能交往不深。王韬1854年10月29日的一则日记，则证实此点：“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注]

1855—1858年，洪仁玕回到香港，作为伦敦会成员被雇为传道师。除了继续钻研神学外，他还勤奋地扩展自己的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与之密切共事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后来王韬与他们的共事更为密

切）对他的评估，典型地代表了对洪仁玕的极高评价。理雅各的评价是“他不久就在自信和自尊的教会人员中，在与此有联系的中国教友中，树立了自己的声望。他的中文造诣使人敬佩；他的性格和蔼宽宏；他的思维特点具有一种中国人罕有的多样性。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知识突飞猛进。他对教义的虔诚毋庸置疑。”而据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的说法：“无论何时若你看到有谁长期与洪仁玕过从，均可以肯定他会获益匪浅。”[注]

1858年夏，洪仁玕再次前往南京。据理雅各说，他的主要目的是去纠正叛乱者的宗教错误，并敦请他们对外国人采取妥协政策。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途，洪仁玕终于在1859年4月抵达目的地。天王见到他的亲戚大喜过望，命他总理朝政，封为干王。

1860年夏，包括伦敦会的艾约瑟和杨格非在内的4名在沪传教士前往苏州（该城此时刚落入叛军手中）。目的是“得到有关起义者的意向和感情的消息……同时也交流……有关基督教的信息”。传教士们与李秀成洽谈。临走时，他们感到太平军的宗教承诺仍很强烈。艾约瑟和杨格非在王兰卿（Wung Lan King’s——原文如此）的帮助下提交了一份有关神学几个重要主题的论述，要李秀成读后转交给在南京的洪秀全。艾约瑟写道：“说明我们的正确方针是实话实说……不采用冷冰冰的语调。我们允许我们有才华的当地助手加工润色，使其形式、风格和抑扬顿挫更适合我们所知的叛乱领袖的文体，易为他们掌握。”

传教士们在苏州高兴地得知——洪仁玕在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中被授予高位。艾约瑟给洪仁玕修书一封，“提醒他记住从麦都思博士处得到的教诲”，并祝贺他“得到今天的尊荣”。这封信是“王兰卿（Wung LanKing——原文如此）起草的，他一直跟随我们，是麦都思博士在翻译《圣经》方面的助手”。[注]

回到上海后，艾约瑟收到了李秀成和洪仁玕二人的来信，称洪仁玕已从南京到达苏州，愿意会见他的前教会师长并恭候其驾。艾约瑟和杨格非立即赶赴苏州，在8月2日和3日与干王长谈。后者“善意地询问了上海中外故旧的情况”。传教士们于8月5日返回上海。他们“与干王相处甚洽”，并觉得他有关“基督教真理的知识异常渊博和准确”。而洪仁玕则要求他们派传教士到南京来，在民众中布道。[注]

艾约瑟提到的这位“有才华的当地助手”就是王韬，教会档案中登记

的是他的字“兰卿”。1861年3—4月，艾约瑟再次到叛区。这次到南京是为了“使叛军首领注意到教会在救世主和圣灵的神性上所持的观点”。根据他的日记，王韬这次又随同前往。[注]

把伦敦会传教士的记录与王韬日记结合起来，便使王韬与太平天国的联系这件事中的几点变得清楚了。第一，它们表明，在1862年之前，王韬起码有两次被派去与太平军领袖直接接触；第二，他曾两次帮助起草与其中两位首领交好的文件；第三，他与一度成为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第二号领袖人物相识，尽管其密切程度尚不得而知。所有这些都在向王韬表明，如果他与起义者共命运，获得权势和影响的机会要比站在清政府一边大得多。而王韬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传教团体，至少在1861年以前还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潜能抱有相当的希望，而这只能增大王韬上述举动的吸引力。[注]

道德准则对抗与背叛概念

像“走狗”“投机分子”和“叛徒”这种标签，若仅根据一个人的外在行动来描绘，往往全都能贴到王韬身上。但是，这却很难揭示一个人这样做的内在动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动机都是十分复杂的。而当行动者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多元的道德环境中时，则要更复杂若干倍。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困难并不在于冒犯某一特别准则，而在于各种准则的冲突，其中每一种都强求忠诚。”[注]

到1862年，王韬被抛进道德对抗和文化压力的大海中已逾10年。其他人都更舒适地逃避在传统社会中，仅把像太平天国这样的起义视为对一切珍重之物的可怕威胁。但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皈依者，又天天和并未对起义之事表示反感的西方人打交道，这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而对一个住在上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置身于其特有的道德混乱氛围中。在19世纪中叶，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西化的港口城市。它仍是交锋的前沿，“两种文明在此相遇……相争不下”。[注]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狭隘的信奉每日受到冲击，“贬损憎恨”（ressentiment）[注]最有可能转为公开的造反。根据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 Merton）的理论，“贬损憎恨”有三个连锁因素：（1）散布憎恶、怨妒和仇恨感；（2）不敢主动表达这种对某人或某社会阶层的反感，怕因此刺激他

们，所以有种无力感；（3）不断重新体验这种无能和仇恨。使“贬损憎恨”与造反区别开来的分水岭是，前者并不会带来真正的价值变换。取而代之的是引起一种“酸葡萄”模式，即断言内心盼望而又得不到的对象（就王韬而言，是科场和宦途的成功）实际并无值得珍视的价值。而另一方面，造反则会有一种真正的价值转换——对从前受到珍视的价值进行全面的指责。简言之，“在‘贬损憎恨’中，人们谴责自己私下想得到的东西；在造反中，人们谴责‘想要’本身。”注

也许，如果我们能简单得出结论——1862年，王韬在痛苦地经历了多年的“贬损憎恨”之后，完全转向了造反，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很清楚，事实远非如此。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把“贬损憎恨”和造反看作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而看作一个连贯过程，则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多么犹疑不决，王韬在60年代初期开始向造反方向移动。在人生的后35年中，王韬在行动上再未有过像1862年这样与造反者如此接近。但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对占统治地位的既成秩序的精神造反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并成为中国深远改革的最有力的辩护者之一。

---

1. 见弗朗兹·迈克尔，与张仲礼合著《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与文献》，西雅图，1966—1971年，卷1，第216页；芮玛丽，《同治中兴，1862—1874》，斯坦福，1957年，第98页。

2.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剑桥，1959年，第238—239页。

3. 同上，第242页。

4. 《甕牖余谈》几乎一半的篇幅考虑有关叛乱问题；《弢园文录外编》也有一些篇幅谈论这些问题。

5. 《瀛壖日志》，咸丰三年九月；《瀛壖杂志》，卷5，第13页。

6. 罗兹·墨菲，《上海，近代中国的关键》，剑桥，1953年，第10页。

7. 《蘅华馆日记》，咸丰五年一月初二；《弢园尺牍》，卷2，第17—18页；《瀛壖杂志》，卷3，第3页。

8. 《弢园尺牍》，卷2，第17—19页；卷5，第11—12页。《茗乡寮日记》，咸丰二年八月十六日。

9. 在1864年达到50万。见罗兹·墨菲，《上海，近代中国的关键》，第10页。

10. 《瀛壖杂志》，卷6，第7页。

11. 他声称，他的超然态度是因为他害怕一旦有事，将无人照顾他的老母。见《弢园尺牍》，卷2，第21页。

12.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7—18页；吴静山，《王韬事迹考略》，载《上海研究资料》，上海，1936年版，第682页。

13. 《弢园尺牍》，卷5，第12—23页。

14. 同上，第21—22页。

15. 《弢园尺牍》，卷6，第l—7页。

16. 同上，第7—10页。有关该信日期，见吴静山：《王韬事迹考略》。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9，第11页。

17.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8—10页。

18. 同上，第10—13页。

19. 王韬离返上海时间，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0页及《弢园尺牍》，卷6，第16页，王韬致理雅各信。《弢园文录外编》，卷12，第15、33页解释了《臆谈》的写作背景。该书共44章，王韬仅出版了13章，第一次是在1874年的《循环日报》上发表，后发表于《弢园文录外编》，卷12，第15—33页。

20. 《弢园文录外编》，卷12，第31—33页。

21. 同上，第19—20、20—21、21—24页。

22. 同上，第30—31页。

23. 同上，第29—30页。

24. 同上，第29页。

25. 同上，第17—19页；卷6，第28—30页。

26. 同上，第27—28页。

27. 同上，第24—25、25—27页。

28. 同上，第15—17页。

29. 《弢园尺牍》，卷7，第17页。

30. 传统主义的这一特征引自迈伦·韦纳的理论，见他所编《增长的动力》一书前言，纽约，1966年。

31. 所获信件细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年，第855页。

32. 同上，第845—846页。

33. 原件收入《太平天国文书》，北平，1933年版。

34. 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迹考》，载《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年，第186页；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上海，1962年，第89页。

35.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台北，1964年，卷1，第573页。

36. 《文献丛编》，北平，1930—1943年出版，第20期，第1—4页。

37. 《蘅华馆诗录》，卷3，第13页；《弢园尺牍》，卷6，第11页。

38. 《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与文献》，卷1，第156—157页。

39. 正先，《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载《逸经》，1936年，卷10，第21页；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1957年，第28页。

40. 《弢园尺牍》，卷6，第16页。

41. 《王韬事迹考略》，载《上海研究资料》，第671—676页。

42. 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迹考》，载《太平天国史事论丛》，第199页；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载《国学季刊》，1934年，卷4，第2期，第124—128页；《黄畹考》，载《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修订版，第112—115页。

43. 参见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黄畹考》。

44. 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卷8，第3期，第1—5页；简又文，《长毛状元王韬跋》，载《逸经》，1937年，卷33，第44—45页；《关于王韬》，载《大风》，1939年，第59期，总第1785页。

45. 《弢园尺牍》，卷6，第l0页。

46. 见罗尔纲，《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

47. 《文献丛编》，第20期，第2页；罗尔纲，《黄畹考》。

48. 见罗尔纲，《黄畹考》；《弢园尺牍》，卷5，第16页。

49.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第86—87页。

50. 《清季名人录》，卷1，第367—369页。

51. 《教会杂志与编年》，卷24，第277页。1860年出版。

52. 《蘅华馆日记》，咸丰四年九月初八日。

53. 引自《洪仁玕：太平天国总理，1859—1864》，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第1—2期，第262—294页，1957年。

54. 《教会杂志与编年》，卷24，第271—278页，1860年。

55. 《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与文献》，卷3，第1111—1116页。

56. 参见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

57. 《教会杂志与编年》，卷25，第198—209页，1861年；卷26，第283—288页，1862年。

58. 海伦·M. 林德，《认同启示》，见《现代社会理论种种》，亨德里克·M. 罗德贝克编，纽约，1963年，第19页。

59. 《上海，近代中国的关键》，第8页。

60. “ressentiment”尤指用贬低所憎恨的对手所重视的价值观念来表示不满。——译者注

61. 罗伯特·K. 默顿，《社会结构与反常》，见《现代社会理论种种》，第389页。

第三章 流亡岁月：香港与欧洲

当王韬与太平天国的调情成为往事之后，一些朋友将此视为笑谈，戏称他为“长毛状元”。[注]但对王韬本人来说，这一事件却绝非玩笑。当他的母亲在忧伤中去世时，他仍囿禁在英国领事馆中。他被迫离开上海后，便与人数甚多的朋友圈和这座他渐渐喜爱上的城市分隔开了。现在，在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任何希望都不复存在，因为在香港不可能成为高官。在这块英国殖民地，王韬最初几个月的作品中充满了自责，以及对自己命运的悲叹。他的精神痛苦往往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位学者相信他可能经历了短期的精神崩溃。[注]

翻译经典：与理雅各合作

开始，王韬总是抱怨香港（他于1862年10月11日抵此）的生活条件：民众粗俗不堪，语言尚未开化，食物难以入口。虽然伦敦会提供食宿，但他仍然经济紧张。由于家人和书籍仍落在上海，孤寂自怜之感总也无法排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渐有改善，他的个人生活也颇为惬意。当年底，他的家人前来与他团聚。不久他的书也运来了。另外，他还开始定期到广州去，并很快结识了一帮新的文友。[注]

但很可能是与极有天赋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合作，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使王韬能忍受在香港的生活。理雅各1815年诞生于苏格兰北部的一个非国教家庭。完成大学教育和神学训练后，他加入了伦敦会，被派往马六甲。在那里，他所任的最高职位是英华书院校长及该会出版机构的督察。他勤奋地钻研中文。其拉丁文造诣早就说明了他杰出的语言天赋，所以当他1843年到达香港时，他对中文已有相当的掌握。在这块英国殖民地，理雅各开始了“把全部儒学经典”译成英文的艰巨任务，“以使……我们在人民中的传教工作应有足够的精神指导，以便能确保永久的结果”。[注]他翻译的《中国经典》第1卷出版已逾百年，尽管有种种不足和生硬之处，但其译本至今仍为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视为标准本。

在王韬离沪之前，他已被安排好去给理雅各的翻译工作当助手。还在19世纪50年代初为麦都思当学术助手时，王韬就在把西方的“道”传输到中国的工作中起过关键作用。现在调换一下，在把中国的“道”传输到西方的工作中，他又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若干年后，他显然对沟通两种文明的后一种工作更感愉快。他写道：“宣圣之道居然自东土而至西方，将来《中庸》所言当可应之如操劵。”[注]

王韬为理雅各工作了近10年。虽然起初他认为理雅各过于严厉，令人望而生畏，但这最初的印象马上被某些更好的印象取代了。而理雅各对王韬的一些缺点也更能宽容，视而不见（对教徒来说这些缺点是很值得重视的），两人遂很快成为朋友。[注]

在19世纪，对经典的解释有一些互不相同的重要学派。一向折中的王韬决不拘执于任何一派。还是十几岁时，他就给一位朋友写道：“夫考据祖孔、郑，理学宗程、朱，两家自分门户。而学汉者伤胶固，师宋者病空疏，则又失之一偏。”[注]王韬认为理雅各也具有这种折中性（可能部分是受了他的影响）。王韬告诉我们：理雅各“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中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注]

王韬到达香港时，包括理雅各所译《四书》在内的《中国经典》第1、2卷已经印行。理雅各正做第3卷《尚书》的准备工作。在第3卷前言中（写于1865年7月12日），他指出王韬的贡献值得重视。他写道：“彼于1862年岁暮抵港，于吾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利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苦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注]

在随后的翻译准备中，王韬的贡献更大。尤其是《中国经典》的第4卷《诗经》（于1871年首版）、第5卷《春秋》和《左传》（1872年首版），还有1885年首次面世的《礼记》。在这些卷中，经常可以看到王韬的注释。[注]另外，应理雅各的要求，他曾广集各家评注，对那些冷僻著作中的评注尤为注意，以免为外国学者忽略。[注]理雅各对这些辑录极为赞赏。最典型的是他对《毛诗集释》的反应：“这一文本本没有可用的资料来源，这便意味着作者原来不必做此贡献。但作者仍勉力搜集了124部作品，其中几乎没有几篇是专门评注《诗经》的。而我之所以能完成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我希望作者能将这部

著作出版印行，以有益于他的同胞。”[注]

1867年理雅各因健康欠佳暂回故里，翻译工作突然中断一段时间。理雅各不久来信邀请王韬去苏格兰。王韬于年底将家人送回上海后，便由海路赴苏格兰。二人于1870年3月回到香港，这样理雅各便能亲自监督最后两卷的印行。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只能说，经过密切合作多年之后，理雅各对王韬的评价更高了。他在187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印就380页（第4卷），但开支颇费，每月约需105元，其中20元交付给我的本地助手王博士。有时为节省开支不想再用他了，因为常常整整一个星期不需向他请教。但有时则非他不可，尤其是迻译诗序，他的价值更为明显。只有第一流的本地学者才对我有价值，而在此我找不到任何人能与之比肩。”[注]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定居，而这使19世纪一个中国人与一个西方人之间最引人瞩目的关系随之结束。理雅各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的首任汉学教授。1877年他开始准备翻译《易经》，再次邀请王韬前往。但当时王韬已开始了新的生涯，未接受此邀请。[注]

王韬在经典研究方面的贡献，并不限于帮助理雅各。的确，就中国方面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19世纪60年代末在理雅各的苏格兰家中所作的有关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食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精确确定这一时期的编年是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王韬在传教士汉学家湛约翰的影响下，成为可能是第一个求助于西方天文数学知识探究这一问题的中国人。理雅各对王韬的一篇这方面的论文评论说：“肯定根本没有一部有关春秋编年的中文著作能与之相比。”[注]在中国天文史研究方面居领导地位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声称，他在研究春秋历法时用了王韬曾经用过的方法，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王韬的著述也被称赞为“划时代的”。[注]

教会对王韬世界观的冲击

在王韬1867年前往欧洲时，他有可能回顾一下与新教传教士几乎20年未曾间断的联系。对当时的中国学人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它对王韬的世界观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冲击的实质是什么呢？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倾向于把中国看成一个世界，而非一个民族。所以，它不可能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例如法国可能视自己为欧洲的主要部分。如果说中国并未完全囊括“天下”，那么，它起码囊括了“天下”所有应囊括之物。所以，当西方人还没有弄懂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便强要他们步入世界时，中国人就或只能在慌乱中闭上眼睛，或为这种冒犯无礼的邀请所震怒。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这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便是王韬降生时的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自我包容的宇宙，所以对民族的概念极为陌生。中国人若要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应先知道世界上还有某些非中国的价值，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而尊重自己。注从这个角度说，意义深远的是，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像郭嵩焘、王韬、郑观应、洪仁玕等一小批人越来越为一种民族国家的世界观所吸引。他们在对西方的态度上，奇异地混杂着强烈的憎恨和远非忌妒的尊重。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ic）的仇外者具有这种憎恨感。但对缺乏某种特别经历的人来说，却很难产生尊重感。

这种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对西方的有意义的了解，即通过出游、与在华西方人密切过从或通过书报（19世纪末）的了解。王、郭、郑及洪对西方都有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了解。就王韬的情况而言，这更为强烈。自1849年后就与王韬打交道的传教士们均非等闲之辈，完全可以把他们概括为新教在华传教团体的学术精英。

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他们也沿着现代路线改变中国；其中一些（突出的例如伟烈亚力、艾约瑟和慕维廉）甚至积极参与扩展中国人西学知识的活动。他们（可能慕维廉除外）与其他大量普通传教士的关键不同点，在于其真诚地崇慕中国文明，并认为它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已经提到过理雅各和湛约翰的汉学贡献。麦都思除了编辑词典帮助学习官话、闽南话和口语外，还是第一个试图着手翻译《尚书》（上海，1846）的人。注艾约瑟对中国佛教深感兴趣，在当时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范围极广的有关深奥神秘问题的文章。注伟烈亚力则以整个中国文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的丰碑式的《中国文献记略》（上海，1867），概述了二千余部中国的主要著作，至今仍未有替代性读物。注

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的崇敬并未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西方文化

的信仰。此点颇为新颖。因为18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想把基督教神学与儒学伦理和谐地熔为一炉；而19世纪的传教士知识分子则与之不同，始终与儒学保持一定距离。理雅各对孔子的看法颇具代表性："我知道……我对他及他的教诲渐渐极为敬佩。但我却不能颂扬他。我所承担的工作使我有必要为我自己并帮助别人理解中国的宗教、道德、社会和政治状况，并找到、提出实现改良的最可行之法。但改良的最大障碍是它的学者和政府对孔子的信仰。"[注]

王韬不可能把他的西方朋友视为蛮夷，因为他们对中国圣贤的教诲有深刻的了解。但又因为他们仅把儒学教义视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生活的真理宝库，所以他也不可能把他们视为儒者。不难想见，这会怎样影响他并使之疑虑。它未使王韬沉溺于只有中国才是文明之邦的惬意想象之中，反迫使王韬沉思一个远较中国更为广阔的大世界。对王韬来说，随着对这种广阔世界的知识不断增长，对之渐生崇敬之意，要简单地把中国等同于文明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中国仅成为文明的各种形式中的一种。这样，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便同时奠定。

王韬世界观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在他19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中，对西方文化大体取否定态度。此时他仍反对扩大外贸、采用西方技术（虽承认优于中国）及研究西方科学和数学。的确，在他的眼中，除了火器船舰（仅为海防）和西方语言之外，学习西方对中国并无益处。

到香港后的一段时间内，王韬对西方的挑战仍未过多注意。1863年他与友人黄胜把一些西方火器资料译成中文。黄胜是与容闳一起赴美的首批中国留学生，也在香港墨海书馆工作。[注]但他们编辑此书的背景仍是为了平息华东地区的太平天国叛乱。[注]只是当这次规模巨大的反叛在1864年最终失败后，王韬的关注才明显转向长期的西方挑战。在1865年为一位朋友（明显为黄胜——原注）写的上李鸿章书中，表明了王韬思想自50年代以来发生变化的程度：

>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西人来此……薄视之者以为不人类若，而畏之者甚至如虎。由是西人之事毫不加意，反至受其所损，不能获其所益……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为吾利。毒蛇猛蝎立能杀人，而医师以之去大风、攻剧疡。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

计，是见噎而废食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弢园尺牍》，卷7，第2—3页

王韬还提到日本说，虽然它与美国通商不过几年，但已能制造武器、船舰、火车和机器，而质量与西方产品一样。缘何中华大帝国未能取得一个小小岛国的成就！

王韬这封信的主要部分是有关如何重建他的家乡江苏省的，因李鸿章当时是两江总督。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国内方面，绝大部分的中国改革思想仍以保守稳健为基调。这是同治中兴（1862—1874）时代。经历太平天国造反之后的中国领导层深受震惊，备感沮丧。在重新恢复儒教秩序的努力中，他们自然倾向于寻找战前的稳定背景。例如，在经济恢复方面，中兴思潮中压倒一切的思想是重振传统经济。以减缩开支、兴修水利等可行方法恢复农业，而且还认为农业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经济成分。王韬的建议则与这种观点尖锐对立。他修正了自己早先的观点，提出制造西方式的农业机械和纺织机器，并要教中国农民如何使用。他还敦促说，应让中国商人认识到轮船运输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商人应采取新的态度。

王韬继续写到，一些人可能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若中国在水路引入轮船航行，在军队引入西方火器，用现代农机和机纺以提高农产品和纺织品产量，让官吏学习天文、科学、西语等等，终将使这个国家西化。王韬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将对西方的仿效局限于这些西方较先进的技术方面，就不可能损害中国的风俗人心。

另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是，如果中国吸取所有这些西方长处，中西关系将变得如此亲善和谐，以至于西方人将在中国无限期停驻。对此，王韬的回答是，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获利。当中国用机器生产大量商品，并种植罂粟以迫使进口鸦片降价时，西方利源将逐渐丧失。这样，当待在中国的物质刺激消失之后，完全可以肯定西方人将离开中国。注

到1865年，王韬在上海和香港这类西化的城市已居住了16年，并一直与西方传教士密切共事，影响是明显的。他远远站在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之前，认识到西方挑战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采用史无前例的

应战方法。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发现王韬在6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一种文化世界观过渡到民族世界观的艰难历程。在这封上李鸿章书中，他强调，“握利权”“树国威”，并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竞争。这标志着他对中国的世界位置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他到西方的出游，将使这种转变走得更远。

王韬在欧洲

王韬可能是现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一小批与传教士有联系的广东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容闳、黄胜及黄宽等人，曾在西方受过教育，但他们却不像王韬那样曾经深浸在中学之中。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有更为正式的儒生作为学生或外交人员到欧洲和北美做长期访问。

王韬于1867年12月15日乘轮船离开香港。在船上克服了最初的晕船不适后，他很快就与两位同行者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位是法国医生，另一位是德国船长（他对中国文明略有所知）。该船在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和苏伊士等处停泊靠岸过。每一次王韬都与同伴离船上岸观光。王韬在日记中对所经历的一切都做了详细记载，这位热情的旅行者对他所观察到的新加坡华人效忠祖国的方式、锡兰佛教的独特之处、亚丁对英国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及其他任何吸引他的事情都做了深刻的评论。

对于像王韬这样钻研过《圣经》文献的人来说，乘车从苏伊士到亚历山大（在开罗停留3天）自然格外有魅力。王韬在日记中仍找空细说了以色列子孙的出埃及记。[注]

1868年元月份穿越地中海的6天颇为辛苦，最后到达马赛。由于还未到过巴黎和伦敦，马赛对他来说便非同小可：“楼台金碧，皆七八层……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注]在一位西方朋友的陪伴下，王韬乘马车游览了这座城市，对街上的车水马龙和市场商品的丰富，印象极深。

马赛与巴黎间的距离大致等于从广州到福州的距离。王韬乘午夜火

车离开马赛，并于次日中午到达法国首都。王韬在一位英国人的陪伴下，在巴黎观光了大约一周。这座城市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使他着迷，二者皆中国所无，他在卢浮宫内久久徜徉。夜晚，他遍访该城极为著名的娱乐处，曾几次观看歌剧。他的一位向导曾在巴黎的一家豪华饭店为他举行宴会，使他在巴黎的停留增光不少。[注]

对一个曾见到他的祖国在英国武力下两次屈服且成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一座由英国财富主宰的城市中与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密切合作的中国人来说，只要出游到西方，伦敦肯定是皇冠上的宝石。这恰如王韬对这座城市走马观花后颇有些粗俗的感叹："盖英邦实为西土之沃国，而伦敦又为英国之腴区焉。[注]

王韬在英国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伦敦一家照相馆听说他的光临，便说如果照相馆的墙上能悬挂他的相片，他们将感到十分荣幸（由于默认了这种赤裸裸的商业主义，他免费得到12张他本人的相片）。稍后，王韬有一次在阿伯丁街上曾被一群儿童尾随，他们尚不习惯中国服装，误以为他是一位正在欧洲旅行的中国"巨人"的妻子，大声喊道："中国太太！"王韬半是幽默地叹道："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以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注]

仍是在伦敦时，王韬曾出席一个更为严肃的场合：被邀请去牛津大学毕业班演讲。王韬说汉语，大概是由理雅各任翻译。他以"现时代的中外交往"做演讲主题。在结束时，他希望班上第一流的人才到政府中做高官，而学问稍差的则去传播圣道（基督教）。（我们可以肯定，出于对理雅各的礼貌，王韬演讲时一定措辞谨慎。）据王韬自己说，"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

随后，一些听众要他把儒学之道与天道（基督教）做一比较，他的回答是：

>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漫游随录》，第9830—9831页

虽然王韬的跨文化简化论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源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但世界大同的观点终将成为他最喜爱的论点之一。

还是在他到伦敦不久，理雅各就前来迎接，并带他参观了热诚旅游者所有应看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王韬曾与中国收藏部主任交谈）、杜莎夫人名人蜡像馆（内有使人惊讶的林则徐蜡像）、圣保罗大教堂（从其顶部王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宏伟景象）等等。王韬开明而富于睿智，愿意向能教他任何一点儿东西的任何人学习。他告诉我们，只要他乘火车去水晶宫参观（共有4次），他总要下车在路旁的一家小酒店喝酒，而且总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吧女招待他，并不停地问他有关中国的事情。有次，碰巧这位姑娘的父母也在，王韬便热情地向这位留胡子的火车司机打听铁路给英国带来的益处。王韬得知，开始每一个人都以为铁路将使牧人和车夫失业，使居民生活更苦，但不久，每个人都明显认识到，铁路除了有利于公众安全和战争外，还是国家与人民的财源。王韬喝完酒之后，这位火车司机陪他走回车站，并指着一列车对王韬解释说，在发明火车初期，迅速转动的车轮产生的火花时常引起火灾，后来有人发明了冷却剂，才使火车走很久而车轮仍不发热。王韬的反应是：“泰西制造精微，于此可见一斑。”[注]

王韬又从伦敦来到理雅各的家乡杜拉。此地一向主要以学术和美丽的山景著称，是苏格兰中部克拉克曼南郡的一座小镇。王韬在此旅羁两年，潜心译书。但他仍有充足的时间到附近乡村漫游。而且，有几次与理雅各一起做了较长的旅行，到爱丁堡、格拉斯哥、雷斯、阿伯丁及理雅各度过童年时代的哈德利。

在爱丁堡，王韬与老友慕维廉重叙旧谊。慕维廉带他去参观大学。当时正在进行考试，而一个中国学者到考场来访，确有新闻价值，登上了次日晨报。在日记中，王韬专门提到参试者必须考数学、兵法、天文学、地理学、书画音乐和外语这一事实，赞赏道：“故英国学问之士，俱有实际。”

在爱丁堡期间，王韬还参观了医院、公共浴池、法庭（正在开庭）及一个大印刷所。以其过去经历而言，最吸引他的当是印刷厂。该厂雇佣1500多名男女员工，可以新的化学方法每天生产几千字型。而且，从

铸字到印刷装订全部机械化。[注]

还有一次，王韬与理雅各一起到湛约翰在阿伯丁的家中小住。此时王韬正研究春秋历法问题，与湛约翰的讨论对他大有裨益。虽然阿伯丁的寒冷沉闷使他受不了，但他却对其著名的花岗岩矿采石工，尤其是用机器切割磨平花岗岩印象深刻。王韬还偷闲去参观了一个大纺织厂，注意到其机械化程度极高：大约2000名工人只需从机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人但在旁收纵转易而已”。

在阿伯丁逗留三天后，王韬又与湛约翰、理雅各去理雅各在哈德利的家。在此，王韬被当地教堂请去演讲，由理雅各翻译。正值此时，理雅各家族中的一位长者去世，给王韬一个始料未及的首次参加西式葬礼的机会。随后，他们又到苏格兰东部沿海的商业城市邓迪旅行。在此间，王韬再次注意到机器对地方工业的影响。[注]

返回杜拉3个月后，王韬又去格拉斯哥做简短旅行。然后，他们最后一次游访了为其非常喜爱的杜拉乡村[注]，便于1870年元月5日与理雅各及其女儿玛丽一起开始了返回中国的漫长旅行。他们一路优哉游哉，曾在爱丁堡久留，使王韬得以拜访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刚从上海返回的前伦敦会传教士）。他还曾应理雅各之邀，在该城一座教堂两次演讲，宣讲儒学。从爱丁堡到伦敦途中，他们还拜访了王韬的第一位教会师长麦都思的遗孀。途中他们还有机会参观英国监狱，与中国监狱相比，其条件之佳使王韬深受感动，竟将其比作乐园。在伦敦，他受到理雅各的朋友们的热情款待，其中一位是著名的造纸商。在参观此人的造纸厂时，他对纸浆造纸的速度和纸张切割码放的整齐深感震惊。[注]

王韬自称，在离开英国前他将随身携带的书送给了伦敦的一家博物馆（据说合计有11000卷）。几乎可以肯定，所说的是大英博物馆，但该馆有关这类事务的唯一记录是一张以65.1英镑的价格收购王韬203本书共712卷的发票（日期为1869年10月）。[注]

王韬途经巴黎的高潮是在索邦对法国资深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拜访。王韬对儒莲的丰硕汉学研究成果素表钦佩，在英国时曾与之通信。儒莲以法国式的拥抱欢迎王韬的到来。可能是由理雅各翻译，他们兴致极高地畅谈了几个小时。一些年后儒莲去世，王韬以一篇

充满赞美之辞的传记表达了对这位法国朋友的敬意。[注]

1870年3月，王韬回到香港。在国外生活的28个月间，他时时患思乡病，有时极为沮丧。他往往用纵情享乐来取得心理平衡，以抑制乡愁。在一篇日记中他对此点评说道："余处境虽厄，而游览之奇、山水之胜、诗文之娱、朋友之缘亦足以豪，几忘其身之在海外也。"[注]王韬的旅途见闻为他的许多短篇故事提供了背景和主题，在他生前就出版了三部这类故事的集子。这些故事半是事实，半是编造，主题大都是佛教轮回报应的陈词滥调。其作品风格模仿新近流行的清初作家蒲松龄（1640—1715）所写的故事，它们在19世纪最后10年销路极佳，使王韬获利不小。[注]

王韬的旅游并未使他对西方的看法发生激烈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在他离港之前便已发生。不过，这却对他新的职业准备起了重要作用。正如现在做某一地区研究的研究生要以"在这一地区"生活一两年进行训练一样，王韬在欧洲的经历使他对欧洲的生活和文化现实有了具体的感受。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别人也会和王韬一起为采用铁路、现代工业等等辩护。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王韬本人实际乘坐过火车并参观过范围极广的各种不同工厂。随着王韬越来越下力向中国人写作介绍西方，这种直接的切身实感使他优于同时的其他"西化论者"。

王韬与中国近代新闻业的缘起

王韬回到香港时已41岁了。20年来，他一直依靠西方人为生。而且，虽然他为教会雇主的服务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但很少有真正可称之为他自己的东西。直到目前，他的工作生涯还只能算一种学徒生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很清楚究竟是在学哪一行。他并无职业。由于荒废了太多时日，理雅各一去欧洲，他就变得生活无着了。面对此种惨境，王韬几乎一到香港就开掘了他的两笔巨大财富：他的文才和无与伦比的西学知识。

王韬为他的中国同胞的地方主义深感震惊。这种地方主义在官修《明史》中最为典型，结果把法兰西与南海中的诸岛国混为一谈。王韬遂在1868年给儒莲写信，邀请这位法国学者和他共同研究法国史。[注]儒莲未接受邀请。但王韬并不气馁，开始独自研究，并于1871年完成了

介绍法国历史的《法国志略》一书凡14章。此时他紧张工作，还辑录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长篇记录（这些将在第五章讨论）。

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作为使王韬深受鼓舞，他与其频繁通信。经丁日昌及他的另一官僚朋友陈兰彬（不久成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的努力，王韬的才干引起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注意。他差点儿就要被任命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任职。但曾国藩却于1872年3月去世，而李鸿章的试探亦表明，地方上仍反对王韬回到上海。[注]

大约就在此时，王韬决定以写作为生。他做出了命运攸关的重要决定——以新闻为业。对王韬来说，这是一种自然选择。他除了喜欢冒险和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感兴趣外，还具有报业人员的典型素质——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主义、既有革新精神又有精明的商业头脑。王韬与麦都思（麦氏起初就是从事出版工作的）、理雅各的共事，使他对出版业相当了解。而且，在60年代中期协助理雅各工作的同时，他还兼任过《近世编录》的编辑。该报是《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的子报，据布里顿（Britton）说，这份报纸“不但对近代华南报业的发展颇有影响，而且对上海和海峡殖民地的华文报纸都有影响”。[注]

王韬与尚在襁褓中的中国新闻业有重要的联系。在编辑《普法战纪》时，他的两个主要合作者张宗良和陈言（陈蔼廷）都是外国人所办报纸的翻译。陈言是位极有趣的人物，他同样被西方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他的香港同胞的“买办性”所激怒。他相信，中国要生存必先强盛，而要强国必先醒民。所以，1864年他从一些传教士处买来一些铅字，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华字日报》。虽然该报由《德臣西报》印刷发行，但编辑方向主要由陈言控制。后来，陈言改任中国驻华盛顿使团成员及驻古巴总领事，此报便由他的儿子接管。

虽然《华字日报》是一家最为成功、最为长久的中文日报（直到1940年才停刊），但它长期以来一直需要各种帮助。据说伍廷芳和何启二人给这家报社的资助尤大。王韬与此二人都很熟。[注]何启（1859—1914）是一位与伦敦会有联系的中国商人和牧师的儿子，早年曾在香港受教育，后又到英国进修医学和法律。他是香港最杰出的华人之一，也是最早宣传中国政治需进行重大改革的人。伍廷芳（1842—1922）是何启的姻兄，亦与陈言有联系。与何启相同，他早年也在香港上学，后又到英国学习法律（1874—1877）。他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中的重要

作用，往往因其在清朝末年任驻美公使和民国初期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而被忽略。

何启、伍廷芳，还可以加上容闳、黄胜及其香港澳门马礼逊教育会学堂的同学唐廷枢（1832—1892），成为一种“口岸华人”的全新代表。他们在许多方面不是与王韬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所结识的那些口岸知识分子，而是与孙中山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与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的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来自广东南部——中国与西方接触最久的地区。他们大部分也都更为年轻。他们均倾向于成为头脑清醒的行动者，而不是书生气十足的偏执或神经质型的文人。他们从小在由西方人开办的中国学校学习，后到外国学院或大学深造，对中国学术和文学所知不多。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耶鲁，1854），在返华时实际必须重新学习说汉语。何启的文字功夫也极差，所以需要一个合作者使他的中文文章能达到发表水平。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允许，这些人往往不倾向于（像容闳和何启那样）娶西方妇女为妻，但却公开声明信仰基督教。他们多采世界主义观点，又是得风气之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更多地效忠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儒家文化。[注]

很难说这些条约口岸的新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代际变化的后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地理背景不同的结果。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王韬虽无疑属上海文人圈而非香港那类人，却能与双方和谐共事，且从两者那里获益。1873年，王韬与监管香港墨海书局20年的黄胜，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以1万墨西哥鹰洋的价格合资买下该书局的印刷设备和字型，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即用此设备印行了自己的著述（如《普法战纪》）。但这一新的印刷机构最重要的功能，则是出版了王韬的报纸。[注]

在黄胜和伍廷芳的帮助下，《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4日创刊。[注]报名“循环”，意味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天体运行）。王韬选用此名，明显反映了他那循环史观的深刻背景，也说明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当然，事情并不像王韬的20世纪的同胞乐于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这些人热衷于把他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革命家）。王韬此举并不意味着在以太平天国为招牌的革命遭到暂时挫败之后，革命种子又由这份报纸再度传播。[注]

《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注]

作为该报的合办者和主编，王韬从一开始就是其灵魂核心。他的女婿钱徵曾一度襄助，钱与上海新创立的《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办）有关，被派到香港了解当地报业概况。但他不久就返回上海，任《申报》主编。从1875年到1884年，王韬的主要助手是一位广东秀才洪幹甫，此人从前曾在巡抚蒋益澧手下任职。另外，尽管胡礼垣在《循环日报》发展史中的作用不如钱徵或洪幹甫重要，却可能比他们更出名。胡的中英文均极佳，所以在1879—1881年间为该报翻译。他后来成为香港一名富商，并因19世纪90年代成为何启的文字秘书而闻名。

除星期日外，《循环日报》每天出版，定价每年5港元（或每月0.5港元）。除广告和公众启事外，它包括两类新闻：商业性的与一般性的。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香港这种商业城市价值极高。所以，经济版（印在当地纸上）打在前头，并比一般消息栏多1倍。可能正是由于经济版适应了香港—广州—澳门地区华人贸易稳步增长的需要，遂成为王韬报纸的主要收入，使其能维持独立。

一般消息印在进口纸上，约占总版面的1/3。它又分为3小栏：（1）首栏汇录“京报”（直到清王朝覆灭前，中国报纸一般都是这样）；（2）广州与广东省消息；（3）中国其他地区和外国消息（二者主要摘自香港外文报纸）。

王韬是位进取型的企业家，锐意创新。《循环日报》创办第二年，他增加了每月增刊（每年1港元），将有关重大事件的消息汇集成册，但后来由于销路不佳而停刊。较为成功的尝试是从1878年起将《循环日报》改为晚报，由此比与之竞争的其他报纸提前12小时发行。这是香港的首份晚报。但是，由于晚报的编印赶不上到广东和澳门的末班船，所以在1882年又改为晨报。

在中国近代新闻业初期，出版报纸仅是为了获利，很少对某问题表态或影响群众舆论。王韬的报纸却是少见的例外，经常刊登社论，且多出自王韬本人手笔。其中精华之作，于1883年被汇集成书发行。王韬时时以社论抨击清廷的官僚（在外国法律保护下，他能不受惩罚），宣传改革，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或仅仅传播外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社论是以优雅自然的文风写成，它们虽然没有几十年后梁启超的文章那样风行，但其简洁明了的程度却足以供尽可能广泛的中国文化人阅读。

王韬深知报纸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并为它在中国的无足轻重而愁

叹。他感到，报纸除了作为一般收集传播有关各种事情消息的载体外，还应起到对政治领域的种种批评作用。例如，王韬知道西方政府对公众舆论很敏感，所以力劝中国驻外使节应有翻译西报的雇员。把重要篇章译为中文递送总理衙门，这将对外交大有裨益。[注]

王韬曾有几次进一步建议说，中国应在有关中外关系的事务上设法直接影响西方舆论。他发现，在华的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外关系消息时一边倒地倾向西方。这种扭曲又传到西方的报纸，因这些报纸的新闻来源依赖中国口岸城市的记者。所以，西方公众并不能得到中国方面的真实情况。王韬提议，中国应在欧洲发行西文报纸以改变这种状况。这样，一旦西方列强待中国不公时，西方公众舆论将动员起来，向有关政府施加压力。[注]

在国内事务方面，王韬也认为日报可起重要作用。在1862年的《臆谈》中，王韬即对中国君民之隔如此深巨表示失望（见第二章）。实际上他在梁启超之前就认识到，报纸是缩小这种隔阂的最佳手段。报纸不仅能把官方消息最大限度地下达，也能把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上传。王韬举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巴黎的主要报纸为例说，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注]对于像王韬这种未能以传统方式追求权力和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报纸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新途径。

当洪士伟参加《循环日报》后，王韬便摆脱了许多与管理有关的日常工作，有较多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写作出版。[注]但直到临死前，他始终继续从事新闻事业，而且所接触的新闻圈不断扩大。1879年他到日本访问了4个月，与栗本锄云（1822—1897）、藤田茂吉（1852—1892）及《报知新闻》（日本当时的主要报纸）的其他人员成为好友。[注] 1884年王韬到上海后，曾任该市最受重视、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纸《申报》的编纂部主任。[注]在19世纪90年代前半段，他是具有改革倾向的教会报纸《万国公报》的经常撰稿人。[注]

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罗斯威尔·布林顿断定他是“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他对中国报纸的贡献恰如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林语堂说王韬是“中国记者之父”。洪琛认为他是编写大师，甚至在20世纪的新闻圈内也难找到胜过他的人。[注]

但是，王韬的现代评论者们只注意到了王韬在新闻领域所取得的地位，而忽略了其报人生涯的更广阔意义。在王韬之前，“达”在中国通常指成为高官。王韬的人生早期也有这种心理，他对仕途的茫然悲叹清楚地表明其对未能进入官场的失望。但随着时光流逝，王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他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得到同代人越来越多的承认。由于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他的社会价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这样，他就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如吕实强所说，他表明了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注]

历史与个人经历的汇合

历史环境与人物经历的独特汇合，能使一个人与熟悉的文化模式决裂，而寻求新的道路。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中正处于重大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为沉重的问题和空前的挑战所困扰。进行根本变革的可能性，也被前所未有地提了出来。但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极少中国人会接受这一点并据此行动。为什么王韬就不一样呢？

这确是个困难的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它。当然，这部分是来自天赋。《万国公报》的编辑者林乐知（Young J．Allen）认为，王韬是“中国最有才干的人之一”[注]，其他人也同意这一判断。[注]

这部分还由于王韬比其同代人对西方的挑战有更直接的了解。生活在上海和香港、到欧洲和日本旅游、与西方人一起密切工作等等，都使他能较为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发现变革的必要。同时，他对西方文化又十分熟悉，使他能够发现使变革成为现实的手段。

最后，成年的王韬发现，自己所面临的个人的十字路口，与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紧密交叉。王韬达到了这条路线的终点，一个死亡点，就他而言，重弹此种老调确有意义。在他1880年所写的自传中，有一段话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 老民（王韬的别名）有弟曰利贞……读书未成名而卒，年仅二十有七。有姊曰媄……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杨氏梦蘅……

娶仅四年殁于沪……老民无子，有女二：长曰婉……归吴兴茂才钱徵，早殒；次曰娴……生不能言。呜呼！老民既无子矣，而复夺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自始祖必宪至今二百七十余年……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从侄三人，相继夭殁。于是自明以来，巍然硕果，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天不独厄老民，而或将并以寿王氏也，恐王氏一线之延，至老民而斩矣。噫嘻！不大可痛欤？注

由此，王韬对一个愚蠢地拒不承认他的才华的制度的憎恨之情，便与对拒不赐他儿子使其不能尽孝道之责的不仁慈的“天”的忿恨之情，就融合起来了。对于前现代的中国来说，这种尽孝的责任极为重大，由于未能尽责而引起的心理压力必然很强。假如王韬具有深刻的宗教感，这种压力能够稍稍缓解。但他并不是这种人。从他70年代初期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便可证明此点。这封信详细说明了他对生、死、死后之生的观点。虽然信中所说的宗教专指佛教，但信中表现出极强的怀疑论精神，使我们对他的基督教也可作如是观：

大千世界，无量众生中，有一我蝨于其间……天地间有一我，人不为多；无一我，人不为少……我父母死，我不能与之俱死，饮食衣服如故也，游戏征逐如故也……人生则气聚，死则气散，既死后之有无，不得而知。佛氏所云轮回之说者，谬也。我妻死，我不能为之不娶，琴瑟好合如故也，闺房宴笑如故也，而茫茫万劫，永无相见之期；悠悠廿年，并无入梦之夕。命绝缘尽则死，夭殇短折亦数之莫逃。佛氏谓人深于情者可结再生缘，亦妄也。人生事事可以身亲尝其境，独至死之一境，断不能亲尝而告人。见人死则幸我之尚生，而又惧我之必死。

《弢园尺牍》，卷9，第9—10页

他的酗酒、嫖妓及最终吸食鸦片成瘾，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这种个人心理重压所致。注但也是这种压力，使他在背离传统的路上走得最远，使他在一种新的人生模式的探索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有着建设性的后果。王韬个人的不幸与中国历史的不幸互相影响。对一个在传统社会中颇有成就的人来说，若像王韬那样做将丧失一切。但对王韬来说，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紧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

---

1. 参见《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迹考》《长毛状元王韬跋》

《关于王韬》等文。

2. 《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迹考》。

3. 《弢园尺牍》，卷6，第11—18页；《漫游随录》，第9813—9814页。

4. 赖廉士，《传记注释》，第1页。

5. 《弢园尺牍续钞》，卷5，第3页。

6.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4页；《漫游随录》，第9815页。

7. 《弢园尺牍》，卷1，第8页。

8.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4页。

9. 《中国经典》，卷3，前言，第8页。

10. 参见《中国经典》，卷4，第9、13、14、22、30、35等页；卷5，第10、97、134、302等页。

11. 王韬的《毛诗集释》《礼记集释》与《周易集释》的手稿现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

12. 《中国经典》，卷4，绪言，第176页；《弢园尺牍》，卷6，第15—17页。

13. 引自H. E. 理格，《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伦敦，1905年，第43页。

14. 《弢园尺牍》，卷10，第12—13页。

15. 《中国经典》，卷5，绪言第146页。

16. 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濬译，上海，1933年，第326—327页，第367页。

17. 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剑桥，1965年，第109—113页。

18. 《新教入华传教记》，第37—38页。

19. 同上，第190—191页。

20. 见该书纽约1964年第二版H. 李维的介绍。

21. 《中国经典》，卷5，第51页。

22. 有关黄胜，详见本书第九章。

23. 这部著作的名字是“火器略说”。

24. 《弢园尺牍》，卷7，第1—10页。

25. 《漫游随录》，第9816—9822页。

26. 同上，第9822页。

27. 同上，第9823—9830页。

28. 同上，第9838页。

29. 同上，第9831、9845页。

30. 同上，第9840页。

31. 同上，第9840—9844页。

32. 同上，第9846—9850页。

33. 《蘅华馆诗录》，卷4，第7—10页。

34. 《漫游随录》，第9850—9856页。

35. 《弢园尺牍》，卷8，第4页。

36. 《漫游随录》，第9825页；《弢园尺牍》，卷7，第18—21页；《法国志略》，卷7，第16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6—28页。

37. 《漫游随录》，第9841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8页。

38. 《遯窟谰言》，1875年出版；《淞隐漫录》，1887年出版；《淞滨琐话》，1887年出版。

39. 《弢园尺牍》，卷7，第18—21页；《法国志略》，序，第1、3页。

40. 陈振国，《长毛状元王韬》，载《逸经》，1937年，第33期，第42页。《王韬事迹考略》，载《上海研究资料》，第683页。《弢园文录外编》，卷9，第11页；卷11，第18—19页。

41. 罗斯韦尔·S. 布里顿，《中国报刊，1800—1912》，台北，1966年，第42页。

4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1955年，第74页。

43. 有关何启、容闳、伍廷芳等人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九章。

44. 《中国报学史》，第119页。

45. 《清季名人录》，卷2，第838页。

46. 《中国报刊，1800—1912》，第42—43页。《中国报学史》，第119页。

47. 《中国报学史》，第119页。

48. 《中国报学史》，第119页。

49. 有关胡礼垣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九章。

50. 《中国报刊，1800—1912》，第43页。《中国报学史》，第119—120页。

51.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27页。

52. 《中国报学史》，第104—105页。《弢园尺牍》，卷8，第11页；卷9，第15—16页；《弢园尺牍续钞》，卷4，第16—17页。

53.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21页；《法国志略》，卷21，第28—29页；《弢园尺牍》，卷9，第15—16页。

54. 《弢园尺牍》，卷9，第20—21页，卷l0，第5、6—7页。

55. 王韬的日本之行及与日本文人的关系将在第四章中详论。

56. 《中国报刊，1800—1912》，第63—70、81页。

57.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1875年改名为《万国公报》。

58. 《中国报刊，1800—1912》，第41、86页。林语堂，《中国出版与公众舆论史》，芝加哥，1936年，第79页。

59. 吕实强，《王韬评传》，载《书和人》，1967年，第61期，第480页。

60. “在华新教大会记录”，第264页。

61. 参见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芝加哥，1934年，第11—12页。

62.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0页；《蘅华馆诗录》，卷4，第14—15、16页。

63. 据王韬的日本友人冈千仞说，王韬在1884年之前就开始吸食鸦片。有关王韬的某些生活习性可见《弢园尺牍续钞》，卷6，第21页。

第二篇
新的世界图景

序曲

王韬代表了中国背景中的某种非常新颖的东西。他所面临的人生危机——考试落第、供养家庭的父亲突然去世、叛逆罪等等——在中国任何时代都会碰到。但他度过这些危机的特殊方法，却只有19世纪中叶以后才能采用。[注]同样，虽然任何时代都有中国人对朝政提出批评，但总体说来，这些批评的发泄渠道受到严格限制。而王韬却通过新的媒介——报纸来表达，并受到外国法律这种新制度的保护（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上海）。他的批评所受的唯一限制是他自己的文化成见。最后，他对西方和西方人的较深了解，尽管不能将他完全改变，却给了他一个新的图景，而对较早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尽管有着这些新特点，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种过去的浸润所带来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说："一种强固的既成认同能够容忍激烈的变化。"[注]

在王韬针对西方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写作中，充塞他头脑中的新图景与旧思维习惯之间那种脆弱、紧张的平衡状态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些作品范围很广（写于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给我们以重建王韬成熟期世界观的良机。但这样做将存在某种危险，因此最好先使之尽量明确。

首先，虽然王韬头脑敏捷开阔，但他并非一位成体系的思想家。由于要对当前世界形势或亚洲、欧洲的事物演化做详细解释，王韬经常信口发表己见。但如果有人试图以他的"世界秩序概念"或他的"历史理论"来限制他，他是否能轻松自如地做出反应，是大可怀疑的。所以，在考虑王韬的"世界观"时，尤应注意不要将其过于系统化，不要将其实本来就含糊不清乃至前后矛盾的东西硬性划一。

第二个危险——简直是危险综合征——则更为可怕，它与"传统"和"现代性"并由此及彼的转换有关。通常认为传统与现代性是定义明确的社会文化标志，有着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特质，而"转换"则被

视为联系二者的桥梁。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太僵化机械。它忽略了“转换”是人类历史从来就有的特点。它包含着一种把传统视为自我包容的有机体、具有同质性并多少是一种静止物的简单观点。而且，它排除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在现代化的侵蚀性压力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

C. E. 布莱克警告说，“传统”与“现代性”本质上是从组成现实的“变量的连续统一体”中抽象出来的，而“历史动态图式中的单一框架，是为研究目的而放大的”。[注]与所有历史概念一样，它们与人类经历的实际记录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很清楚，在它的简化过程中，借此解释之物也被曲解了。

这种困境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特点，而在用“传统”来研究中国的过去时，又有两个特别环境使之更为复杂。首先，在现代中国人中，“传统”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组概括。在瞬息万变的19—20世纪中国史中，它是一种引起极度感情冲动的对象，是某种为人信仰、辩护或者反对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中，毛泽东能将传统意识形态化为压迫者（封建贵族和地主统治阶级）和被压迫者（农民）之间的不断斗争，鲁迅能将其詈骂为每页都带“吃人”字句的虚伪记录，蒋介石将其神圣化为儒家对“德”的追求、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很明显，过去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为今天的目的和需要服务。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对传统的这些观点都是真实的过去的漫画化。

其次，这种漫画化（通常没有前面那样严重）来自西方人。他们作为一种浪漫的异国情调之诱人遗产的受惠者，极易把另一种文化与自己文化的不同方面抽出来，视之为“独特的”。对研究19世纪中西文化碰撞的学人来说，这种异国的催眠力又由历史现实而加强。因为不可否认，中国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确有鲜明的不同之处。由于这种情况，尤需做到的是，不要忽视中国历史中那些由于与西方文明类似而不被人注意或较难单独挑选出来的方面。在其他许多方面极不相同的文化之间的这些共同点，可能在两方面甚有意义。其一，我们可以从中对人类、对人性的内在困境的基本反应做一反思，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超文化的。其二，我们能毋庸置疑地设定，在中国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相重合的地方，近代中国人就不太需要抛弃早先的思维习惯，而应更多地强调连续或复兴。

在被戏剧化为“中国传统”之前，真正的中国过去是流动不羁的，富

于多样性，充满未解决的矛盾张力。与这种在某一特定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具有的设定和观念并行的是，还有一些设定和观念仅为某些阶级或个人所具有。然而，尽管是在单个个人的头脑中，亦常有彼此抵牾之处，当细细检查之时，就会发现许多观念和态度在逻辑上（虽然并不必然是心理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中国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西方的入侵和连续不断的生存威胁而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它的另一些方面则由于它们并非仅是“中国的”或无法归之于“传统的”，在西方的撞击中就较少为人注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去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东西却置身于“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这种规范描述的冲突之外，为19世纪中国的精神转变过程注入了一种新的复杂因素。在后面对王韬成熟期世界观进行考察时，我将特别着力使这一额外因素引起注意。

---

1. 这种人生模式在晚清愈益普遍，详见本书第九章。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剑桥，1964年，第25—26页，第32页。

2. 《洞见与责任》，纽约，1964年，第96页。

3. 《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纽约，1966年，第54页。

第四章 当代世界中的德与力

王韬世界观中的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是同时进入他的头脑中的。事实上，王韬的历史成果的主要部分，通常应被归类于当代史。然而，与这两方面有关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我将分别处理。第五章将集中于王韬对历史因果变化的理解，而本章则集中于他对当代世界或国家的看法。

国家间关系中的强权与正义

对儒学思想家来说，道德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孟子对两种权力做了区别：（1）王道；（2）霸道。二者虽都可存在，但孟子认为后者必然招致自我毁灭；只有前者才能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基础。

孟子的观点给中国人对权力的态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儒家君主口中虽称赞德治理想，却完全清楚强力的价值。孟子之理想主义和对实际政治现实的冷静估计互相掺和的结果，不仅在国内范围中表现出来，而且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表现出来。[注]宗藩制度便反映出孟子的观点：若天子显德，四方小国便会自动前来臣服于中国。但实际的强力在这一制度的运作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这种宗藩关系在19世纪开始解体。在中国历史中，从前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但现在，中国首次遇到了处理宗藩关系的完全不同的模式，在某些方面，例如在西方的有关民族国家法律平等的世界观念方面，中国人要适调新的秩序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但在其他方面，这种适调却比较容易，因为西方和中国的观念起初并无很大不同。比如，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了赤裸裸的强力在世界事务的实际秩序中的作用（当然是在一种相对意义上理解“世界”一词），尽管他们对应当以何为基础来安排世界这一点上大相径庭。因而，当国际法与其利益一致时，现代西方国家就信守国际法，但一旦与国家目的冲突就将之抛在一边去了。同样，当宗藩制度有效时中国人便利用这种制度，但如果他们在这种制度之外（如战争）能更好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照样诉诸其他手段。

这样，在王韬对国际形势的不断分析中，中国权力观念潜在的紧张性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王韬权力观的基本框架，是以孟子传统为基础的。而与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相抗衡的，则是对“实际权力因素”在世界事务之形成中所起作用的高度敏感。他总是把欧洲政治形势与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时代进行精心对比，正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论证法俄联盟攻德不可取时，王韬写道（约写于1873—1874年）：

> 总之，今日欧洲之大局亦无异于昔日之春秋战国。俄则秦也，法则齐也，英则楚也，而普奥犹韩魏也。普奥强则俄不能出西欧一步，犹之韩魏强则秦只闭关以自大耳……故六国之失计在不能强韩魏以制秦。而欧洲之相安者，昔则在英法助土以攻俄，今则在普奥相合以御俄。法如合俄伐普，何殊自撤其藩篱，其为非策也，亦明矣。[注]

王韬对国外事务的分析是否明智并非我所主要关切的。我更感兴趣的是，王韬在中国历史中偏偏把东周末而不是其他时期挑出来做类比。虽然我们习惯于把中国视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和一个民族，但中国从春秋直到秦统一六国，在中华文明领域中，并没有具有共同国界的、可确当称之为中国的国家，而只有分裂成许多彼此独立的政治单元，与现代欧洲文化领域的情况十分相像。[注]当然，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在这些世纪中仍然存在，但实际却是许多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相互争战，而彼此关系也是通过缔约、结盟、遣使及战争表现出来的。[注]所以，当王韬观察现代欧洲局势时想起这一较早的历史时期，就不足为怪了。[注]

之所以油然做此比较，并非仅仅由于东周末诸主权国或半主权国的存在，还因为在这一阶段必然缺乏一个超国家体系来有效地限制各主权单位的行为。正如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所说：“以前周代封建制的道德信条，其意义仅在于它能增强那些宣称忠实于它的那些国家的权力与威望。封建传统的礼仪框架有时也作为各国的指导信条，但也只有从权力考虑而赞成这种忠诚时，这种信条才稍有分量。”[注]简言之，是强权而非正义，才是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最终裁决者。

我们先记住这种情况，再来检查王韬对其所处时代的国际法和条约的作用的态度。有时，王韬似乎认为，作为一种使某类行为合法化而禁

止另一类行为的手段，国际法不无用处。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琉球群岛争端时期，他催促总理衙门用国际法向日本施加压力。但种种事实又表明，王韬在思想深处对国际法极不信任。所以，王韬在一篇批评西方列强在琉球问题上不为公理说话的文章中写道："呜呼！海外万国，星罗棋布，各谋其私，大制小，强凌弱，夺人之国，戕人之君，无处无之，虽有公法，徒为具文。"

王韬对国际法在欧洲诸国家间关系中的评论，也表现出同样的不信任："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呜呼：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

王韬对缔结条约的评价，也证明了同样的思想模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缔约或许有效，但就实质而言，是不可靠的。因为"故夫立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王韬以俄国1870年10月单方面废除《巴黎条约》黑海条款（1856）一事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证据。这些条款禁止俄国在黑海保持舰队或修筑军事基地，系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被强加于它的。王韬观察说，现在俄国已经羽毛丰满，能够如此行动而不受惩罚。

"道德信条"或"礼仪框架"在充满主权国家权力饥渴的世界中究竟能否起到抑制力量的作用，王韬深表怀疑。这至少是他透过东周末来看他当时国家间关系的原因之一。但我以为还有另一层原因，我们必须谨慎地不要光把王韬当作"超然"的外交分析家，而忽略了他是活生生的人。可以断言，对王韬来说，拿东周末做对比，并不仅仅是对看起来类似的两种史实的冷冰冰的感知；最起码，这里暗含着为近代中国所受之不公正待遇而激怒的一位中国人反西方的道德判断。

可以回想一下，儒家历史学家（其实就是孔子、孟子本人）都曾把东周末谴责为一个堕落和缺乏政治道德的时代，一个大"道"不行的时代。当时，由于统治者的近视和卑劣，孔孟及其代表的一切均遭拒斥。这是一个崇拜赤裸裸强权而嘲笑道德的时代，君主们通过穷兵黩武而非施仁政来扩大疆土。地处边沿的秦国的崛起，最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时代的普遍特征。秦国由于其反对儒学的黩武主义和鼓吹战争，而逐渐被

后世的儒家认为几乎是道德上的怪物。

由于王韬把这种东周末政治生活的极端反面形象展现出来，并暗示它与当代欧洲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可以很公正地说，王韬实际上是对后者所作的一种判断。如果在王韬的对比中包含着把19世纪的中国与欧洲诸国并列的观念，这一推论便不太可能成立。但实际并非如此。王韬首先关心的是世界各国政策和行为对中国的影响。而这些国家仍在另一个宇宙中，服从另一种规律。与东周末相类似，这个世界使按照儒学政治行为信条实践的机会大大减少，而且讳疾忌医。

各国图像

王韬著作中暗含的对非中国世界的总体谴责，并未妨碍他在各国中做有意义的区分。相反，王韬的世界各国图像恰如这些国家本身一样纷繁多样，而不像更早一代中国人，总是从单一的观点来看待所有“非中国”特点。检查一下王韬对俄国、美国，特别是对日本的认识，便可看到这种看法上的新变化。

俄国

虽然甲午战争之后俄国对中国来说有多种意义，但在战前的几十年中，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倾向于用极其负面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北方邻居。[注]王韬也不例外。他把俄国描述为一个尽管领土辽阔却远较英国贫困的国家。在偶尔谈到俄国国内的情况时，他挑选的主题也是诸如保留农奴制（尽管农奴制已废除却仍是“一种非常坏的制度”）的某些特点、皇族内部的不和、沙皇的严厉统治、异教团体的暴动活动等等，反正绝无好话。[注]他更常说的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动机，焦点集中于沙皇的领土野心。[注]他一再将俄国称之为“无道之虎狼秦”，而当他把东周末和当代欧洲的国家间关系做一比较时，“秦”的恶名总是留给俄国。[注]

何来一幅如此暗淡的图画？王韬对俄国的负面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中国人长期视俄国人为半野蛮的“食人魔”[注]的传统。但从总体来说，王韬并不是一位喜从民间传说中得到启发的人。更可信的观点是，王韬及19世纪末改革者的反俄倾向是英美反俄情绪的直接反映。正如王

树槐所提出的，用中文写时论文章的西方人绝大多数为英美人，而此时的英美舆论有强烈的反俄倾向。而就王韬的情况来说，这种影响更为强烈，因为他与英国传教士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

当然，在另一方面，如果论证说英美舆论只是增强了王韬独自得出的看法，也不无道理，毕竟王韬观察分析国际形势已非新手。如果他把俄国与秦国联系起来的做法偶显牵强的话，那么这种类比却并非毫无背景：俄国与秦一样位于中国北部边境，而且在19世纪70—80年代，无数方面都显示出其对亚洲越来越大的侵略胃口。

美国

虽然王韬说准备写一部共有八章的俄国史手稿，但他的俄国史知识仍很肤浅。他从未去过俄国，好像也不认识任何一位俄国人。20世纪以前，很少有出版物（报纸除外）能使好奇的中国人得到进一步的启蒙。有关美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王韬说他也写了一部美国简史。但他并未写成。除了林乐知外，他一生从未与其他美国人有过密切的关系。

但与俄国相反，王韬对美国的印象却很好。他不是为被剥削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辩护，却对英国人在印第安人中的“文明”使命有深刻印象，并对美国南部的经济生产力表示惊叹，把此地区描述为没有悲惨的乐土（他忽略了黑人的情况）。

王韬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是其他诸国无法相比的，他充满赞同地强调政府的支出较低（表明管理的廉洁仁慈）；地方纠纷往往被村镇中的长者迅速解决（他们不要报酬）；为照顾寡妇、孤儿、残疾人和病人而制订的规定；常备军人数的规模极小，等等。他还称赞华盛顿建立的“揖让制”，并不可避免地把华盛顿的毫无个人政治野心和中国上古时代的圣贤尧舜相比：“华盛顿敝屣百乘，公天下而无私俾……远追唐虞揖让之风……”

虽然王韬从未解释过他为何对美国如此厚爱，但原因却不难猜测。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地—居民比率较为理想、政府开支较低并且干涉不多，故美国的“杰斐逊式”特点构成了每个儒者之治世图景中的一部分。加之，美国在中国人头脑中与王韬十分崇拜的英国（下面几章将细论此点）关系密切。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美国与俄国不同，并未对中华帝国构成直接威胁。

日本

语言学家们说，外语中最难掌握的是那些与母语中发音十分相像，却又不是完全一样的发音。对19世纪无数的中国人来说，日本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就文化、文字、人种和地理来说，日本比所有其他大国都距中国更近。而且日本也是被迫与西方列强缔约的，与中国一样有一种历史屈辱感。这些因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联在一起，但其他因素又把他们分开。日本对西方事物的狂热和干脆有力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的旁观者产生了一种赞赏、妒忌和鄙视等混在一起的复杂感情。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日本加紧了在中国周边的活动，又激起了一种愤怒与羞耻交织的感情。中国人对他们这个岛国邻居有一种以父辈自居的态度，因此对日本的蚕食更觉痛苦，但正因此，又未能使全体中国人都拒斥日本。结果，便产生一种既爱又恨的深刻矛盾感，即使在20世纪，许多中国人都感到这种矛盾感难以克服。

这种矛盾——说它是一种多价体（polyvalence）可能更确切——在王韬笔下有关日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形象中得到了生动反映。这种形象之一是把日本描述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把日本人描绘成共享中华秩序的参与伙伴。这种形象有一定的实际基础，但也是中国的自我中心论和日本的近华论所致。就这一形象的实际基础而言，在王韬所处的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然读写中国文言文，这给了他们一个直接进入整个中文著作库的入口，而这也给了中国人（至少是其中较具冒险精神者）一个进入日本精神世界的入口。所以，王韬的书在日本读者甚众，其中一些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甚至有日文版，而王韬在自己的著述里也常用日本著作中的文献或资料。[注]

“文化近亲”形象的另一现实因素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起码是两国文人——的友好和社交模式非常相像，尤其对具有王韬这种生活习性的人更是如此。在王韬1879年春夏访问日本的4个月中，充满了不停的宴请与回请、拜访和回拜、艺妓、诗酒、旅游观光以及被有礼貌地要求阅读朋友的手稿并为之写序跋等等活动，这好像是在更铺张的规模上重温王韬50年代在上海的社会生活。[注]

王韬受到的款待和旅途中结下的友谊，给他的日本形象增添了温暖的个人色彩。被同胞所弃而又一直渴望成名的王韬，终于在日本作为大名鼎鼎的中国文人而受到欢迎，使他得到了极大的自我满足。王韬在日本的名声部分是由从香港返国的日本人的报道所致，但主要还是由他的

《普法战纪》一书所带来的。日本一家主要报纸《报知新闻》的编辑栗本锄云若干年前曾在上海得到一册《普法战纪》，书中对战争过程的真实描述和作者充满新意的评论，使他印象至深，竟认为这是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后一部罕见的杰作，并促使日本军部在1878年重印此书。[注]

当王韬因患结核病需要休养并表示希望一睹日本风光和美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一些日本文人便利用这一机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正式邀请王韬访日。[注]这些人除栗本锄云外还有：佐田白茅（1832—1907），其人性情暴烈，是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征韩论的主要鼓吹者[注]；重野安绎（1827—1910），有影响的考证学派历史学家，其人治学严谨，对日本历史的许多“事实”都表示怀疑，遂获“抹杀博士”的绰号[注]；冈千仞（1833—1914），浪漫的倾心中国的学者，而又对当代事务饶有兴趣，80年代曾任东京一家私人学院的负责人，讲授儒学经典[注]；中村敬宇（1832—1891），明治初期的一位多产作家和教育家，他译的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1870）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等书为所有日本学生熟知。[注]

如果说王韬对在日本所受的盛情款待十分满意，那么接待他的日本人对他的访问也同样满意。原因之一是他的举止与许多中国人不同。王韬在国外时决不使自己囿于华人圈内，当然，有时他有华人陪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清政府在国内仍不欢迎他，但他却受到北京在日本新建的外交使团首脑何如璋公使的热情招待；他并且立即与何的部属黄遵宪结为好友，黄后来以改革活动和对日本史的开拓性研究而闻名。）[注]但大体说来，王韬的活动由他的日本新朋友任意安排。旅行开始时，作为一个好奇的游客，他首先注意到的当然是日本表面上的异国情调：奇异的服装、矮树等等。但到达东京后，他立即习惯下来，仿佛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与典型的中国旅行者相反，他吃日本饭菜（尽管可能是出于礼貌而非喜好），并住在一个日本人家中（他的朋友重野安绎）。[注]

首先，王韬的“入乡随俗”并内在地体验日本生活，是使他的日本主人非常高兴的原因之一。其次，而且可能是更根本的原因是，直到1879年，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学者仍不多。因此，在欢迎王韬的宴会上，中村敬宇说王韬是百年来访问日本的最杰出的中国人，冈千仞借回顾唐代来

文饰祝词，等等[注]，并不是在说客套话。除了少数明末遗民在满族征服时流亡日本外，丰臣秀吉时代并不以招待外人来访著称。在随后的明治时代，虽然中国人受到欢迎，但起初没有几人有王韬的冒险精神——直到19世纪末诸种新因素凑到一起使日本突然得到中国人的刮目相看时，才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到日本求学或避难。

在中村酒楼举行的有60余位日本朋友和熟人参加的盛大宴会，是王韬旅日的高潮。[注]返回中国后，王韬对他的日本朋友仍有影响。他与他们经常书信往返，为他们的著作撰写序跋。王韬重返上海以后，当这些人有机会访华时，他总是尽地主之谊。[注]

王韬的日本朋友中（有些是他80年代居住上海时结识的），有几个积极参加大亚细亚事业的活动。虽然19世纪最后几十年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对不少人有着多重意义，但大多数大亚细亚主义者却都具有某些较广的感情基础。其中主要有：（1）意识到中日间特殊的历史联系；（2）强烈同情中国的改革事业；（3）强烈反对西方统治亚洲。只要这种情感并不招致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王韬就由衷地赞同。所以当大亚细亚主义的势力开始有组织地表现出来时，王韬自然对其感兴趣。因此，在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兴亚会于东京成立后不久，王韬便给冈千仞写信，认为成立这种组织确有必要，并对创立者的观点评论了一番。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大约同时写给一位中国朋友（郑藻如）的另一封信中，王韬却注意到，虽然该组织表面上的目的是增进中日友好关系，但其真实目的却仍是个谜。[注]

当然，大亚细亚主义确实成问题。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它到底是像它自称的那样要把亚洲国家从帝国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呢，还是仅仅由日本取代西方统治的幌子？许多日本大亚细亚论者盲目相信他们的正义性，对他们来说这种分辨可能令其反感：由日本统治就是解放。当然，也有像曾根俊虎（1847—1910）这样的对中国情感深挚的人。他是海军军官，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中日革命事业方面的活动家，曾于1873年首次访问中国。在远征台湾（1874）之后，他仍在上海任官职若干年；他对中国事务如此精通，所以回到日本后，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见。作为兴亚会的发起者之一，他的亲华态度非常有名。据说他经常阅读《论语》，自称祖先来自孔子的家乡山东。[注]

王韬大约是在日本之行前后于上海首次与曾根俊虎相会的。王韬非

常喜欢曾根的浪漫气质和忠诚为人。[注]二人之间很快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王韬的其他许多日本朋友不同，此人有强烈的政治倾向。1883年初，曾根俊虎草拟了一份加强中日关系的计划，并转给他的这位中国朋友，要他与李鸿章的幕僚联系，以便引起李鸿章的注意。王韬起初不甚情愿，大约是害怕卷入任何有害于他长久居留上海的政治活动，但在这年夏天他还是将曾根的计划交给了李鸿章的主要幕僚盛宣怀。王韬告诉盛宣怀，如果李鸿章赞同这一计划并愿负全责，他本人会亲去东京说服日本当局。[注]

虽然曾根和王韬的努力毫无成果，但曾根对中国的同情却在越南的中法战争中得到证实。在这场冲突中，他是为日军工作的官方观察员。在王韬的催促下（据王韬称），他就此问题写了一本强烈反对法国的书，并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前藩属国的命运漠不关心。[注]

虽然曾根俊虎、冈千仞、王韬及其他这类人物都把中国和日本视为天然盟友，要求两国形成更加密切的联盟共御外侮，并努力使亚洲其他国家强大，[注]但从1870年后，中日两国关系基本上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因琉球群岛的地位引起冲突，随后是因朝鲜，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到1894年，两国终于爆发战争。

王韬尽管与许多日本人保持私人友谊，但对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却深恶痛绝。他在19世纪70年代琉球群岛危机时所写的一些社论，颇能说明此点。与他的其他许多同胞不同，王韬准备接受日本的说法，即日本在清初遣使中国仅是为了“聘问往来”，而不是来归附。[注]他还承认，琉球群岛过去曾向日本朝贡。但他以诸如《大日本史》这类的日文著作为依据，坚持认为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更为久远，所以不管怎样，琉球从未实际上归属于日本。[注]

王韬对西方在琉球争端中偏袒日本感到震怒。他遗憾地说到：自日本采取全面效仿西方的政策以来，西方的反应便是抬高日本而贬抑中国，而现在，无论中日关系出现什么困难，西方人总是自然地接受日本的观点。王韬还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支持日本的一个更直接的自私动机：如果日本吞并琉球成功，将为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侵占更多的殖民地提供一个明确的先例。[注]

王韬在琉球事件中对日本和西方的厉声痛斥是以其是非判断为基础

的。但王韬绝不是一位远离实际世界的人。当他从道义的崇高境界落下时，他的这种极端反应便大打折扣了。有几点王韬看得非常清楚：第一，不值得为琉球而打仗；第二，若真要开战也应待中国强大到足以冒此风险时再说；第三，虽然日本不可信，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也不可能消失，但却不能与俄国的威胁相比；第四，由于俄国还威胁到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所以中国可与它们组成三国反俄同盟。注

王韬心中的日本形象不但反映出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且反映了日本国内成就。如果在写作时他的主要情绪是对中国的一事无成感到沮丧，他就对日本进行赞扬。例如，给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日本不可思议地阻抑西方的入侵：

> 今者泰西通商之局亦大启乎东瀛，传教之士，盛行于国中。然西人卒不敢挟制凌侮之者何哉？以一切西法无不讲求，虽未能夺其所恃，亦已效其所长，而其尤善者，则在能自为之也。
>
>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7页

王韬钦佩地叙述了日本紧跟时代的“进步”，学习西方的热情，对实际事务的注重以及如何避免了中国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注他经常指出日本在现代化这一领域或那一领域的成功。在一些著述中，他表示甚盼中国能紧追日本步伐，把改革方案作为当务之急。注

但其他时候，王韬则以最严厉的词句谴责日本。而当他尖锐批评日本的侵略性外交政策，激烈谴责西方偏袒日本牺牲中国时，当他——至少曾一度——告诫要警惕日本式的缺乏创造性和过分依赖“西法”时，王韬退回到自我欣赏、作茧自缚的儒学道德论世界中，责备日本的“西化”大厦实则建筑在流沙之上。下面一段怒骂很容易从倭仁注之流的笔下找到：

> 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钜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取之于民间，前时不过什二，今则几至于敲膏吸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
> ……夫以刚道治天下者必折，以柔道治天下者必久。彼轻改祖

宗之宪章，斫削天地之菁华，苦生民以媚远人，竭脂膏以奉外物，其外庞然，而其内嚣然，正所谓疾在膏肓而犹不知自治也。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0—11页

一目了然：由于王韬经常对日本人太过愤怒和困惑，以致在评判他们时不能前后一致。如果把刚才所引社论的理由当作抵制中国改革的保守论据，一定会使他激怒。一切取决于背景与情绪。王韬有时嘲笑日本努力西化的肤浅，而别的时候，他又称赞日本对西方的深刻理解。[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时他盛赞日本已独立掌握了西方的技术，但有时正是同一个王韬，又嘲笑日本过分依赖西方技术人员和顾问。[注]

而且另一方面，王韬对儒学政治训诫的亦步亦趋，又使他极大地误解了日本的形势。王韬一次又一次重复用“外强中槁”这一陈腐论调来概括日本的情况。[注]他看到了伴随日本现代化而来的某些紧张，而这似乎又由他的一些心怀不满的前武士朋友的牢骚给予证实。但是王韬极度夸大这种紧张，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则大谬不然。他设想，如果日本的国内问题与国外困境交相作用，整个大厦即将坍塌。[注]在这种情况下，王韬的儒学逻辑使他看不到日本的民族主义作为统一力量的巨大潜能。

于是，王韬尽管熟知日本，却仍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对甲午战争的后果感到震惊，这就不难理解了。就个人而言，王韬肯定会认为日本的胜利验证了自己改革中国的毕生努力，因而略感安慰。但另一方面，就民族而言，王韬与别人一样对中国败给一个亚洲小国感到奇耻大辱，并希望因此会唤醒中国，使其至少知道改弦更张的必要。悲剧中有机会，灾难中有希望的种子。王韬认定中国是亚洲领袖国家的信念并未改变；他认为中日友好是亚洲和平先决条件的信念也未改变。于是，他借谴责日本采取违背自己最佳利益的愚蠢行动来警告说，日本迟早要为自己的掠夺政策而后悔。由此，他得到了一种自我满足。[注]

从王韬对当代国家间关系的理解和他对各国的认知中，我们可得到一幅正义几乎毫无用处而赤裸裸的强力却备受重视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王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非简单化又非前后一致。他明确相信，在可以看到的未来，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以西方的规则来向西方挑战。它应试图通过像国际法这样并无把握的权宜之计来阻止中国在欧洲与日本的掌握中进一步恶化。它应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外交

使团和领事馆[注]，并在理性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提高自己在这一充满憎恨的世界中的地位。但王韬深知，这一切最多只能起到延缓时间的作用。而中国唯一明智的方针，是最终变得像西方一样富强。[注]

为说明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不妨重提一下王韬对在加利福尼亚、秘鲁和古巴（这些地方有许多贫穷的中国人居住）开设领事馆的讨论。王韬告诫说，无论这一计划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益处，但并不会使众多海外华人的处境稍有改善。将此与西方在华的地位相比，有两方面的不利：第一，居住在西方的华人之社会地位要比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低得多；第二，在华的西方领事最终能以武力满足他们的要求。王韬总结道："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注]

但对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最终并不能满足于仅仅取得富强。中国如何才能与西方有别？与此相关的是孟子逻辑的两重性。根据这一逻辑，西方因以武力扩张而不讲道德。但在一个对中国君主之德的反应显然极其冷漠的世界中，这一逻辑有一个恼人的推论：中国君主也应当不讲道德。如果除去与太平天国的一段暧昧关系外，就我所知，王韬从未公开赞同过这一推论。但是，他对朝廷和官僚机构的经常批评，他对中国政府政策和实践必须进行较为彻底变革的持久宣传，事实上就是这种推论。在此我们可得到关于中国如何才能最终区别于西方这一问题的启示。一个彻底更新的中国将与西方一样强大。但中国仍将是道德的，而西方则不是。这种结合将使中国在开始以西方的方法对西方做出回应，但最终将迫使西方以中国的方法对中国做出回应。

---

1. 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外交关系》，剑桥，1968年，第34—62页。

2. 《普法战纪》，卷19，第15—16页，卷17，第28页，卷20，第36页；《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6、24、26、27—29页，卷5，第13页，卷8，第27—28页；《弢园尺牍》，卷11，第11页；《弢园尺牍续钞》，卷4，第15页。

3. 《欧洲条约地图》，E. 里兹里特编，伦敦，1875—1891年出版，卷1，第318页。

4. 见理查德·L. 沃克，《中国古代多政权体系》，海登，1953年。

5. 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把此时与东周类比。

6. 《中国古代多政权体系》，第99页。

7. 《弢园尺牍》，卷9，第12页；《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6—7页；《普法战纪》，卷5，第1页。

8. 《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1页。

9. 同上，卷2，第3、5页。

10. 同上，卷5，第7—9页。

11. 唐·普赖斯，《中国知识分子的俄国形象，1896—1911》，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

12. 《弢园尺牍》，卷12，第1—2、26—27页；《瓮牖余谈》，卷4，第9页。

13. 《弢园尺牍》，卷12，第1—2、26—27页；《弢园尺牍续钞》，卷4，第15页；《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27—28页。

14. 《普法战纪》，卷19，第15—16页；《弢园尺牍》，卷11，第11页，卷12，第2、18页；《弢园尺牍续钞》，卷1，第15页；《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6、24、27—29页，卷8，第27—28页。

15. T. A. 夏：《天堂恶魔：中国人的俄国观》，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第349号，第27—37页，1963年9月出版。

16.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1965年，第140页。

17.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9—11页。

18. 同上，卷11，第21页。

19. 《瓮牖余谈》，卷4，第2—3、7页。

20. 同上，卷4，第3页；卷5，第6页。

21. 王韬，《哥伦布传赞》，载《万国公报》，1892年7月。

22. 日本军部1878年出版了王韬的《普法战纪》，并于1887年再版。

23. 见本书第一章。王韬的日本之行详见王韬所著《扶桑游记》。

24. 增田涉，《论王韬》，载《人文研究》，卷14，第7期，第91—92页，1963年8月出版。

25. 实藤惠秀，《王韬的访日与日本文人》，载《近代日支文化论》，东京，1941年，第61—63页。

26. 同上，第62、67、68、70、72、92—93页。

27. 《重野安绎与近代史学传统》，载《中日历史学家》，W. G. 比斯利、E. G. 普利布兰克编，伦敦，1961年，第264—287页。

28. 冈千仞以号鹿门闻名。

29. 《王韬的访日与日本文人》，第63、80、85—86页。

30. 《王韬的访日与日本文人》，第67—68、70、74页；《弢园文录外编》，卷9，第5—7页；《弢园尺牍》，卷12，第11—12、18—19页。

31. 《王韬的访日与日本文人》，第64—65页。

32. 同上，第86页。

33. 王韬访日期间还结识一些朋友，如藤田茂吉（1852—1892），福泽谕吉的学生；星野恒（1839—1917），史学家；岩谷一六（1834—1905），明治时代书法家；小牧昌业（1843—1922），日本的中国古典学者领袖人物之一；三岛中洲（1831—1919），另一位中国古典学者领袖人物及教师；鹫津毅堂（1825—1882），学者。

34. 《弢园尺牍续钞》，卷6，第7页；《弢园文录外编》，卷9，第9—11、12—15页，卷10，第5—7页，卷11，第2—5、15—16页。

35. 《弢园尺牍》，卷12，第12—13、21—22页。

36.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京，1933年，卷3，第316—317页。

37. 《法国志略》，卷14，第14—15页。

38. 《弢园尺牍续钞》，卷2，第11—12、14—15页。

39.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5页。

40. 《弢园尺牍》，卷12，第12—13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11页。

41.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22—23页。

42. 同上，卷5，第23—25、25—3l页，卷6，第1—3、3—5页。

43. 同上，卷6，第3—5页，卷5，第9—11页。

44. 《弢园尺牍》，卷11，第7—9、15—17页，卷12，第12—13、21—22、26—27页；《弢园尺牍续钞》，卷1，第4—5、6—7、16、22—23页。

45. 《甕牖余谈》，卷2，第4—6页，卷4，第3—4页。

46.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0页。

47. 倭仁（1804—1871），强硬的保守主义者，顽固地反对任何对西学的引进。

48.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7页；《弢园尺牍》，卷11，第10—11页；《弢园尺牍续钞》，卷1，第21页。

49. 《弢园尺牍》，卷11，第10—11页。

50.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0页，卷10，第7—8页；《弢园尺牍续钞》，卷1，第4—5、6、8、21页，卷2，第8页。

51.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8页；《弢园尺牍》，卷11，第10—11页；《弢园尺牍续钞》，卷1，第4—5页，卷2，第8页。

52. 《万国公报》，1896年6月号，第5—7页。

53.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3页，卷2，第13—14、21—25、25—26、26—29页，卷3，第1—2页。

54. 王韬1870年后的著述多关注富强问题，本书将在第七、八两章中详述此点。

55.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25页。

第五章 历史创造中的天与人

在王韬对历史的前瞻中，他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以支持他的那个观点——未来世界将由中国塑造。这种前瞻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19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新形势。但它同样是旧有态度的产物。

历史的类型与动力

中国人对待历史的传统态度充满了问题。儒家学者倾向于用循环论的观点看待历史，这在受季节变化支配的农业社会中大概是很自然的。盛衰理论深嵌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之中，并包容人类的一切。根据这种观点，变化并不存在于生成之中，而是在“周而复始的大道运行”之中。而进步观念则是陌生的，文明社会的主要目的只是阻止衰退。[注]

阻止衰退的观念，提供了在儒家历史学家中颇为流行的第二种变化观念。这便是历史从古代乌托邦时代不断衰退的观念。从逻辑上看，循环论与退化论可被视为互相矛盾的。因为前者除了从相对意义以外，否认“向上”与“向下”运动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意味着一种不断的、不重复的“向下”的变化。但确实又有使这两种观点不过分对立的途径。例如，儒家历史学家有可能不把世界看作是不断退化的，而只是在遥远的古代经受过最初的堕落。[注]不过，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重视这种学术上的细微区别，虽然他们的观点具有潜在的矛盾，却仍能坦然地生活。

中国传统态度自相矛盾的另一问题，是历史变化如何发生。在孔孟模式中，许多人都同意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661—721）的观点。刘认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要塑造者，“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注]对采纳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善行必有善报，而恶行必有恶果。人们对事件的影响力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异。所以，社会统治者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有德之君将以榜样的教化和由其仁慈之心所产生的开明政策的力量，成功地带来社会的和谐繁荣。但如果君位由无道者占据，则会带来冲突与混乱。[注]

在此，我们再次发现一种潜在的自相矛盾。如果历史像大多数中国人的宇宙观所预设的那样，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宇宙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宇宙过程又由一种固定的、决定论的模式操纵，那就几乎没有给人类影响历史变化进程留下什么余地了。这种观点在西方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同样引人注目。然而在此不遑详论此种两难困境。与前面一样，我的主要目的只是说明，绝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存在，或者（假设他们意识到了），又能在心理上接受这两种观点，有时认为人在历史因果链中起主要作用，有时又把几乎一切都归之于命运或天。

类似的紧张与压力在王韬对历史的感知中也很严重。但是，尽管我们对此一目了然，却并不说明王韬本人也感受到了这些。一个人从理智上观察历史的方法（他对历史的理解），和他想要推动历史的方法，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如果对前者的关切占先，那么自相矛盾便会产生紧张，但如果后者为主，则没有理由认为，对于过去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观念，就不会被游刃有余地服务于一个高度一致的未来图式。

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的阵痛之中。与他的许多同代人不同，王韬对这种危机有敏锐的感受。而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对于王韬，至关重要的是，要能够设想到这样一个时机：此种危机可以被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克服。面对这种超越的目的，他抓住每一根能使其对未来感到安慰的稻草，因此时而倾向这一方面，时而又倾向那一方面，这不足为奇。

王韬的历史著述

虽然通常不把王韬视为历史学家，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历史著述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王韬的史学是新与旧的奇怪混合。他所遵从的文辞规则和组织安排形式本质上仍是中国自司马迁时代以来一直遵从的规则和形式。但王韬所选的主题，却别开新境。他的特点是侧重于现实，因而将对汉、唐历史的重新研究让给了那些比他更为谨小慎微的人。在一个被西方挑战所支配的时代，他的主题是西方。

未出版的著述

虽然他的某些历史著述未曾出版，但我们仍可借此看到他这方面著述的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王韬声称已写了关于美国和俄国的简史，每部8章（大约写于19世纪70年代）。这些可能已被包括在一部更宏大的著作《四溟补乘》之中，王韬显然想使该书成为魏源《海国图志》的现代版。他希望这本书在清代的标准史籍中，能成为有关外国部分的基本参考书，并最终达120章之多。王韬在为1889年发表的有关其著述的提要说明称，“是书搜罗宏备，详于近而略于远，于近今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史更革诸大端，无不一一备载；凡有关于中外交涉者，尤再三致意焉。”[注]在这部提要中，王韬简要谈到了另两部未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点。第一部是《西古史》，共4章，集中于犹太古代土地，并旁及疆域变化、不同时期的发展，及学识和艺术的演进。第二部是《西事凡》，也分4章，把他在其有关西方国家的正式历史书中未收入的遗闻逸事汇集在一起。王韬以这样一通发现结束了他对《西事凡》的讨论：“余尝谓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注]

《普法战纪》

在这部著作中，王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以西方报道这次战争的报纸为基础，在精通英语的中国同事（主要是张宗良）协助下进行写作，并于1873年将该书出版。该书最初为14章，后扩展为20章。这是一本使王韬成为外国事务专家的成名作。19世纪后几十年，该书在中国和日本不断再版，深得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梁启超及其他许多不太知名的同代人的赞赏。[注]

正如《普法战纪》的一篇前言中所说，该书代表了中国理解西方的一个新起点。此类书的最佳作品，如魏源和徐继畬的著作，谈论范围都极为宽泛，属于普通读物。[注]而王韬的这本书却是第一部完备地细察欧洲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专著。值得注意的是，王韬明确写到，无论是福是祸，随着最近事态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将无可避免地缠在一起，所以欧洲形势的重大变化自然将影响中国。[注]

以此前提为基础，王韬在《普法战纪》中就无须再提中国了。重要的是提供有关欧洲的信息，因它已进入世界（中国）历史潮流之中，所以可被视为于己有益的研究题目。结果，我们今天读来，不可否认它在某些方面像“业余水平的大杂烩”[注]。但若就它所表明的目的而言，却

极为成功。尽管有些选择不当和组织混乱，但它确实提供了大量有关法国和德国的历史与民族风俗（包括《马赛曲》的翻译），欧洲政治制度及其日常运作，军事技术和战略（如普军广泛运用地图、被包围的巴黎人用带相机的气球从空中进行侦察、电报与铁路的军事价值等），欧洲的外交活动及战况本身等信息。

若仅止这些，《普法战纪》只会引起短暂的兴趣。但王韬更进一步，尤其是在他的两篇前言（二者落款均为1871年8月）中，把普法战争放在更广阔的历史图式的框架中加以考察。这幅图式在形式上仍是一种明确的循环论。这场战争被看作国家无止境的盛衰起伏的另一篇章。[注]普鲁士从极端弱小的情况下一跃而强，使法国从往昔的强盛直线下落。但这也不可能是事物的最终结局：“善觇国运者毋以胜为吉，毋以败为凶。盛即衰之始，弱即强之渐。”[注]简言之，法国将再次强盛，而普鲁士将再次衰败。

他实际上把政治领域的循环变化与自然法则的地位等同起来，但这意味着未给“人”留下任何影响事件发展的余地吗？否。王韬在此潜在地持一种不同的权限划定的看法。历史时间的宏观问题明显在“天”的管辖之下，自然就不受人的控制。然而，法德间的仇恨为何偏在此时爆发，盖因仁慈的上天不愿法国加害于中国（天下）。[注]（可能王韬记得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如果不是欧洲的这场战争，可能导致法中战争。）[注]整个历史类型和因果关系的基本规律均受“天心”或“天道”的统治，在国运兴替的历史中起决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因果关系的实际运作中，人的作用赫然增大。例如“天”树立了恶有恶报这一铁的规律，但在具体情境中究竟是行善还是作恶，则取决于人。[注]

在王韬对普鲁士胜利、法国失败之原因的分析中，最好地说明了“人事”对历史事件结局的影响。王韬对这一问题十分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就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他刚刚横穿法国，印象十分深刻，回到香港即撰写有关该国的历史（见下）。相反，对中国人来说，普鲁士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未被视为欧洲的一个主要强国。而在战争开始几周后，普鲁士就把法国巨人打倒在脚下，王韬对此既困惑又着迷。[注]

在分析法国的力量突然崩溃的原因时，王韬自然十分注意军事方面，例如战略、武备、训练及休整。同时，可能由于脑海中深嵌着当时中国的局势，他对普鲁士在统一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政治强力表现出了更

深的赞叹。注 但在某种意义上，王韬认为，比直接的强力因素更基本的是道德因素。在他的观念中，对强力的使用方式比强力本身更为关键。他说："天下大事惟理可持之，岂徒尚力哉？苟以力凌人则鲜不蹶矣。"他还强调法国的命运便是这一命题之颠扑不破的明证。注 由于法国依仗武力强大而横行霸道，所以欧洲国家将其视为"无道虎狼秦"。注

在检省法德两国政府导向战争的内政方针时，王韬再度谈起合理利用强力的问题。他认为人道因素起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讨论普鲁士政府有效利用人力时，他评论说："盖天下建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故国之将兴也，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以为国家柱石干城之选。近来普国人才杰出诚有非欧洲诸国所及。"王韬接着又介绍了俾斯麦、毛奇及其他一些人的经历，然后总结道："观于普国之有才如此，而国之兴可知矣。虽无战胜攻取之事，识者已知其国势之蒸蒸日上焉。呜呼！人才关于国运，岂偶然哉？"注

难道当时法国缺乏有才能的领导人吗？当然不是。虽然法国可能没有像俾斯麦或毛奇这样的人物，但仍拥有杰出的领导人［王韬特别推崇梯也尔（Thiers）］。问题在于，拿破仑三世或是未用此类人才，或是即使用了也总是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注

实际上，拿破仑三世要对法国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王韬承认他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但认为他的统治被其好战所损害，这一决定性的失败终至"失地、丧师、去位、弱国"。

不过，拿破仑的好战并非法国失败的唯一原因，而困扰法国国家的深刻分裂，也应负同样的责任。孟子曾经说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苟非内乱已萌，则外侮必不作也。"在王韬看来，法国战争前夕的形势完全应验了这些话。当时法国国内对拿破仑政策的不满日益强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分歧日益扩大。注 与之相反的是，威廉一世自1861年继位以来，使普鲁士迅速富强起来。注

《法国志略》

似应回想一下，王韬于1868年到达英国后，曾邀请法国汉学家儒莲与他一起尝试用中文撰写法国史，却不知何故，儒莲并未接受这一邀请。但王韬有感于其同胞对法国的历史和文化几乎毫无所知，仍坚持自

己的目标。1870年，王韬返回香港不久，就应丁日昌之邀修订扩充一部世界地理书，该书原由美国出版，丁氏已要人将其译成中文。王韬认为机会来临，立即开始法国部分的工作，6个月后他向丁氏交上草稿。[注]

他的这本法国史原书共有14章，其中6章是以丁氏这本书为基础的，其他8章则内容全新。但不清楚这一版本是否出版过。我碰巧参阅的该书首版——也是我亲眼见到的唯一版本——经过了全面的修订补充，系于1890年出版的。这一版本名为“法国志略”，共有24章。除了最初的前言（写于1871年初）和法国地理及英法关系（1870年原文中有）外，似乎大部分是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注]

虽然从整体说来《法国志略》是一部与《普法战纪》非常不同的书，但全书所表现的那种历史观本质上却基本一致。这一点在最初的前言中尤为明显，王韬特别强调了宇宙循环运动的规律与个人对事件形成所负责任之间的张力[注]：

> 呜呼！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而法为之执牛耳，其国威兵力足以慑人，盖积渐使之然矣。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自古事势一去，智愚同尽，运会所乘，才庸共奋。夫亦准诸王道而权诸人事耳。岂由一朝一夕之故哉？
>
>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3页

王韬在这一段中，似乎把历史说成是一个可为人理解的过程，重大历史事件决不会偶然或无任何预兆就突然发生。但这种事件的原因却是长期酝酿所致，并且深藏不露，因此只有最富经验者才能洞见历史在特定时刻的运动方向。

王韬在此所谈的历史因果中人的作用问题与马克思处理同一难题的方法相似。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在王韬的理论中，人可以自由地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但事实上是否提供这种机遇，提供何种机遇，实则是由一个更伟大的非人格力量所决定的。

很明显，王韬《法国志略》的最初序言是在普法战争时写的。但这本书本身则写于战前及战后很久，所论范围极广。依照中国传统的版式，第一部分是依朝代次序的法国政治编年史，随后各部分的各个主题则按专题安排。历史的范围广而详，使人惊讶的是竟无史实错误。我们不久将会看到，虽然王韬对法国传统的某些方面做了批评，但在任何方面都无意贬低法国英雄人物或法国文化的伟大。而这与《法国志略》的中心目的完全相反，并摆脱了中国以往历史著述中的狭隘自大。正如王韬所说：

> 日人木原元礼曰自龙门作史，始创传体成匈奴、西南夷诸传，嗣后历代正史因之必立外国传以志四裔……惟其间叙事率多孟浪……侈乎文而俭乎实……余谓木原节夫斥昔日史官之陋，其说诚是也。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
>
> （《法国志略》，第2版序，第3页）

当王韬请他的读者不要嘲笑他以如此简短的篇幅或章节就涵括了法国从墨洛温（Merovingians）王朝到当代的历史时[注]，便表明中国人之世界观激烈改变的时代已经来临。他明确赞同日本人对中国传统史学具有狭隘性的指责，便是这种新世界观的最佳象征。

但提及《法国志略》中所表现出的世界主义，仅仅说出了事情的一半。王韬是如何认知法国历史的？什么因素影响着他看到了（或没看到）某些东西？而他对自己的见闻又是如何反应的？不能过分强调王韬对一个所谓“法国史”的客观现实没有反应。他确实为自己对法国史的认知有所反应，而这种反应紧接着又成为一个复杂选择过程的最终结果，该过程取决于他对历史进程的宏观理解，他作为一个19世纪的中国人的特别关怀，以及他所接受的信息的数量与种类。

说到最后一个因素，除了每天的报纸和西方人所写的汉语著作外，王韬承认在编纂《法国志略》时还有三个来源[注]：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及江南制造局所刊之《西国近事汇编》。其中最重要的是冈千仞的著作，而它本身却是几本法国二手著述的综合编译。因此，王韬关于法国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缺少原始材料之作。

用今天的历史学标准来衡量，《法国志略》不仅是三手著作，而且是三流著作。当然，不能如此评判。在19世纪并没有（我敢说20世纪也极少）一部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中文西方史著作。在王韬写作的背景中，相应的事实是中国人的蒙昧，所以判断其成就的相应标准，也应是他尽力破除这种蒙昧的效果。

如果《法国志略》仅是堆积有关法国的相关史料，那么无论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有多么重要，今天人们对它的兴趣将极为有限。所幸，王韬遵循中国的悠久传统（亦可追溯至司马迁），在其著述中充满了生动的个人评述，他总是离开正文本身发表“逸史氏王韬”的严厉评论。注王韬在开头6章中的插评最为吸引人。这6章是法国墨洛温王朝、加洛林（Carolingians）王朝、前后卡佩（Capetians）王朝、波旁（Bourbons）和波拿巴（Bonapartes）王朝的政治编年史。这些章节主要是以冈千仞的著作为基础的，有时他把自己的评论与冈千仞的评论并列起来，使我们能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西方的反应做极为清晰的细微比较。

例如，他们二人是这样看前卡佩王朝历史的：

> （冈千仞）异史氏曰：余观路易护民权及腓立谕国人有自由权利喟然叹曰，欧洲各国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其在斯欤！……岂非以自由心性出于天而非他人所能限定之故哉？欧洲各国有见于此，故分之权限，设之法制，使人人享自由之权利莫之妨害。……人人得自由，如此故虽世有污隆时有治乱，世道人心日愈振作……盖欧洲各国法律尚有三代之遗风，不务其名而求其实。
>
> 所有法律皆成于国会所定，故其为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愈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充厚矣！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心为一心。近世欧洲列国雄视宇内，职是之由。呜呼！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也。
>
> 逸史氏王韬曰：法固尚武之国也，历代侯王无不好大喜功，争雄竞胜以图树勋，伐于境外，拓疆域于国中……颇有嬴秦氏之遗风。顾逞其方张之气辄能得志于一时，而终患其不能持久，则以剽疾轻率之病中之也。法脱罗马之轭而自立国，英武之君六七作，成能开疆辟土战胜攻取，雄视于欧洲……惟其信任教士，俾预政权，轻听妄言，劳师远伐，卒至帑藏空虚，甲兵凋敝，驱数十万壮士殒戮于锋刃，轻死乎沟壑，而国几为之匮，岂非教之为害哉？

王韬得出结论说，西方在三方面与中国根本不同：君民共治；男女皆可承袭王位；政教不分。[注]他重述了法国的政治困境源于教会的权力过大的观点，并指责克罗蒂得女王（Queen Clotida）应为创建此种恶劣先例负责。[注]

王韬与冈千仞的评论截然相反。冈千仞作为落魄武士而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迅速变化的社会中，十分推崇一种权力被合理划分、权力与自由都有保障的政体（正如他所见）。他对法国的整个看法是非常肯定的：法兰西的法律体现了三代精神，法国史对要仿效它的全人类都大有益处。相反，王韬却在否定的意义上谈论法国史。王韬以残暴的秦朝而不是冈千仞的三代来形容法国的好战。他对冈千仞注意不够的一点，即教会对政治的卷入，尤为敏感。

王韬对教会—国家关系问题的关注部分是由他跟新教传教士的长期交往所致，他们在19世纪激烈地反对天主教。而另一原因则是，他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这些传教士在法国官方的庇护下十分明显地卷入了地方政治事务。[注]但若仅看到王韬在表面价值上对法国的否定是不够的。在此，王韬不仅是对法国做出回应，也是对冈千仞做出回应。虽然冈千仞是王韬的密友，但他是位日本人，而对日本的许多事情王韬很不喜欢。在有关后卡佩王朝一章的结尾处，二人再次做了评价，使二者的分歧更为明显：

> （冈千仞）异史氏曰：凡物有抵抗力而后可以神其功用，电气递书信于瞬息间，以燥湿二质为之抵抗力也。汽气走舟车于万里之外，以水火二质为之抵抗力也。异哉，抵抗力之神；于功用也，大矣哉。
>
> 夫兵者人民之抵抗力也！余读前后加颁的氏（译者注：Capetians，今译作“卡佩”）纪而后知兵之不用也。善用兵者，其奏功用于天下，极为神速。盖前加颁的氏承战国之余烈，仅能守封域已耳！而十字军一兴……欧洲全势为之一变。地中海长为百货辐辏，商船贾□荟萃之地。后加颁的氏有英法百年之役，而后考究航海、发明火器……遂至往来阿非利加南部，通商赤道以南之蛮邦……
>
> 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

王韬终于按捺不住，在此插入对冈千仞的忠告：

此日本儒士一孔之论也，兵力虽强，亦当以仁义道德辅之耳。彼以丰臣关白用兵朝鲜为能振兴国势，不知其后劳师糜饷，卒无所得。于国家诚何补哉？……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

在随后的正式评论中，王韬又集中于后卡佩王朝，时时抨击法国的穷兵黩武。然后又转而把矛头直接对准日本：

日本儒士徒见其国家效法泰西练兵讲武……而以县琉球侵番社谋朝鲜一试其锋，以为能自强矣。而不知其实外强而中槁也。日本与泰西诸邦通商开港之始，实于法最睦或亦渐染其遗习欤？呜呼，于法之穷兵黩武不以为可戒反以为可法……而不意出于儒士之口也。吾无取尔也。

（《法国志略》，卷4，第25—26页）

他们对法国革命的评论再次表明了彼此间的距离。（这次王韬未说明在他之前的评论者是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学者，但思想与冈千仞非常接近。）二者似乎都以为若无革命可能更好，也就是说二者都不赞同革命事业。但二者对革命的起因和从这些事件中所得教训的分析却根本不同。下面是日本人的评论：

余读波旁氏纪至路易十四曰：政府即我，我即政府也。喟然曰，路易十六之殃，其在斯乎？……

……语曰：一言可以丧邦，如路易斯言抑亦殆矣。路易既以斯言激众怒，故其致颠覆也。国人皆曰政府即人民，人民即政府也。报复之理势，不得不至此者也。……盖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限定其分也。路易既不准挟其威虐其民，则为之民者亦何难负其力凌其君乎哉？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

（《法国志略》，卷5，第32—33页）

这段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产生一个好政府的基础在于制

度。1789年革命被视为法国国王滥用权力的结果。但阻止未来革命的方法不是寻找一个不太专制的国王，而是建立一部对这位君王——任何一位君王——的权力有明确限定的宪法。这部宪法将自动阻止王室的专制。

宪政论是明治维新前半段（上述评论即写于此时）的主要问题。但在中国，这一问题直到19世纪的90年代才成为公开讨论的主题。所以不难理解，王韬对革命的分析会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王韬的评论写于80年代，他认为产生一个好政府的方法在于让圣人当政：

> 读法史至此，不禁掩卷而长叹也。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乃一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地翻覆，高卑易位……此与英国高门士弑王查尔斯事相仿佛。古今悖乱之事固未有甚于此者也。
>
> 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
>
> （《法国志略》，卷5，第33页）

如果希望王韬能看到法国革命或英法共和政体（无君）试验的任何正面价值，那就太过苛求了。在19世纪80年代，还无适当的中文词句来表达“革命”。注革命仍被视为弑君的同义词，被与“乱”的最坏形式等同起来。一个新词“共和”被用来表达“republicanism”。但在一个将君主制视为万物自然秩序中一部分的文化中，“共和”必将与混乱不堪联系起来。

但有意义的是，在讨论革命的源起时，王韬仍毫不犹豫地公正指责法国国王负有责任。的确，在王韬眼中暴民的暴力始终是可怕的，他从未忘记谴责此点。注但同时，他思想中的儒学成分，使他认为暴民暴力不可能自发生长形成。人民最终只是消极被动的力量。在儒学政治世界中，君王才是关键人物。人民治于人，而君王则治人。这样，人民造反并非他们本性要造反，而是君王的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反。注与他们神授权力的欧洲同道一样，儒学君王也不必非到天堂才对自己的罪恶算总账。

君主与王朝，造反与战争，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常见之物。当王韬论

及这些时，亦很难摆脱陈旧的框架。法国政治史提供了许多新信息，由于这是法兰西，所以这是一种不可小觑的突破。但在王韬那里（正如在冈千仞那里一样），并未提供新的教训。相反，它只是为早已熟知的教训提供了新的确证。

当王韬论述法国公共事业时，性质则完全不同了。在此，王韬摆脱了对更具“进取心”的日本精神的必要防范，因此第6章以后对冈千仞就未做评论。同时，他也摆脱了在中国论述政治史时极为严格的清规戒律。在《法国志略》后面的章节中，王韬对法国的银行、刑事审判、交通运输事业、教育制度、议会制度及其他一些制度做了热情洋溢的评述。这些“志”详略得当，体系合理。在许多情况下，王韬都大胆做了并不利于其祖国的比较。下引他对西方司法制度的讨论就颇能说明此点：

> 西律之最善者，在于设立证人，两造是非，必待证人以决之。又必众议佥同。案情至于万无可疑，然后定谳。……故从无仇家诬陷以致冤不能明。
>
> 徒流而外，无劓刵刵刖墨贯耳刖足诸刑，但有监禁而已。罪止及身，父子兄弟从不相及，即至叛逆大恶，其人但加显戮而已，妻孥不问也。亲戚邻里绝无株连波及之累。犯罪者没则已焉，无所谓身后之刑，故于中国之夷三族及开棺戮尸皆相戒以为残忍。此则犹有古昔之遗风，圣王之盛德欤！
>
> ……牢狱之制法极周详，刑无苛酷，待狱囚务极宽厚，日给饮食，岁给衣履，皆得温饱，无虞冻馁。茅檐蔀屋之家有不逮焉。时有穷氓之流为乞丐者，故犯偷窃求入狱中以反得安坐而食也。……在狱亦课以工作，视其所能，使之制造各物，或延艺匠教导，俾有一材一技之长，则出狱之后不至流为废民。狱中所制，售之阛阓，或即以此供狱费一，不至于饱食而嬉一，心有所注，不至为非。诚良法美意也。狱官必择诚谨者充其职。如有无端虐囚者立即斥去……如狱囚真心悔过，狱官见其诚，即可代禀于有司，赦之早出狴犴，不必届所罚之期也。
>
> 每值礼拜日，牧师或神父入狱讲道，使狱囚成集环坐，静听以化其顽梗之心，消其桀骜之气……以视中国之牢狱，相去奚啻天渊矣！此则犹有三代以上之流风善政欤。注

在19世纪的欧洲，是否有那么多的监狱符合王韬理想化的标准，是

大可怀疑的。但在政治领域暗示西方的优越性仍是儒学的禁区，所以它代表了对中国人通常只是赞美西方技术的有意义的超越。如果西方尚有值得仿效的制度，那它的历史肯定有些教益值得学习。而这就不仅仅是国王和王朝、造反与战争了。

《西学源始考》

1889年初，王韬首次也是平生唯一一次游历了中国北方（山东），返回上海后，他再次生病。他在上海的朋友催促他将生平著述印行出版。在得到经济资助的担保后，他欣然同意。此后一些年中，他将许多往年著述手稿首次付梓。其中6篇是有关各种“西学”的，包括双面50页的《西学源始考》。虽然我们将在第六章专门探讨王韬的提倡西学，但因这一篇是按历史文章写就的，所以似宜在此做简短讨论。

但《西学源始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它基本上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874年的西方文化发展编年。“西方”被用来囊括从印度到美国的一切。年代系根据西方纪年，但附有相应的中国纪年。在每一年代下，王韬都列举这一年在技术、科学、宗教、建筑、文学、商业等方面的重要发展。有关政治事件的篇幅相对说来较少，例如，法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干脆只字未提。越靠近近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占的篇幅就越多。虽然这部著作包括的范围极广，但所有东西都是简略提及，缺乏更具体的材料。从下面的一些摘录中，可以略窥它的特点：

> 九百余年当周孝王时，希腊诗人荷马作诗，以扬历战功，同时海修达继之，所歌咏者多田野鬼神之事；二人并称为希腊诗人之祖。西俗崇尚诗歌由此始。
>
> 六百余年当东周匡定二王之时，希腊七贤皆善理学。其一曰他里斯，精于天文。在周匡王四年之日蚀度候皆先为他里斯测定无讹。希腊之天算格致当以他里斯为创兴之祖。
>
> 三百年前当周赧王时，希腊名人欧几利德著《几何原本》十五卷，几何之学为希腊人所创立。如他里斯、布士哥拉两人皆精此理，古今人咸共推仰。
>
> 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顺帝至正八年，欧洲地震，英久雨，大水疫疠流行，其病若中国之霍乱，俗名黑死，欧洲患此病而死者二千五百万人，伦敦一城共死十万人。一日夜死二百人，诚非常之灾异，欧史所仅见也。一千六百六十九年，国朝康熙八年，奈端始作

分光法，白光入三角玻璃分为七色，再加一三角玻璃，仍合为白光。[注]

《西学源始考》在许多方面都值得重视。首先，王韬没有试图对西方的古代进行抨击，或像许多同代人所习惯的那样，提出西方文明的卓越成就全都源于中国。[注]的确，在两三处，王韬评论道，有些东西确系中国首先发明，或自不可考的远古起中国就拥有这些。但这几处他并未说错，如磁力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大多数情况下，他谈到一些具体的发现与发明时，根本未提中国。

王韬的其他作品也表明，他与“中国最先”的论断无缘。此点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在有关古代埃及的短文中（写于1875年以前），他承认艺术与文字在埃及出现的时间比夏代还早，而且，根据考古证据，人类的起源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南亚，靠近亚、欧、非的结合处。[注]另外，在晚年的一篇作品中，王韬毫不留情地反驳了那种广为流行的认为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源于中国的观点。[注]

《西学源始考》的另一方面亦极有意义，即它颇为强烈地表明，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发展——由于一个新发现紧接另一个新发现而不断进取。这就远离了循环史观。循环史观需要的是不断重复，这就排除了任何真正的新事物的发生。虽然如此，王韬仍只是在对待文明的总体进化时愿意摆脱循环史观，而当他面对一些特定的文明时，似乎对旧的观点更感惬意：

> 余尝考之西国古文，西土自古著名之邦亦不一矣。举其大者大抵不下十有余国，迭为盛衰，争相雄长。或此兴而彼灭，或互并而旋分。如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希腊……曰罗马……曰马其顿，曰叙利亚，曰犹太，曰巴勒斯坦，曰腓尼基，曰推罗，曰西顿，曰印度……曰波斯。自昔并为声明文物之区，比之泰西之岐丰、邹鲁，上古文字制度礼乐政刑象纬历数器艺格致咸于此取则焉。曾几何时，凌夷衰微，历代相传之法荡然无存，而其人民亦复蠢然如鹿豕，昔为欧洲人所则效者，今反为之服役，抑何天道循环，不能逆料一至于斯也！

王韬继续说到，这一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遥远的古代。当美洲在4个世纪之前被“觅得”时，人人都称其为“新地”。但考古学基础无可争辩

地证明，在墨西哥这些地方曾有过高度文明的民族居住。王韬雄辩地问道："然则国之强盛，民之智慧可长恃哉？"注

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与中国

从理论上说，如果王韬完全遵从循环论历史观，他就该为中国像其他民族一样终有一天面对毁灭而高兴。但就感情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王韬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历史规则有例外吗？中国能免受它的操纵吗？

事情的真相却是，王韬根本不为此类问题而烦恼。如果符合他的目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宣布这一历史的普遍法则。但当情况需要时，他同样愿意得出结论说，人的命运（历史）是由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对那些相信改革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背景决定一切。只有牢记此点，才能认识王韬思想的意义。

下面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在《普法战纪》中，王韬把西方作为一个世界。所以他完全能够把法国当作一种衰退的力量而把普鲁士作为一个兴盛的国家，并认为拿破仑三世为好战的暴君，而威廉一世为开明正义的君王。只要在西方的范围内，王韬就能理智超然，因为无论法国还是普鲁士获胜，无论某一国强或弱，对王韬来说最终都无关痛痒。然而，一旦王韬的关注转向整个世界，一旦在中国和西方间再次划定战线时，他的作为中国人的希望便决定了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判断。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正确，王韬高傲地相信，中国未来在世界上将重居优先地位。

可以十分容易地看出，王韬历史观中的唯意志论因素是如何被用来支持这样一幅图景的：通过有意识的转向（即改革），中国将再次强大。看不出来王韬的这幅图景是怎样从决定论的循环概念中寻求支持的。王韬在他较早的一篇社论中曾论证说，中国的世界优先性（他明显是指中华文明）是历史中的永恒因素。但这种优先性却不能永远维持，因为中国也受强弱循环替代的普遍规律支配，而当中国变弱时，就成为非中华民族的猎物。但纵观"夷""夏"关系的漫长历史，便显示了某些绝对确实的东西：一个又一个外族曾利用短暂的强盛来威逼暂时软弱的中国，但外国侵略者迟早要像洪水般退去，被时间淘汰尽净，而中国却冷

静而持久，宛如一座高山，虽时时被洪水淹没，却永远屹立。未来与过去一样，可望出现明君，革故鼎新，重振国家。在此，王韬告诉我们："则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注]

"强者"的最新代表（在这一背景中当然具有反面意义）便是西方，王韬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出西方的强盛必将引向毁灭。其所以如此，也有普遍的循环背景，因为军事技术迅速进步到能毁灭全人类的地步，由于"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天道循环断不或爽"[注]，西方军事科学明显接近这一界限，它的发展必须得到控制，并掉头转向。

西方强力必将毁灭的另一个原因，也是王韬最经常谈论的原因，便是它被不道德地利用。与此相关的是王韬对战争这种强力的主要表现形式的态度。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改革者，王韬清楚地看到中国必须在军事上能与西方抗衡，所以他的著述中充满了有关军事的信息。但是，作为一个儒学道德论者，或者说作为一个人，他视所有战争皆为罪恶，尤对现代武器的大规模屠杀能力感到毛骨悚然。[注]

但是，人这种生物却总是热衷于战争，所以尽管是圣君也被迫拿起武器。[注]问题最终还得靠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来解决：

> 夫欲辟土疆广财赋以厚自封殖，此私也，非公也。持其力而纵横自恣，适足招邻国之怨而已。即使力不能敌一旦，必有群聚以起丛而毙之者矣。若夫睦大国保小邦以期相安于无事，维持于不败，此公也，非私也。一旦苟有敌国外患，虽力不足以与之相抗而理足以胜之。理之所在，众自助之，能集群力以为力……则又何兵寡之足虑？
>
>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20页）

很清楚，为扩大疆域或增加财富的目的而自私地滥用国家强力是不道德的。因此西方在近代的全部扩张就都被定义为不道德的。[注]但在王韬心目中同样清楚的是，历史是合乎天命的。所以，如果历史仍有意义，西方企图以强力统治世界的趋势必将被扭转。

然而，世界的未来将仅仅是过去的再现吗？难道西方的入侵仅仅是古已有之的"狄夷"入侵这种循环模式的最新表现吗？既对又不对。西方的入侵与先前"狄夷"的骚扰，其相同之处在于都使用暴力，而且入侵者

对中国人的宇宙观也都全然无知。但西方又与先前的入侵者不同，因为它具有不断提高发展的技术水平。西方巨大的军事力量毕竟是以其技术为基础的。正是这种技术使得从海路的大规模外敌入侵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为可能。[注]

所以，世界的未来与其过去在一个基本方面将有很大不同。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要反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须采纳西方的技术。所以王韬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完全赞同技术革命，强调中国从前就有过广泛变革（秦汉统一就是证明）。[注]“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注]我们很难把这种变化观与王韬在其他场合提出的循环论调和起来。的确，看不到他抛弃后者的任何证据。而事实上，在他的一些著述中，可以发现这两种观点是并行着的。[注]

在他看来，技术的发展既会使西方在世界上居优势地位，又会使这种优势终归完结。这样，技术便有双重作用。它还具有为建立一个单一的宇宙秩序提供物质基础的功能。王韬用“大同”一词来描述这种秩序，缘此，后来他往往被视为康有为（1858—1927）的先驱。虽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还是应当指出，王韬的“大同”思想与康有为相比还极其简陋，并不包含康有为乌托邦中所充分展开的人类进步观念。[注]

而且，二者的“大同”思想还有一种重要的区别。虽然康有为的“大同”要比王韬的激进得多，但它仍然自有师承，来自公羊学派对儒学信条的不太正统的解释。这一学派的主要信条之一，便是认为社会的发展要经过“三世”，最后一个阶段为“太平”和“大同”。公羊学派的信奉者从中得到启发，强调政府必须不断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条件，借此为改革辩护。

王韬对这些理论当然很熟悉，杰出的公羊派学者龚自珍的儿子，便是他早年在上海的一位密友。而且他对改革的赞同态度等，也使人可以想见公羊学派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尽管他的“大同”思想可能受公羊派思想的影响，王韬却从未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承认自己属于公羊学派。更进一步说，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大同”思想的主要灵感之源根本不是来自儒学，而是来自西方。王韬对于在遥远的未来世界“道必大同”[注]的预言，直接取材于傅兰雅（John Fryer）的下述告白：“伟大的普遍宗教正在逐渐发展，终将拥抱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语

言。”[注]在与王韬关系甚密的其他西方人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样的论述。事实上，对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未来的玄想，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受钟爱的一种消遣。[注]

但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拥有形成未来普遍文化的决定性专利权，这正是王韬与其外国朋友的分道扬镳之处。他的未来图式同样也是一种文化界限，只不过这种界限来自另一种不同的文化。王韬相信，在缺乏一种至上权威之源的情况下，世界将永无宁日[注]，而他又相信，这种权威之源绝不会是西方。他自信地写到，等技术差距被拉平，而西方丧失其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时候，西方将“陆詟水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然后此言验矣”。[注]要么，他以一种更为刺耳的声音说到，当其力量的优势被剥夺之后，所有西方国家都将在中国面前“俯首以听命”。[注]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未来世界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当然不是技术。“器”（技术）只能进行地理上的征服，把世界联在一起，但却“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只有“道”才能完成这样恢宏的目标。“道”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象征着终极的真理。王韬认为它是一种自然而然地适合全人类的价值准则。“道”在本性上是不变的，所以是超历史的。但它在某种形式上仍与历史相联，正如王韬所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注]

“道”是普遍的：“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注]所以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并非中国所特有。王韬在这一点上十分明确，强调“道”也为西方所知，而且西方历史也产生了它自己的圣人。[注]不过，自历史肇始之日，其他文明所效忠于“道”的表现都是有缺欠的。如果能在任何意义上说王韬持有人类（与技术不同）“进步”观念的话，那么，他持的是一种极端反孔多塞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完美的标准，这种标准将渐渐扩及全人类。[注]

此种“道”的观念的政治含义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道”体现为高尚的伦理训令，只有当至上的权威来自“道”或距“道”最近的个人或国家时，世界才有合理而正当的秩序。在此背景中，用“国”这一词并不完全恰当，因为“道”的运作范围可以被想象为——而且必须被理想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如果要限定“道”的范围，中国便是引力的中心。因为在王韬的观念中，“道”肯定产生在孔子之前，但却是在中国圣人的教

导中找到了最完美的历史体现。的确，“孔子道，人道也”。注

如果我们返回到前面有关世界未来特点的问题，即王韬的“大同”，我们的回答在本质上肯定会自相矛盾。很明显，在较低的、更为世俗的领域内，变化总在发生，未来的世界将有所变异。但在更高的领域，在人类终极价值栖身的不变的家园，仍是王韬的安乐窝。因为，过去将在此永存，而且这是一个熟知的过去，即中国的过去。

---

1. 杨联陞，《朝代间的比赛》，载《庆祝李济先生70岁论文集》，台北，1965年，卷1，第139—148页。
2. 芮沃寿编，《中国思想研究》，芝加哥，1953年，第30—31页，第36页。
3. 普利布兰克，《中国历史批评：刘知几与司马光》，载《中日历史学家》，第145页。
4. 狄百瑞，《中国传统之源》，纽约，1961年，第166—168页。
5. 卜德，《中国哲学中的和谐与矛盾》，载《中国思想研究》，第21页。
6. 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结构研究》，载《中国制度史研究》，剑桥，1963年，第12—17页。
7. 《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14—24页；《甕牖余谈》，卷6，第14、10—11页。
8. 《弢园著述总目》，第8页；《弢园尺牍》，卷7，第16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1页。
9. 《弢园著述总目》，第10页。
10. 《弢园尺牍续钞》，卷5，第7、9页；《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21—24页，卷9，第11页；《弢园尺牍》，卷8，第16页。
11. 《弢园尺牍》，卷8，第8页。
12.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4—16页。
13. 《王韬：一个过渡人物的生平与著述》，第25页。
14.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5、17—21页。
15.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7页。
16.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7页。
17. 柯文，《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增长，1860—1870》，剑桥，1963年，第229—261页。
18. 《普法战纪》，第1版序，第4页；卷20，第36页。
19. 《弢园尺牍》，卷8，第8—9页。
20. 《普法战纪》，卷1，第24—25页；卷3，第18页；卷6，第16页；卷15，第13—14页。
21.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20页。
22.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6页；《普法战纪》，卷6，第16页。
23. 《普法战纪》，卷2，第16—20页；卷4，第24—25页。

24. 同上，卷14，第7—13页；卷20，第36页。

25. 同上，卷6，第20—21页。

26. 同上，卷2，第20页。

27. 《法国志略》，序言，第1页；《弢园尺牍》，卷8，第8—9页。

28.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2—14页；卷12，第21页。

29. 《法国志略》，序言，第1页。

3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卷1，第603页。

31. 《法国志略》，第2版序，第1页。

32.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2—14页；卷12，第21页。

33. 诸桥辙次编，《大汉和辞典》，东京，1955—1960年出版，卷11，第98页。

34. 王韬1859年给周腾虎的信中即谈到这三点不同，见本书第一章。

35. 《法国志略》，卷3，第27—28页；卷9，第28页。

36.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6页。

37. 中国古代即有“革命”一词，但直至19世纪90年代，该词并不具有现代意义。日本人较早用“革命”一词来表达现代意义。参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99—100页；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卷2，第119—128页。

38. 《普法战纪》，卷16，第4—20页。

39. 《法国志略》，卷21，第19页。

40. 《法国志略》，卷17，第35—37页；对英国司法的赞扬，见《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17页。

41. 《西国天学源流》，第27—28页。

42. 他里斯预测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发生日食。这一准确预测使他当时成名。

43. 《西学源始考》，《西学辑存六种》之二，第4、5、11、22、35页。

44. 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载《中国近代史论丛》，李定一编，台北，1956年，卷5，第216—258页。

45. 《甕牖余谈》，卷5，第2页。

46. 《西国天学源流》，第29页；《漫游随录》，第9848页；《法国志略》，卷17，第11页；《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22—24页。

47. 《西学源始考》，第7页。

48.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6—19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9页。

49.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7—21页，卷3，第17—19页。

50. 同上，卷8，第17—21页，卷3，第17—19页，卷4，第10页，卷5，第6、13—14页。

51. 同上，卷8，第17页，卷3，第17页。

52.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17—19页，卷5，第14—16页，卷6，第1—3页；《弢园尺牍》，卷9，第16页，卷11，第20页，卷12，第1—3页；《弢园尺牍续钞》，卷2，第9—10页，卷4，第15页。

53.　　《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7—8页；《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17页。

54.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0、12页，卷5，第17页。

55.　　同上，卷1，第13、10页，卷11，第13页，卷7，第17—18页。

56.　　同上，卷5，第16—18页。

57.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18、23—24页，卷1，第2、11、12页，卷2，第1页，卷4，第23—24页，卷5，第16—18页，卷6，第9页，卷10，第3—4页，卷11，第13页，卷8，第19—21页；《漫游随录》，第9830—9831页；《弢园尺牍》，卷7，第17—18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8页；《西国天学源流》，第29页；《法国志略》，卷17，第15—16页。

58.　　《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9页，卷1，第11页；《漫游随录》，第9830—9831页。

59.　　引自斯潘塞·J.　帕尔默，《朝鲜与基督教：与传统认同的问题》，汉城，1967年，第22—23页。

60.　　艾约瑟，《中国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位置：为表明欧亚语言同源的尝试》，伦敦，1871年；《宗教观念在远东的早期传播》，伦敦，1894年。湛约翰，《中华源起：追求中国与西方在宗教、迷信、艺术、语言和传统方面联系的尝试》，香港，1866年。

61.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7页。

62.　　同上，卷5，第18页。

63.　　《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8页。

64.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页；《法国志略》，卷17，第16页。

65.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页；《法国志略》，卷17，第16页。

66.　　《漫游随录》，第9830—9831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页；《西国天学源流》，第29页。

67.　　孔多塞认为人类在所有方面（道德、精神等等）都能“无限完美”。

68.　　《漫游随录》，第9830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11页，卷6，第9—10页，卷7，第23页。

第三篇
为新中国开的药方

序曲

当1807年8月“克莱蒙特”（Clermont）号汽轮沿哈得孙河航行的时候，岸上挤满了激动不已的美国人，欢呼它的启航。气氛如过节一般，旁观者感觉殊佳，这与汽轮首次在中国水面出现时的那种疑惧气氛完全不同。但从它们各自的角度来看，哪种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费正清曾经写道：“在我们新大陆，我们帮助产生近代世界，而近代世界却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注当19世纪西方入侵中国时，使中国人失去平衡，情况如此严重，以致只有经过了几十年他们才开始理解——而且仍有些模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的本质与深度。在这种环境中，怎样才能应付这种挑战远非不言自明的，而下述应战之方亦并不罕见：

> 老、庄之旨，柔可以克刚，退可以为进，惟能善用其弱，而弱即可为强矣。过刚刚必折，躁进则必蹶，惟轻用其强，而强无有不弱者矣。历观古今来享国久长者，莫如周代，然自平王东迁以后，萎靡不振，几若赘旒……赵宋于诸代中为最弱，若能历与辽、金、元三朝相抗，延至三百余年，则以弱而能自存也。
>
> 转引自《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19页

这段话摘自19世纪60年代末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旨在表明，如果中国人相信以放弃本身历史悠久的习俗、方法而取法西方来反抗西方，这是自我欺骗。中国最好的抵抗方法不在于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及建筑炮台，而在于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圣德。

这家报纸的编辑将该文送给远在苏格兰的王韬。王韬立即写了长篇反驳文章，申明自己认为亟需变化的立场，疾呼一种能战胜西方威胁的精神框架。注

王韬一开始就大胆地宣称世界正在经历巨变，所以中国具有3000年悠久传统的习俗和制度的确面临毁灭的危险。然后他对地球的西北部（西方）与东南部（中国）进行了比较：“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

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注]

王韬承认有的时候变能为静胜，刚能为柔克。但这最多只是一种缓慢不确定的过程，可以想见，西方却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国唯一理智的行动，便是以“师其所长”来痛击西方。这当然意味着变化，但却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变。据王韬说，这种变化是天经地义的：“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注]

但如果中国在成为一个强国之前必须变革，便意味着它必须抛弃传统习俗、政府、文化而全盘西化吗？王韬回答强调说：“非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

王韬继续评论说，和中国开始只是一个小国后来逐渐扩大并在清代最为广阔的情况一样，欧洲历史亦正在这样发展。像一排巨浪一样，欧洲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印度扩张到东南亚，又从东南亚扩张到华南，其知识也随之扩展。

如此根本性的变化，非人事所能筹划，而是“天”的安排。由于是天意在起作用，故只能对中国有益。王韬的“信仰系统”中最深刻的一点是，始终相信“天”（或运会）在中国一边：“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王韬早些时候曾特别申明他所说的“变”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变。而现在他却又在讲“全面的变革”。这种出尔反尔如何解释？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出尔反尔是一种较为表面的现象。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王韬所讲的“一变”，并非表示要改变一切，而只是能被改变的一切。“一变”并不包括“内”的范围，内是本质，在价值上与“道”类似。另一方面，它包括“外”这种可变化的范围。因为“外”包括除“内”以外的一切，所以变化的潜在范围极大。可以想见，只要不影响“内”，王韬认为中国可以进行广泛的变革：

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舶，行陆

> 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捩。虽……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其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为病，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
>
> 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

这一段话的意义取决于我们分析它时采用的理论框架。对19世纪的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儒学与“现代性”是不相容的[注]；只有在传统秩序被打碎之后，新的现代秩序才能建立；由此——至少是暗含这一层意思——谁要是赞同未对儒学价值和制度提出根本批评的改革，都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接受这一理论逻辑的人，必须倾向于贬低那种仅要技术变革的主张：技术变化只是小修小补，只有通过价值变化才能实现重大的体系修正。

我发现这种推论在某些方面有缺欠。首先，在探讨“现代”与“传统”时，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拒绝那种认为它们必然互相反对、彼此排斥的观点。正如高慕柯（Michael Gasster）所概括的那样：

> 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多数社会都具双重性，即它们都是现代与传统的混合，而不是要么完全现代要么完全传统的。它们是“文化变革在其中发生的系统”，而且正是每个社会内部之“现代”与“传统”的因素间的不同关系类型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从这种观点来看，最好将现代化理解为一种向现代性的境界的导向，但却不能完全达到；的确，并不存在现代化的最终境界，仅有现代化与传统力量之间不断的调整过程。[注]

对此，我仅想再补充一句，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东西并不能正好符合这两种成规。

如果接受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且所有社

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那么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从客观的角度看，在19世纪的中国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前，儒学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被抛弃？进而，此种变化必须要有一段向该秩序公开挑战的前奏吗？其次，这些问题引来许多更为棘手的问题：如果承认儒学与传统秩序并不一样，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它们？有意识地拒斥儒学秩序（无论怎样定义）确能保证不继续受其污染吗？反之，不公开就儒学问题展开争论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使儒学受到保护和免于破败的效果吗？简言之，真实的变化与感知的变化间的关系何在？感知的变化与欲想的变化间的关系又何在？

我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想提醒人们不要轻率地接受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是些极端棘手的问题。其中一些可能永远回答不了。而且可以肯定，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不具终极性，因此重要的是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

贬低处于“船坚炮利”阶段之中国改革思想的倾向，反映出一种广为接受的设定——1895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努力“失败”了。这一设定最初是由口岸城市流行看法煽起的，它认为中国的“拙劣”难以忍受。而近来，这一设定又因学者们对日本事例之意义的误解而加强。正如本书开始时所述，把中日的现代化努力进行比较是极有价值的。但做这种比较时必须极其谨慎。如果只看到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随后又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一直积弱这一事实，便得出结论说日本“对西方的反应”是迅速而成功的、中国则是迟缓而失败的，那我们实际就无视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在西方人远未到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注]为矫正这种推论，有必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把中日两国作为彼此衡量的标准，还要把它们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并且在诸多变量中仅把西方的冲击作为唯一的变量。当我们这样做时，便可发现中国和日本都比较成功。[注]中国仍落在日本的后面，但它起步也晚得多。

像“失败”与“成功”、“迅速”与“缓慢”这类词只有相对的价值，进行比较时必须牢记此点。在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历程时，应该提出的关键问题可能并不是为什么二者对西方之反应的速率和成功程度如此不同，而是为什么中国只有在外部的刺激十分严重时才真正开始现代化，而日本早就开始了。[注]

在前此阶段进行讨论时受到了种种类似理论设定的持续影响，这是中国19世纪技术方面的改革受到普遍非议的部分原因。结果，某些最基本的分野都被掩盖了。作为客观事实的技术变化被与对技术的首肯等同起来，而后者却是主观的，并表明一种价值倾向。另外，对各种不同种类的对技术变化的首肯也很少试作区别。人们可能赞同有限度的技术变革，或许也可能赞同技术革命。他们可能对技术变革抱热烈而积极的态度，将其视为“文明进步”的天然伙伴。他们也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无可避免的不幸，某种本不想要但迫于环境的压力不得不要的东西。最后，对技术变革的首肯还可分为各不相同的特殊原因（并非所有的都彼此排斥）：如想改变生活条件、想更有效地与外国抗争、增强国家力量、保存现有价值和制度等等。

假设一个人对技术变革的首肯的确多多少少反映了他对全面变革的态度，那么王韬在19世纪60年代末处于何种地位？与当时其他中国人的方案相比，他的改革大纲、他对未来的预测究竟激进到何种程度？尽管不可能确切地说明在此关节点上王韬究竟准备走多远——恐怕他本人也不知道——但他肯定比其同代人走得远得多。其他改革者赞成必须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但身居要职的中国官员对修建铁路的立场都十分暧昧[注]，而且除了在几个高度西化的口岸城市外，据我所知，在19世纪60年代末，无人准备赞同在中国经济中广泛应用机器。

王韬为技术变革辩护时列举的特殊原因也同样重要。许多19世纪末的改革者把西方定义为“物质”而把中国定义为“精神”，力主只有采纳西方的物质文明才能使中国的精神文明免于灭亡。这便是“体用”的方法，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概括使之载入史册。

尽管说王韬对“体用”态度毫不理会是不正确的——此处与别处一样，他也可能前后矛盾——但他思想中的核心冲动还是指向另一方面。王韬认为中国文明的本体——价值核心，即中国的“道”——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在谈到对技术变革的态度时，他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他可以没有必要以此为理由来反对技术变革；他也可用同样的逻辑以并无妨害为理由来赞扬大规模的技术变革。如果他选择后一种推论方式，必会有种种理由，但绝不是为了保存中国之本。我们发现，事实确是如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王韬为技术革命做了两点辩护：第一，这是中国与已经经历了这种革命的西方国家进行抗争的唯一方法；第二，“天”要以

此作为世界未来统一的一种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从哪一点看，保存中国价值都更多地不是被认作技术变革的理由，而是被视作它的有限条件。

这样，在提出彻底的技术变革时，到底王韬仅是辩护它的不可避免性呢，还是某种程度借此种不可避免性来加强自己的辩护呢？换句话说，他是因为这种变革无论怎样都会发生才说自己希望这种变革呢？还是因为他希望发生这种变革才将此说成无论怎样都会发生呢？就表面而言，王韬好像是把技术革命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他强调，并非他想要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而是它们作为环境与时代的结果必然变成现实。但在这种背景中，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接受王韬言论的表面意义。毕竟这不是给朋友的信件或私人日记，这是报纸上的文章。王韬的目的是为了劝说报纸的读者。由于不得不假设这些读者是反对大规模技术变革的，从策略上说，只有将这种变革形容为是不可避免的才有意义。也许，只有他此时的旅行日记才能最为准确地反映他对“机器时代”即将来临的个人情感。可以回想一下他在日记中无条件的敬畏反应（见第三章）。

王韬对技术变革十分激进的首肯，使他较早认识到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同样是必须的。在19世纪70年代，王韬成为制度变革（变法）的最早倡议者。不久，他对发明创造的首肯便扩展成对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方面的基本改革的欢迎。无可避免地，随着这些发展，为变化提供合法性的旧有理论支持便渐感不足，王韬必须寻找新的支持。[注]

作为这种新的理论支持之一，在历史本性的问题上，反映了王韬历史观中发展的和非循环论的一面：

>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注]

面对西方对中国停滞不前的批评，王韬的反驳颇为有趣。本来，他可以把这种批评转变成一种说反话的恭维——对中国永恒性的颂扬。但相反，他实际并未如此，而是做出了强调“我们曾有变化”的反应。这意味着一种对传统中国背景中并不常见的“变化”观念的情感认同。

在王韬对改革的其他颂扬中，也可看到这种积极精神。他断定，适应时代的调整变化始终是圣人之道（孔子之道），倘若孔子生活在19世纪，肯定也会支持引进西方技术和普遍改革。[注]把孔子假设为改革者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王韬再次成了康有为的先驱）。因为这不仅为某一特殊的变化提供了有力的辩护，而且在整体上将一种对变革持更为肯定的态度注入到儒学中去。

同样具有革命性的——虽然不太明显——是王韬关于“道”的普遍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他的同代人的主导倾向是将中国等同于“道”，而将西方等同于“器”。而王韬则认为“道”是人类文明的特征，因此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本质，由此为这幅图画注入了新的因素。这使西方进入中国的话语世界，而且无论是否情愿，在此过程中它为中国不光从西方借“器”提供了理论根据。

王韬把儒学动态化、把“道”普遍化，从而对儒学传统进行了修正。但这种修正是否达到了再不能将其称为儒学的程度？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合法性根据的努力中，王韬是否已把儒学阐释得毁灭了呢？当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确容易陷入一种回溯性决定论（retrospective determinism）。自“五四”时期自觉地排拒儒学起，这种回溯性决定论总把上一时期对儒学的所有修正都看作势在必然的结局。摆脱这种推理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应牢牢记住，中国历史从前曾发生过的儒学教义的激烈变革，并未导致这一传统的终结。很可能，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都不被承认为真正的儒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视为是孔圣人的真正传人。同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可能无法断定王韬对儒学的随意处置在客观上是否会导致儒学的不幸。所以我们能有把握说的只是，王韬依旧自诩为一位儒家。

---

1. 《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剑桥，1967年，第104页。
2.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15—19页。
3.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6页。
4. 《朝代间的比赛》，第146页。
5. 对此种假设极有影响的两本书是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和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6. 《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改革与革命》，见《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芮玛丽编，纽黑文，1968年，第83页。
7. 罗伯特·E. 沃德，《现代日本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8年，第580页。
8. 柯文，《清季中国：与西方的碰撞，1850—1900》，克劳利；《现代东亚：论文

解释》，第48—49页。

9.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卷1，第3—14页。

10.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274页。

11. 《王韬与晚清自强和改良运动》，载《中国论文》，卷17，1963年出，第101—130、118页。

12.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0、12页；卷5，第17页。

13. 同上，卷1，第10页；卷11，第13页。

第六章 教育改革

王韬的特殊之处在于，对他不适宜简单的归类。他与官场广有联系，但从未做过官。他襄助理雅各译书，但不能真正称为典型的学者。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短暂几年中，他似乎是“下层绅士”阶层的一员，而一旦迁到上海并开始为伦敦会工作时，那么即使承认50年代后期他参与军事活动的绅士身份，其“绅士”头衔也很快就不合时宜了。他写了一些小说和历史书，但无疑他远不止是一位小说家，也算不上一位历史学家。至于他创办报刊的活动，这明显属于今天（以及当时）的新闻事业，却又不是他的专职。无论如何，王韬创办报刊并不只是出于营利的目的。虽然“改革家”一词明显适合王韬，但用它也未必能恰当地区分开提倡改革与实行改革的不同。王韬大力提倡改革，身体力行，但几乎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来实行他的改良主义主张。

然而，“改革”一词却最能概括王韬关注的焦点。王韬主张变革。他要求：提高行政效率，任人为贤；提高商人地位，承认商业在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仿效西法，崇尚西学；扩大在野人士参政议政，以及修改现行制度的其他多项措施。王韬深感社会现状令人沮丧而不能容忍，从而在传统的永恒之道框架中描绘了一个较前全然不同的未来世界。他要求中国率先筹划未来，否则，他担心中国会在未来中湮没。

在本章及随后的两章中，我将把王韬的改革思想分为教育、经济、政治三个主要方面来论述。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改革科举制当然不仅涉及教育领域而且具有政治意义，而开办女学则对社会和教育同样重要。更显生硬的是这些划分都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标准，仅举一例，近代西方对政治和教育领域的区分比19世纪的中国清楚得多。我试图通过考察王韬各类改革主张的众多细节来克服碰到的困难。

涉及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另外两个问题，是王韬活动的途径和影响问题。无论何时何地的改革者都有改良事物的愿望，但他们表达这种愿望的有效途径和产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则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天壤之别。就当政的改革者来说，这种差异可能稍小一些。因为他们置身官场，而任何官场都有某些相同的基本特征。但就非官方的、独立的改革者来说，则相差甚大。我们所知的最突出的例证是美国普通公民——如果他

们要以赞成或要求某种具体改革的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一般不满，他们有下述不受限制的手段：上书国会议员、发表演讲、组织压力集团、报刊宣传、派代表轮番请愿、游行示威、抗议、诉诸法庭、竞选或选举政见相同的候选人。这种政治制度是特意为反映舆论而设计的。所以，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总是试图通过影响、动员或获得舆论工具来产生变革。

这当然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美国政府不仅对舆论做出反应，它有时引导舆论，有时操纵舆论，有时无视舆论。然而，总的说来，舆论确实是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19世纪后30余年的中国同样如此吗？当时究竟是否存在舆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是什么性质的？又是如何构成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是否存在一个能替代“舆论”的机制，即存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听众，而关注国是变革的在野人士能否以言论上达于他们？这些都是本书的重要问题。因为，虽然本书不是研究王韬的影响问题，但事实上，作为改革的倡导者，王韬能够有所作为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某些人施加影响。

在王韬晚年，中国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样，王韬的情况变得复杂了。无疑，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10年，一种真正的舆论开始表现出它的威力。它采取的手段，诸如抵制、抗议示威、请愿、选举、集会结社、创办报刊，其方法完全是现代的。清廷也开始受到重要影响，但其反应与其说是天生的敏感，毋宁说是在绝望中的挣扎。[注]

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王韬已经大大落伍了。在他积极宣传改革的19世纪70—80年代，除了报刊较重要外，表达民意的这些现代手段都尚未在中国产生。所以，比较而言，王韬宣传改革的途径及影响范围受到严重限制。19世纪70—80年代，舆论实际上还只是士大夫的意见和知识界的意见。因此，王韬不是直接给官吏及其幕僚致书陈词——他常常如此——就是对更广泛的知识界撰文宣传，希望他们一旦有所领悟，那么即便不积极推动变革，至少也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注]

寻求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劝诫别人是王韬的主要工作，撰文陈词是王韬的主要办法。因而可以说，王韬的全部改革尝试实际上是一种教育。但是，王韬的文章包含了一些更具体的教育改革内容。这正是本章要论述的问题。

人才

培养人才对于社会的全部重要性问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跨越了前近代中国和近代西方。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写道：“现代生存环境中，不重视培养人才的民族必定衰亡，这是绝对规律。”1906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同样认为：“世界……刚刚开始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在于它拥有人才的多寡。”[注]奇怪的是，这些论述竟与若干世纪以前的中国儒家观点一致。芮玛丽告诉我们，同治中兴时期的保守政治家“确实着迷于‘人才’观念”。[注]

那么，区别何在？区别之一当然是使用人才的着眼点不同。左宗棠表达了儒家的观点：“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注]《中庸》更简明地表达了这种观念：“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注]因而，在前近代的中国社会，“才能”几乎只与统治能力有关，那种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而不见得能做好官的看法，被认为是明显矛盾的。

在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由于受教育者追求的事业目标极其广阔，因而，才能的概念也更加丰富多彩。可以肯定，怀特海和詹姆斯谈论“人才”的时候，他们并非只想到当好官的必要条件。因为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不同领域要求施展的才能也许完全不同。我们并不期望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与政界官员交换工作而能保持原有工作水平。

这就引发了前近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人才观的第二个主要区别。帝制时代的中国，人才就是掌握了儒学经典的理论原理和道德准则的人。他们认为，如各朝各代所揭示的那样，只要人们弄清了这些原理并学以致用，就能自然而然地应付从政生涯中的任何局面。例如，19世纪中期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将领都是没有专门军事知识的文官。人们总是明确地把这种“通才”看作一种典范。虽有财政、司法及其他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只能从工作中获得专门知识，并没有教授专门知识的学校。而且，这种专门知识从来就没有成为取得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公认途径。孔子“君子不器”的名言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与现代社会形成强烈的对照。现代社会特性的标志是复杂的经济生活、高度的社会化和空前的知识膨胀。这些使得专门化成为它的主要特征之一。确实，形势已发展到令人担心的地步，因而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过分专门化的危险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约翰·W.　加德纳（John W．Gardner）告诫人们："没有什么比严格的专门化和主张专门化的僵化观点对人才就业更为有害了。……如果工艺革新减少了对某种专长的需求，那么这些人只好失业。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一般培训，掌握一些基本原理，知道以后必须在不同领域应用这些原理，便可免受职业市场波动之苦。"[注]

这似乎又回到了中国的旧观点：人们最好接受基本原理培训。然而，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加德纳反对专门化的警告来源于对过分专业化的专才失业的担心。这当然与儒家为之操心的根据完全不同。另外，两种"基本原理"的内容显著不同，这是中西人才观的第三个区别。对儒家而言，这些原理实质上具有道德化特征。因而，才和德总是集于一身的。正如芮玛丽指出的："没有人敢说，品德高尚者未必称职，或者品德低劣者也许有奇才。"[注]

当然，现代社会也有其道德准则。人们希望（至少在某些方面）政府官员遵循这些准则。但很少有人认为道德和才能之间存在任何逻辑的或必然的联系。不管怎样，加德纳提到的基本原理明显与道德准则无关。看来他想要讲的是：最能适应现代社会变化莫测形势的，是那些至少在自己的专业既接受专门又接受综合培训的人才。

中西人才观的最后一个区别是在技术、制度、法律等非人因素中人的作用问题。如同别处一样，这里的对照也并非黑白分明。但其侧重点上仍有重要区别。在中国，确实一直有人认为法律和制度十分重要，却仍存在强调人为因素的强烈倾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本人。明末东林党人对政府腐败的反应是要求较好的统治者而不是新制度。两个半世纪以后同治中兴的领袖们同样如此。

技术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有关中国从不留心技术的看法无疑是一种现代海外奇谈。然而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中国的确将人看得比技术重要。同治中兴时期的著名箴言是"行军在人不在器"。[注]清朝后期，在西方的好战对手中间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中国胜于异邦者不在装备而在固其民心。[注]

虽然近代西方并不低估人才的重要性，但它一般强调——一个社会的有效运行需要适当的制度和法律条件。如果社会的某一领域发生故障，评论家可能呼唤新人。但他同样可能从全局诊断社会弊病，开出修改制度的药方。现代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同样复杂。其规律是：技术变得愈益复杂，从而对人们掌握现有技术和进行技术更新的技能要求也不断提高。该过程的另一面是，人力需求大量减少，机器取代人一直成为许多领域的趋势，结果产生了与中国传统取向正好相反的情形。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人才至少跟帝制时代的中国一样重要，但人才的价值实质、要求人才发挥的社会作用却根本不同。在前近代中国，人才具有职业限制、素质单一、高度道德化的特征，而且在任何场合下人才都被看作是比技术和制度更关键的因素。现代社会则几乎完全相反，人才没有职业限制、素质多样、非道德化。人们虽然认为人才对技术和制度的有效发挥是必不可少的，但很少认为它足以取代技术和制度。

现在我们可以估价王韬改革思想中人才的作用问题了。在与非人因素的关系上，王韬把人才放在什么位置上？他认为使用人才能达到什么目的？王韬谈论人才时，心中想到的是哪类人？是道德高尚者还是才智突出者？是专才还是通才？

终王韬一生，在任何可能的场合，他总是强调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人。有时他具体地说“人才”，有时只说“人”，但都是同一回事。1865年，他致书李鸿章说：“国家之有才，犹人身之有精神。”国家丧失人才，必至萎靡不振。[注] 1880年他写信给一位越南官员说，使越南免遭法国侵略的唯一办法是自强。同时，他又告诫，除非得人用人，自强政策仍不过是一纸空文。[注]王韬在另一处谈到，香港不久前还是孤悬海外的不毛之地，现在由于人力的结果，已日益繁荣起来。因而，一个地方繁荣与否惟赖人力，不受自然条件支配。[注]在1883年前写给当局的一封信中，王韬更简明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重器虽好，“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注]他后来在90年代说：国事全在乎得人，用人得当则良政兴，用人不当，一切受制于守旧之人，则虽有美意良方，仍将一事无成。[注]

以上及许多与此类似的论述，清楚地说明王韬把人的因素看得非常重要。毋庸置疑，王韬总是以其巧妙言词暗示：只有人——当然是适当

的人——才能解决一切困难。然而，我确信这不过是堂皇其辞。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韬越来越需要解释——为什么尽管中国大力仿行西法西器，却看来并无实效。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得到适当的人运用新法新器。这或许是对的。[注]这种认识与中国根本无须西法西器的保守论调根本不同。

王韬的人才观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另一区别在于，用人的目的不尽相同。这里，他的观点在前后有明显转变。在早年的言论中，他呼唤能臣干将是直接为了对付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风暴。只有改良政府才能恢复国内的秩序和稳定，而改良政府需要良好的官吏（见第二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王韬继续强调人才对于政府的重要性。但他关于政府职责的看法已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日益担心西方的威胁，他转而关注在列强挑战的局面中维护中国主权的问题。由于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王韬关于人才的社会价值观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才现在成为良好政府而且也是国家强盛的先决条件："国之强弱何由哉？为土地有大小欤？为士卒有多寡欤？抑为器械有利钝欤？蓄积有虚实欤？余以为皆非也！然则何由？人才之盛衰为之也。"[注]

这种论述强调国家的强力，而且并不为其相对主义而苦恼，故绝不会出自一个未受过近代社会触动的儒者之口。随之而来的是同样的后传统观念，这就是社会应该助长和奖励什么性质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王韬这方面的看法长期以来并无多大变化。一开始，他就坚决相信——人才首先应该实用，而政绩突出者是那些具有处理实际问题经验的人。[注]发生变化的只是问题本身的内容。平息农民起义、恢复正常生活的旧式挑战过去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只能以根本改革来应付新的挑战。然而，实现改革需要能洞明时变的人才。王韬说：

> 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萎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仍未能见其人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为靡费也，或以为多事也，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呜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道未得焉。[注]

王韬并未明确拒斥全能的人才观念。他太忙于抨击周围的无能现象了。但他经常表示知识必须实用，而实用的知识，无论如何都是指专门

的能力。注在19世纪80年代给当局的一封信中，王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用之必各当其才，而后才乃见。"注王韬也相信这样的自然推论：如需要完成专门的工作，就要求人们接受专门的培训。

考试征才

"如果按照一般说法，那么'贤士如锥处囊中'的古话最易受到反驳，人类社会大多数都被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压制人才。"注无须多说，王韬赞同这种看法。王韬内心无疑认为，中国人才极为丰富。但他同样认为，现行的选才制度根本不能发现、选拔和使用人才。因而，头等大事是健全改革科举制度。建立新的考试制度必然意味着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如同人才问题一样，批评科举制度是中国经受西方影响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但批评的锋芒则因时而易。19世纪40年代，当王韬自己仍卷入"科举生涯"注时，他的不满只是从前无数批评科举者弹旧了的老调。在他看来，令人窒息的八股文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压抑人才。人们皓首穷经仍不得功名，其结果，品学完美、骨鲠之臣不闻于朝。注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王韬对科举取士的批评，就像他对改革的主张一样，大大地具体化了。首先，他认为现行的标准太低。其严重后果是过多的人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士林声望低落，政府资助士子的能力减小。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减少取士名额，延长考试间隔时间。其次，王韬认为考试科目狭窄无用，妨害了开科取士。所以，许多其他方面的贤才落选了，一些几乎没有行政才能的人却得以高中。他认为，这个缺点可以通过增加考试科目来克服，在通常的经籍史义之外，增加策论时务、舆地天文、格致历算、兵刑钱谷等科。他也强调汉代荐举制度作为选才的辅助方式十分有用。注

另一方面，王韬又坚决反对过分依赖荐举。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江苏，因太平天国起义而长期未实行科举考试，荐举遂成为普遍的选才方式。结果，只有著名人士被列入征集名单，许多有才能的人被忽略了。王韬在给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信中，主张分八科考试取士。每科考察不同的能力，选拔各科优秀者担任适合其专长的职务。这些科目包括刑

名钱谷、舆地用兵、历算格致、机器制作、西方各国国情和语言等。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王韬比以前更相信——中国士子需要学习西方，他对这方面的明显缺陷就更加不满，言词也更加直率：

> 泰西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无足深怪。独不解其于中国之事，如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何则？时文累之也。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
>
>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1—22页

在一个素来崇古、强调经世必需博古的社会中，上述言论是一种激烈之辞。王韬关于科举改革的基本主张同样是激烈的。这表现在80年代的一篇《申报》社论——《救时刍议》中。王韬设想了一种中学西学并重的考试制度，要求惟兼通者方能得中。他主张，中学合四书五经为六经，以《易经》为首，西学以几何学为首，其次则化学、物理、天文、地理、兵学、动植物学、公法学等等。王韬知道并非每人都能掌握所有学科，因而建议：凡能通两经（《易经》及其他一经）和西学两科（几何和另外一科）且概要了解儒经和西学的士子，便可授予官职。王韬还提出荐举只通晓某一科的人，以补考试之不足。这样，就不会遗弃任何有用之才。

为说明他的主张，王韬远远地超出了当时仍流行的“体用”模式，达到了相当新颖的境界：

> 六经载道，穷经所以行道。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绩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原。改科举而增入西学，擅两家之长，挹全地之精。中国地方万里，才智之士数十万，五六十年而后，西学既精，天下其宗中国乎。然此非一时所能断而行之，必由之以渐乎！

王韬的改革主张中最引人注目、最根本之处，在于他强调西学应成为常规考试内容的一部分：

> 西学即开别科，缙绅家父兄子弟每误为外洋之奇技淫巧，与六经之旨异而不敢尝。而敢尝者又多读书不就无赖之人。其弊或至以西学诋六经，而转为学六经者之所笑。其能望天下真才之迭出哉？[注]

王韬在此表现出，他紧紧抓住了激励的问题[注]，看出了被忽略了的阻碍晚清的被如此关注的改革活动的因素。在中国这种通向权势的道路已有狭隘限定的社会中，只要晋身之途尚无强制性，那么确立另外的途径势必就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实施良好的社会方案就需要一种强制因素。

学校生才

一如既往，科举考试在19世纪仍支配着中国的教学内容。因而不难设想，随着批评科举而来的是对学校的同样不满。虽然王韬熟悉英、法教育制度，[注]但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批评中国教育的主要根据却是以中国古代学校制度为例。这样，他短暂地回到了退化史观，从而轻而易举地使古代传统（理想化的东西）为当前的改革服务。

在王韬看来，中国学校虽多，而风俗不正；学生虽多，而才俊不出。这样的学校有什么用处？只能用来粉饰太平而已。王韬指出现行学校建置的五个缺陷，而这些都是不及古代之处。第一，当今学校太重书本学习，不重实行；太重义理，不重实际。学者则善于高谈性命之说，演说仁义道德，致力于分析毫芒末节。但如问及赋税财政等事，则不仅茫无所知，而且并不以不知为耻。

王韬批评的第二、第三点与第一点密切相关，他指出当今学校与政事缺乏联系。古代政治与教育起于一源。无所谓“掌教之官”，官吏都是教师。然而后来，儒与吏逐渐分开。不知政务的儒者掌管学校，教学内容日益脱离政事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天下的人都到学校读书，也不会提高中国的治国水平。

第四，王韬批评与上述相似的文武官员分离的现象。古代官吏都当能文能武，但现在武人不知礼仪、文雅，而文人拒绝了解武事。终于，

其直接后果是中国军队士气愈益颓靡。

第五，王韬抨击学校的教育内容宽泛肤浅。古时候，学者专执某一政事或专通某一经典，因而他们对所学专业了解很深。现在却要求人们学习群经，而做官则要不了几年就更换职务。王韬认为，这种制度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培养全才，但结果却只得到了无能之辈："今日典礼而明日典刑，虽伯夷皋陶胡能底其绩？今日治诗而明日治书，虽伏生申公不能通其义。"注

王韬认为教育首先应该与政事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而在19世纪晚期，此中的最大需要之一就是掌握西学。因而王韬自然主张在学校设置西学课程。他在一篇宣传改革的论文中指出，学校的常规课程应包括两部分：其一叫文学，即经书、历史、掌故、辞章之学；其二叫艺学，包括地理、格致、天文、数学和律例等。注在别的地方，王韬还提出——由国家在各省、府、区设立学校，将已成虚设的书院改为新式学校。注

为现代化的教育

如同人们经常指出的，社会着眼于教育事业可能出于极不相同的原因注：可能是培养良好的公民或忠诚、驯服的臣民；可能是训练人们以适应现代化的各种技能需要；在某些社会，教育成为使个人得到更大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社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结成更具凝聚力的民族；还有一些社会，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是提供社会的领导人员，例如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这要依情况的需要而定。

在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教育与科举密切相关。人们上学是希望中举做官。既然事实上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进入官场，那么，就个人而言，努力学习当具有其他意图。确实如此，即使上学并未得到科举功名，一般总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益处，而且几乎总是意味着提高本人在地方上的声望。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视父荫子业的社会，那么这也意味着提高其家庭声望。另一方面，如果科举成功，在清代则意味着他（同时也包括其家庭）自动进入士绅阶层。而士绅除了享有社会特权和法律豁免之外，还能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就中国政府而言，教育的目的则有所不同。它也主要着眼于造就领导阶层，包括正式领导（官员）和非正式领导（士绅）。但它这么做的

动机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王朝安全。因而，国家给予士绅的特权和法律豁免并非赠予之物，其中一半是契约关系，另一半概括地说则是士绅维护当地秩序的义务。

这无疑是对中国帝制晚期教育的一幅极简略的素描。无论什么时候，总会间或有一些个人或皇帝出于纯粹的学术原因重视教育。从新儒家的伦理哲学来看，教育是个人自我完善的必要前提。然而，总的看来，上面的描述仍然成立。不管皇帝的个人偏好如何，从国家主要视点来看，教育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提供最能保证王朝延续的政治和社会领导者。

王韬的教育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与上述素描一致？他认为教育只为官吏和士绅呢，还是也为其他阶级服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像往常那样基本上用以维持王朝的存续吗？或是应该适应变革，以新知识武装人们，从而应付新的局面？

对最后这一对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回答。王韬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人省悟世界发生的巨大变革，认识中国现存制度的落后过时，从而行动起来适应这些变革。与此观点相吻合，王韬极力嘲讽官场中遇事冷漠、拖沓懒散，办事因循守旧的普遍习气。他认为只能以变应变，在教育领域更是如此。王韬所使用的语言中没有“现代化”一词，但从其教改主张的实质看，他的目标显然只能是现代化的中国。

现代化根本不是前近代中国的教育目的。这在教育对象问题上对王韬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有时看来很小。确实，王韬认为现代化进程应由政府发动和领导，而且他的教育改革思想经常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良好训练的、更现代的官僚阶层。

同时，根据王韬人无弃才的总观点，他的言论常常表现了支持扩大教育面的主张。例如，他在陆海军现代化方案中，提倡建立武备院以培养优良的将领，设立水师院以训练海军指挥、驾驶人员。两者的教育内容完全符合现代特征。注

最有创新特色的是，王韬建议（最先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国家在各通商口岸创设面向民众的技术学校，主要用于促进工程制造。这些学校将专授技艺学科，着重科学和工程学。学校的最新科技期刊以及书籍、舆地图表、仪器等等一应俱全。学校聘请西方专家为教员，并逐

步伺机以华人代替之。入学者将有生活补贴，优秀学生给予奖赏。毕业后按每个学生专长分配工作。王韬又说，如果学生聪敏突出，发明可资国家实用的器物，那么他应得到重赏并获一定年限的专利。[注]

有一点王韬是很坚定的，即他认为这类学校必须由政府出资设立。90年代初，当他注意到重庆道台创办洋务学堂以造福当地时，他对这位官员的举动极表赞扬。但他对学堂全由道台私款创办十分惋惜。他最后问到：谁能保证下任重庆道台会同样高尚开明？学校资金由海关余款或其他公款提供不是好得多吗？[注]

王韬从未正式提出所有人都可享受公费教育，但开展平民教育的想法明显地吸引了他。19世纪70年代初，容闳在家乡（广州附近）创设义学时，王韬对此表示了极大热情。他评论到，这种学校是促使乡民诚实守法的最可靠保证。同时，它把教育普及到一般官学所不及的社会角落，从而保证了最大可能地发现乡野人才。[注]

王韬普及知识的信念以某种方式再次表现在对建立香港第一个公共中文图书馆的反应中。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即有义学制度，而公共图书馆却未曾有过。王韬认为，公共图书馆比中国惯常的私人藏书好得多。其一是私人藏书的收集、维持费用依靠一人，难以使藏书维持一两代。公共图书馆则是公众事业，因而更具持久性。另外，私人藏书只有益于少数几人，怎能与造福众人的公共图书馆相比呢？王韬以自身阅历说明：欧洲的大图书馆书籍连屋充栋，阅览室总是座无虚席。这就是那里学术繁荣的原因之一。[注]

在重要的女子教育问题上，王韬也从西方受到启发。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看到西方国家极为重视女子教育，并为此设立专门学校。他认为中国应该同样如此，而且教育应该实实在在。“夫女不读书，教之何益？读书不读六经，读书何益？”这里王韬提到古人的感叹——人才难得，女才更难得。他激励同胞说：“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注]

在这些言论中，人们有可能忽略一个重要内容。贯穿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实际上是其全部改革思想——的是他没有明说的看法：要进行重要变革则需要全面修整社会制度机制。现行制度机制本身没有任何革命性，而中国历史却充满这种革命性。必须自觉地把新制度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这是有待解决的紧迫课题。一些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如东周的

李斯以及王莽、王安石都一概被指责为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在19世纪的中国仍是不光彩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因为实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就意味着现状存在严重缺陷。每当社会面临挑战的时候，恰恰大多数儒家不愿承认社会的严重缺陷。

我们在本节一开始强调过王韬对人的看重。但结果王韬的重心却明显地转向了制度。然而，实际变化并不能以这种判然两分的关系来概括。王韬之变法意识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其求才主张的萎缩。恰恰相反，教育领域进行制度变革的全部目的，正在于使中国在选拔人才方面更具有合理性。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的实质。在前现代化中国，人们倾向于在两者或者说人与制度关系中选择孰重孰轻。而王韬则认为两者互相依靠、互相需要。这是一种细微的变化，但却是提出更先进的改革主张前所必经的关键变化。

推介西学

我说过，由于王韬没有实行改革主张的权力，所以他只是一个改革的鼓吹者。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准确的，然而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王韬的报业活动（见第三章），再就是他对西学的大力推介。后者包括他撰文实际传播西方知识，以及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事务。

传播西方科学

我们既已考察了王韬有关西方历史的主要论著（见第五章），这里就只论及他的科学著作。王韬被现代科学强烈吸引，并对其中某些学科十分了解，故能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写了一些科学家的传略[注]，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赫瑟尔（John F．W．Herschel）、玛丽·萨莫维耳（Mary Somerville）。他简介了西方应用科学中的一些奇闻逸事，如照他看来比中国先进得多的牙科、金刚石的性能、雪花的形成和西方飞行器实验（他称之为天船，并预言将来会用于军事目的）。[注]王韬还发表了许多科普论文。

科普文章中只有《西学图说》是全部由王韬自己创作的。其他均为合著，由王韬把西方同伴的口述写成满意的中文。这类著作包括50年代与艾约瑟合撰的《格致新学提纲》。他还与艾约瑟合写了《光学图

说》。此外还有50年代与伟烈亚力合写的《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与艾约瑟合写的著作从未出版。[注]而与伟烈亚力的合著及王韬独撰的《西学图说》均在1889年至1890年出版了。

在《西学图说》中，王韬的论题包括太阳说、赤道说、行星环绕太阳说、星气说、岁差说、空气说、声学说和光动说等。他的论述配以插图，基本上简明易懂、准确无误。我们可以摘录有关行星运动的一节作为代表，这里阐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

> 太阳者，诸行星之心也。曷谓诸行星之心？太阳居中不动，其外辰星绕之，又其外太白绕之，又其外地球绕之，又其外荧惑绕之……又其外岁星绕之，又其外……故曰太阳为诸行星之心。地球亦绕太阳乎？曰：然。然则太阳……每日东出西没者何也？曰：此地球本体之动也。地球有绕日之动，有本体旋转之动。绕日之动所以成寒暑，本体旋转之动所以成昼夜……诸行星有本体之动乎？曰：有。西国以远镜测诸行星，见其有高低形迹，因得见其有转动也。[注]

与王韬介绍西方科学的实际行动同样重要的无疑是他从事这种工作的精神。在与伟烈亚力合写《西国天学源流》的长篇附言中，王韬针对当时有关西学的各种陈词滥调逐一进行驳斥。他从叙述伟烈亚力该书的写作由来开始：

> 余少时好天文家言，而于占望休咎之说颇不甚信，谓此乃谶纬术数之学耳。弱冠游沪上，得识西士伟烈亚力。雠校余闲，辄以西事相咨询，始得窥天学之绪余。适李君壬叔（李善兰），自携李来互相切磋。一日，询以西国畴人家古今来凡有若干。伟烈亚力乃出示一书，口讲指画，余即命笔志之。阅十日而毕事，于是《西国天学源流》黎然以明，以为之大快。案头适有阮文达公（阮元）《畴人传》[注]，据以考之，得列姓名其间者不过七人。……阮氏《畴人传》……略大识小，语焉不详……不知泰西天学实始于希腊。约当在春秋初年，有杰出者曰他勒，已知地为球体……又预推日食之先期……三千余年前其测天之精已如此。后之继起者知所师承宜其进而益上也。盖法积久而益密，历以改而始精，故今之谈天者殊胜于古中国……
>
> 或又曰：西人测天之学固精，然安知非先有于中国而后流传至

彼耶？我中国自虞廷分职，命羲和钦若昊天。当时已能测日月周天之度，以奇零置闰。而西国尚未有历也。即如借根方之为“东来法”亦可证已！呜呼！此何异攘人之美据为己有也！西国历法虽始于周末，而递加更改，历代以还，岂无可考？其转精于中国者由用心密而测器审也。其云“东来法”者，乃欧洲之东天方国耳，非指中国言之也。

或又曰：西历固无可议，其制造机捩器物，资水火二气之力，事半功倍，诚为精密不苟。然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西人亦只工其下焉者已耳！至其言教之书，迂诞支离，显悖名教。天堂地狱之说，徒拾释氏之唾余；爱人如己之论，亦窃墨子之近似。言其平淡不及儒之纯，言其幽奥不及佛之奇。固无一而可者也。

不知西儒何尝不讲性理哉？上帝作之君作之师，因地而生，各异其俗。列国之制，虽有攸殊，此心之理无不相同。所谓“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虽东西之异辙，实一道而同风。此其故《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注)呜呼！至矣！若夫历学则其小焉者也。

《西国天学源流》，第27—29页

王韬没有放弃儒学大同的空想——无疑在许多中国士子看来，《中庸》赞颂的完美圣人不是别人，正是孔子。在这篇评论中，王韬显然确立了他的世界主义信念。到1889年王韬写作这番评论时，中国知识界许多人已接受实用的现代科学很久了。但随着科学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断提高，非西化的需要也相应增长了。因为，如果仅仅从科学的实用来说，则不存在西方的或是中国的问题，而一旦开始把科学看作基础，则源流问题就产生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19世纪晚期的许多西化人物，包括冯桂芬、薛福成、陈炽、梁启超和康有为，都从西学中源的巧妙理论中寻找庇护。按照西学中源说，西学其实根本不是“西方的”。这种思想方法具有在政治上击败对手的作用。它具有这样一种心理效果：能使中国人在汲取“西学”时并无丝毫文化自卑和民族羞耻感。最后，它通过倡导古代文化的复兴，来适应人们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偏好。

据全汉升说，当时经常用以说明西学中源说的两个证据，是中国远古的代数学（人们认为这从西方人“东来法”的命名反映出来）和《墨子》（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某些内容。《墨子》中包含的科技知识引起了人们讨论。[注]

王韬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否定了它的完整性。他指出了阮元著作的肤浅和不当之处。他大胆驳斥了西方代数源于中国的论调；他把泰勒斯（Thales，其全盛期早于墨子200年）与西方天文学联系起来，从而也否定了有关《墨子》的说法——至少包含了这种意思。最重要的是，按照并非一切源于中国的逻辑，王韬否定了认为历史上只有中国文化才真正重“道”的偏见。《中庸》一书的全部论点是——“道”属于全人类。圣贤是东西方各民族都能孕育的普遍品质。事实上，正是各民族天生的这种能力给人类事业以基本的统一性。

上海格致书院

流亡香港20多年后，1884年春，王韬在上海定居下来。虽然王韬已到了55岁这种容易被怀疑患病的年龄，但他看起来显得很健康，继续完成满满的活动日程。他偶尔游览苏州、杭州。1888—1889年冬天，他受山东巡抚张曜之邀，第一次游历了华北。据一位作者说，王韬的华北之行部分地是为了离开令他恼怒的妻子。王韬的酒色癖好即使上了年纪也没有改变。为阻止他光顾青楼，妻子经常派一位老仆随他晚上外出。一过晚上10点钟，这位老仆就尽职地对王韬耳语，催促主人回家。[注]从山东回来后，王韬建立了弢园书局，这是重建1886年因经费不足而放弃的项目。[注]整个80年代，他经常为《申报》撰稿，该报当时仍由钱徵主编。在上海，王韬重新与外国人交往，其中著名的有伟烈亚力和傅兰雅。

傅兰雅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在中国大力传播西方科技知识。1886年，他聘王韬为上海格致书院（有时称中国格致书院）掌院。王韬的经历和才干完全适合该项职务，又能得到额外的薪水，因而王韬接受了聘请。格致书院于1876年由中西人士合作创立。毕乃德（Biggestaff）形容它“虽不很成功却十分有趣，是善意的外国人和进步的中国人在中国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艰难尝试”。[注]开始，它的活动限于提供西方科技读物，以及举办西方制造器物的模型、样品展览。经费困难和读者寥寥促使书院在1885年重组理事会，扩大活动范围。当年开始招生，讲授初级

的英语、数学、地理和其他基础学科。1886年，开始举办“中国有奖征文竞赛”，其目的在于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各种西方知识，以便应用于中国”。后来还举办过系列讲座。

据说，格致书院最成功的事业是有奖征文竞赛。这项主张是傅兰雅提出的。他在1896年离华之前一直是格致书院的监督。而操办竞赛的是王韬。竞赛办法是，每一季度邀请著名官员拟出适当题目，评选提交的文章，并且至少附赠部分奖金。然后授头等奖3名和次等奖10名。获奖名单在中文报刊公布，报纸也登载获奖文章。从1886—1893年，每年年底都把当年的12篇头奖文章以及评奖官员的评语一起印成书出售。

在头4年，每次的参赛者约在26—81人之间，成员大多是江苏及毗邻省份的文人学士。李鸿章、郑观应及其他官员出过一些类似这样的题目：“目前中国图谋富强时应视何者为重？”“比较中国古代科学著作和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斯宾塞的著作”“在不公正的市场惯例下，中国茶叶如何在世界与印度茶叶竞争？”“110年来，欧洲多数国家已建立了上下议院……这种制度颇似古代禅让理想……现有人抱怨‘当政者远离平民，因而下情不达’，持此论者常常提出中国创设议院，以密切君民关系……”

《北华捷报》的社论指出，一些获奖文章“具有极高水平”，并称赞这项活动，一般来说是“格致书院在中国启蒙的最有力工具”。这项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王韬。如果没有王韬广泛的官场联系，能否激发那些大员对此事的兴趣便很成问题。除负责联络官员的全部事务之外，王韬还参与评选参赛文章，编辑获奖文章，为每卷作序，直到它顺利出版。由于王韬的贡献，他得到了格致书院理事会“最热情的感谢"。1897年，傅兰雅在简洁生动的纪念文章中写道：“由于王韬先生的病逝，有奖征文竞赛不如从前那么富有生气了。”王韬对格致书院的贡献不限于举办征文竞赛。他帮助招揽学生、从有关官员（例如盛宣怀）那里募集资金、聘请教员，并担任监督委员会的职务。王韬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教育和尽忠报国。他希望通过格致书院的活动来培养大量科技人才，以备将来国家之用。

格致书院的实效如何？鉴于当时中国培养技术人才的普遍水平，有人认为应承认它获得了一定成功。总理衙门注意到上海格致书院培训了国家半数以上的数学人才，并在1887年5月18日的著名奏折中主张修改

国家考试制度，让应试者考数学。注然而，总理衙门没有提到书院学生人数很少而且教学课程的水平尚属初等。无疑，就中国的需要而言，不能不说格致书院的贡献是杯水车薪。格致书院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中国人赏识现代科学的效用和重要性。即使是在这一方面，看来格致书院的影响仍具有地方性和短暂性。书院影响所及的多数人属于上海附近地区。而且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产生了激发中国人科学兴趣的其他更有影响力的团体。

本章在前边已经讨论过，在王韬有关教育改革的主张中，他似乎暗示过：采纳现代科学和数学的问题既是思想问题同样也是社会问题。只要西方科学仍然不是常规教育的课程，不能成为中国学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不被用于社会，那么，多办格致书院也不会有效地改变现状。但是，在另一方面，一旦科学、数学成为规定的教育内容，则任何格致书院都没有必要了。不管怎样，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这种规模狭小、私人合办的书院是注定要遭受挫折的。它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是——为自身的替代者开辟道路，无论收获多么微弱。

---

1. 有关世纪之交近代舆论的出现，见入江昭，《晚清的舆论与对外政策》，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探索》，第216—238页；芮玛丽，“导言：变革的浪潮”，见芮玛丽，《中国的革命：第一阶段，1900—1913》，第30—32页。
2. 当然，士大夫仍然是以阻挠变革而不是以能够推动或倾向变革更为著名。士大夫经常以“清议”表达其阻止变革的倾向。见柯文，《清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850—1900》，第49—52页；易劳逸，《君主与官僚》，第16—29页。
3. 均引自约翰·W·加德纳，《杰出：我们能既平等又杰出吗？》，纽约，1962年，第33—34页。
4.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68页。
5. 转引自《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68页。
6. 转引自《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68页。
7. 《杰出：我们能既平等又杰出吗？》，第43页。
8.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68页。
9.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68—69页。
10.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5—16页。
11. 《弢园尺牍》，卷7，第5页。
12. 同上，卷11，第21页。
13.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24—25页。
14. 同上，卷10，第21页。
15. 《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载《万国公报》第59期（1893年12月），第5页。

又见王韬，《救时刍议》（上），载《万国公报》第43期（1892年8月），第12—13页；又见王韬，《论宜得人以理财》，载《万国公报》第46期（1892年11月），第7—9页。

16. 例如，见《论宜得人以理财》，第7页；王韬对中日战争中国失败的解释，见他为《格致书院课艺》（1893年）写的序言（约写于1895年），第1页。

17. 《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才论》，见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台北，1965年），第二册，卷39；又见郑观应，《盛世危言》（上海书局，1896年），卷1，第3页。虽然该文未注明年代，我估计它写于1885—1892年间。王韬也在下列文章中提出了人才与国家富强的联系：《弢园尺牍续钞》，卷2，第9页，卷3，第2—6页；《论宜得人以理财》，第7—9页；《格致书院课艺》（1887年）序言（1888年10月5日作），第1页。

18. 例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7页。

19.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0—11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4—6页，卷8，第28—29页；《论宜得人以理财》，第7—9页。

20. 例如，《论宜得人以理财》，第7—9页；《论出使须求真才》，载《万国公报》第58期（1893年11月），第5—6页。

21. 《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7页。

22. 《杰出：我们能既平等又杰出吗？》，第3页。

23. 这个词用于张仲礼，《中国绅士在19世纪中国社会的作用研究》一书（西雅图，1955年），第166、197—202页。

24. 《与杨引传书》（约1848年），《弢园尺牍》，卷1，第18—20页；见本书第一章。

25. 《弢园文录外编》，卷12，第24—25页；见本书第二章。

26. 《弢园尺牍》，卷7，第6页。

27. 重刊于《万国公报》第43期（1892年8月），第12—13页。王韬的主张比清政府1887年的改革激进得多。这种改革为数学专门人才设立单独考试。这种专才（只取定额之外的3人）也必须参加常规考试。与王韬主张不同的是，那些参加常规考试者则不必考数学。

28. 关于这一点，又见王韬1892年5月为《格致书院课艺》（1890年）写的序言，第1页。

29. 例如，见王韬，《法国志略》，卷17，第8—13页。

30. 《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才论》，第39—41页。伯夷是舜帝时的典礼之臣。皋陶是舜帝的另一位著名大臣，据说他首创刑法。伏生是《书经》的研究者，相传他从秦朝焚书（前213年）的大灾难中挽救了该书。生活于同时代的申公则是研究《诗经》的著名学者。

31.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8—9页。

32. 同上，卷2，第4—5页。又见王韬1888年10月5日为《格致书院课艺》（1887年）写的序言，第1页。

33. 例如，加德纳书中随处可见；又见C. 阿诺德·安德森，《教育的现代化》，载韦纳书，第68—80页；弗兰克书，第69—70页；罗纳德·多尔，《日本德川时期的教育》（伯克利，1965年），第33—67页。

34.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3页，卷2，第7—8、18页，卷3，第12—14页；《甕牖余谈》，卷3，第3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1页，卷5，第13页。

35. 《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第2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2页。

36. 《论川东设立洋务学塾》，载《万国公报》第47期（1892年12月），第9—11页。

37. 《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7页。

38. 同上，卷8，第5—7页。

39. 《救时刍议》（上）（从《申报》重印）。王韬对中国妇女受压迫问题的敏感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在早期《原人》一文中，他批评纳妾，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认为这是社会和谐和良好秩序的唯一基础。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3—5页。王韬也为1888年版的《镜花缘》作序。这是19世纪早期的一部著名小说。它讽刺男女之间的不同规范，批评忽视女子教育，抨击缠足、纳妾的罪恶。见恒慕义编，《清季名人录》第1册，第473页。王韬主张女子教育受到林乐知的称赞，见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1890年），第264页（林乐知把王韬说成黄韬）。

40. 《甕牖余谈》，卷2，第6、7—8、9—10页。

41. 同上，卷5，第6、1、2—5页。

42. 王韬在《弢园著述总目》中简介了它们的内容，见该书第7—8页。

43. 《西学图说》，见王韬，《西学辑存六种》第一，第2—3页。

44. 初版于1799年，共46卷。阮元（1764—1849）高度重视该书。它包括280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及著作概要，其中欧洲的37位。见恒慕义编，《清季名人录》第1册，第402页。

45. 该处《中庸》英文译文，引自陈荣捷编译的《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1963年），第112页。

46. 全汉升文，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16—217页。

47. 洪深文，第1043—1044页；又见麦卡尔雅书，第27页。

48. 《弢园尺牍续钞》，卷5，第7、8、9页。

49. 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输入西方科技的尝试》，载《太平洋历史评论》25卷第2期（1956年5月），第127页。

50. 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输入西方科技的尝试》，载《太平洋历史评论》25卷第2期（1956年5月），第141页。又见阿德里安·阿瑟·贝内特，《傅兰雅译著考略》（剑桥，马萨诸塞，1967年），第3章。

51. 毕乃德文，第141—142页；贝内特书，第56—57页；《北华捷报》（1892年5月27日），第701页；《北华捷报》（1894年3月22日），第435—436页；又例如，王韬1892年12月为《格致书院课艺》（1891）所写序言，第1页；又《格致书院课艺》（1893）序言（约写于1895年），第1页。

52. 《北华捷报》（1892年5月27日），第701页；《北华捷报》（1893年4月14日），第513—514页。

53. 《北华捷报》（1889年7月20日），第85页；贝内特书，第57页。每年一卷的资料以“格致书院课艺”为名出版，全套资料可在傅兰雅的伯克利藏书中看到。《北华捷报》的一篇评论这样描写了第3卷序言：“王韬作为一位新信仰的鼓吹者在为人们写作时，决不会相信对这些学说和展品的热情不是对永远神圣的圣人学说的一种嘲笑，他发现人才‘不限于天下之一隅’。”见《北华捷报》（1889年11月1日），第536页。

54. 《北华捷报》（1889年7月20日），第85页；《北华捷报》（1897年7月16日），第128页；又见毕乃德文，第143页。

55. 《致邵友濂书》（约1886年）、《致盛宣怀书》（约1887年），见《弢园尺牍续钞》，卷5，第3、10、13—14页；《北华捷报》（1890年8月15日），第196页。据毕乃德说（第134页），格致书院最著名的资助人是李鸿章、沈葆桢和冯焌光。

56. 毕乃德文，第149页。

第七章 经济改革

20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几乎完全是耕作型（或者说农业型）的注，因而，看来也许奇怪，王韬的经济思想几乎全部专注于非农业的事情：交通运输、开采矿藏、机器制造，尤其是商业贸易。当今中国史学家的解释是：王韬（及其他早期改革者）属于地主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历史作用是代表上升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注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没有说明任何问题。

否定阶级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当然不是完全否定阶级利益的影响。问题是如何更准确地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一点例如：王韬在香港和上海参与的报业都是（关注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这些报刊的读者大多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因此，不仅大量刊登商业新闻的做法，而且采取宣传商界利益的编辑方针，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说法完全言之成理。但它最终告诉我们的是：也许王韬的志趣在于发展商业、推进经济现代化。但它不能说明他这么做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薛福成、马建忠以及许多与商界只有间接关系的改革者所提出的经济现代化主张，与王韬、郑观应等直接参与商业活动者的主张基本一致。这似乎说明，除直接的阶级利益外，其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在王韬那里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王韬主张全面变革，其中也意味着发展非农业经济。第二，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农业型的，但在部分地区，也是王韬成年时期最熟悉的地区，却并非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和上海已成为繁华的现代都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很自然，王韬将以这些近代经济作为出发点。第三，最重要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王韬改革思想中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增进中国富强。既然这样，强调机器制造和海外贸易的益处，就是最合情理的了。因为正是在这些领域而不是在农业方面，世界强国（英、法）与中国经济迥然不同。王韬认识到，发展工商业也将有利于中国商人——他以此作为附加论据。但主要根据是发展工商业将适应中国的需要。

把注重国家富强概括为“富国强兵”是法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它与一般儒家强调的政府俭朴、人民康乐明显不同。然而，也有一种较少正统特征的儒家政治经济学认为，寻求富强完全符合儒学的终极价值。 19世纪70—80年代，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这种逻辑。当时，儒家文化遭到西方的猛烈冲击，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如果从过去的历史中复活中国固有的价值，中国就会非常强盛。

王韬全面赞同富强的目标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1859年，当以发展外贸、采纳西方技术来增进中国富强的观点正遭受非难的时候，王韬似乎认为，富强本身就是理想的目标。王韬的信念不久就更为明确了。1865年他致信李鸿章，认为驭外之法有两条，即握利权、树国威。他指出，后者随前者的成就而定；经济力量是国家强大的必然之道。当时，在非难者看来，谈论富强之道就会“管商之风炽，孔孟之道绌”。王韬干脆答曰，只有先修兵甲而后古老的儒家道德才能重新繁盛。

王韬关于富强的思考并不系统，但仍有某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之一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已经显示出来，即中国之强首先有赖于中国之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韬日益大谈属于今天称之为“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他尤其被英国的事例所强烈吸引。它只是小小岛国，而富强甲天下。王韬有时认为英国的富强主要在于煤铁储藏丰富，但他更经常地认为英国的商业贸易是决定因素。总之，重要的是王韬看到了西方经济力量的许多特征。他看到开矿、制造、贸易、币制、银行、交通、运输都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要发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就应注意所有这些方面。

王韬经济改革主张中增进国家利益的这一主要思想，必然导致十分强调经济变革的图强意义。然而，不能认为王韬因此就忽视经济变革的私人利益。王韬不再被过去凝固的经济思想束缚。那种思想认为，增加国家的财富自然需要减少人民的财富。王韬明白发展经济可使国家和人民共同富裕。

交通运输

在王韬的改革主张中，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对中国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关注。今天，人们很难体会19世纪汽船、铁路和电报出现时人们的激动情绪。对现代西方人而言，他们热衷于征服世界和未来，这些新奇发明的高速度和巨大潜力都令人振奋。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发明预示着一个不是扩大而是缩小的世界，一个更令人畏惧而不是令人高兴的未来。显示王韬之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是，他像当时的西方人一样，对交通领域中的最新革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很早就看到了交通革命中包含了全球趋同的技术基础。

轮船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不太显得突然的一例（它只是在人们熟悉的运输工具上装备新的动力）。这或许是中国人采纳它时抵制情绪较小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他原因也容易发现）。曾国藩早在1861年就极力主张建造轮船。而王韬即使在最反感西方的时期也主张中国用轮船于海防。而且，他之所以反对轮船用于内河，不是出于害怕或者盲目敌视，而是出于显然实际的考虑——中国内河港口狭窄，不能容纳轮船。这是在1859年。不久，王韬有关使用轮船的见解大大拓宽了。他继续强调军事用途，主张中国的传统船舰全由轮船代替，并设立专用于轮船驾驶的特殊军事考试。

然而，其他主题开始凸显出来。一个带有初期国家主义含意的主题是自信。在很早的时候，王韬就极力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轮船，不要依靠从外国购买。其中部分原因完全是经济上的。但王韬也注意到，西方造船技术在不断发展，产品更新极为迅速。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存在从西方购买过时产品的危险。只有中国自己建造现代船舶，才能保证赶上最新的技术发展。类似的担心也表现在他批评依靠西人建造、驾驶船舶的做法上。这种做法不仅费用更大（西方人的薪金比中国人高得多），而且十分危险。如果中国与外国发生战争，西方驾驶员、工程技术人员可能会决定逃跑，置中国于不顾。所以，即使需要派技术人员到国外培训，中国也当尽快培养自己的人才。

王韬的早期国家主义也明显地体现在——他反对外国轮船在中国内河航行。长江轮船航运始于19世纪60年代，前10年全由美国人建立的上海旗昌轮船公司垄断。即使在1872年中国官办的轮船招商局建立以后，外国轮船仍占有长江贸易的相当大的份额，而且这种份额在与日俱增而不是逐渐减少。面对这种形势，王韬在19世纪70年代致信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唐廷枢），敦促扩展中国的内河轮船航运。王韬提醒唐景

星，外国船舶在中国内河航运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种事在西方国家是绝不会容忍的。他呼吁培训大量的本国驾驶人员，从而使中国最终能完全控制内河轮船航运业。[注]

从每年由江浙到北京的漕运上，王韬看到了发展中国轮船航运的另一机会。许多世纪以来，漕运主要经大运河转运北方。然而，在19世纪中叶的混乱时期，河运体系已不起作用了，若干年来只得用河船从海路运粮。随着19世纪60年代后期华东一带秩序的恢复，许多中国官员（包括曾国藩）主张重建河运体系。这里牵涉到了他们巨大的既得利益。尽管论者提出海运危险重重，但事实上，如果河运长久废弃，许多人将失去大量发财的机会。

王韬认为，这种论调说得好听点儿是目光短浅，说得难听点儿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认为，在旧的体制下，维持运河和修缮粮船的花费将成为单纯损耗。相反，若改由海轮运粮，虽开始时费用较大，但最终可收回成本，甚至可以营利。而且它有河运体系缺少的军事和商业收益。王韬建议，可以给每艘粮船配备一定数量的兵士来解决护粮问题。漕运完成后，有些轮船可作巡洋之用，以加强中国海上防卫，同时也可对现代海军进行亟须的训练。未用于巡洋的其他船只，则可以租给私营公司，用于商业航运。所有租赁收入都汇集到总局严格核算。除各项应支费用外，所剩经费可用于修葺船只和加造新船。这样，国家将会富裕起来，而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注]

王韬论述轮船航运的最后一点是，他主张允许民间设立轮船公司来从事内河航运。[注]轮船航运不仅安全迅速，而且利润丰厚。王韬对垄断经营忧心忡忡——它一方面是外国私营公司的垄断，另一方面则由依靠中国政府的招商局控制。还不清楚王韬的主要动机到底是抵制官方而促进私人营利呢，还是抵制外人营利而促进整个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这两个主题当然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两者在他的思想中都被看重。

与轮船不同，铁路在19世纪的中国遇到了巨大抵制。迟至1880年，整个中国没有一寸铁路。15年后，全部铁路也不到480公里。铁路遭受抵制的原因很多：修筑、维修铁路费用很高；普遍担心（西方也曾经这样）铁路会导致人们失业；有关土地使用和恰当路线的平常问题都因中国人口密度极高而变得十分棘手（顺便指出，这都是轮船航线上没有遇到的）；还有许多人担心，铁路网的建立将使中国更易遭外国军事侵

入。种种原因使得国内抵制情绪极高。结果，1876年英国未经授权而试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清政府竟立刻买下这条铁路，把它拆掉。

王韬对修建铁路的提议最迟可追溯到他旅居欧洲期间。初次乘火车旅行把王韬弄得眼花缭乱。他在一封家信中预言，不出100年，全中国将变得铁路纵横交错。回到香港后，王韬反复描述铁路的军事、经济用途。军事用途在普法战争期间得到了证实，当时德国人用火车装运军队、给养、武器弹药和邮件。经济利润同样是巨大的，尽管载客的利润不如载货的利润大。王韬指出，铁路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欧洲人以铁路里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

王韬知道，欧美人都很渴望中国同意他们修建铁路。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主动，就会像轮船航运业中已发生的情况一样竞争不过外国公司。王韬早期国家主义的另一表现是他强调铁路综合功能。铁路不仅便利地区间的商业贸易，而且可以把疆域辽阔的中国变成一个军事统一体。这样，一旦国家的某一部分突然发生麻烦，不几天就可把别处的军队调集到那里。

电报的综合价值更加明显。由于日本狙伺于东南，俄国虎视于西北，王韬觉得应赶紧发展中国各地的快速通信能力。这样，一处有急，可全省震动，一省有事，可全国警醒。王韬用中国著名军事术语——常山之蛇的比喻来表达统一有机体的概念，说明整体中各部分的互相呼应和迅速反应。作为他考虑的一个具体事例，他指出了中国的海防问题。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需要保护，却只有为数很少的近代军舰。如果没有电报，那么多数海岸线随时都易遭敌人袭击。但如有电报，外敌入侵就难多了。

王韬之所以主张中国建立电报体系，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但他也认识到高速通信的非军事利益。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伦敦参观了中央电报局，亲眼看到了普通市民如何充分使用电报。他也称赞电报为国际和跨洋通信提供的便利，尤其是国内政府与国外外交代表间通信的便利。当王韬风闻美国计划架设横渡太平洋的电缆，连接加利福尼亚和上海时，他热情称赞美国人的首创精神和深谋远虑。令他十分痛心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如同许多领域一样，远远落后于西方。

开矿

如同王韬看到的，中国求富的问题包括两层：必须一方面保护中国的“利”不外流，另一方面又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当然，两者并非总是截然分开。当中国军事工业被迫依赖进口钢铁时（事实上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就会产生资金外流，而这又可以采取提高国内产量的办法来避免。[注]

当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采矿业。据芮玛丽认为，同治中兴时期人们对开矿的抵制比其他经济开发的抵制都小。[注]然而，这个看法只是相对正确。因为，在同治中兴期间及其以后，大规模的现代采矿都遭到了农民、士绅、官吏的普遍抵制。这里的关键词是“现代”和“大规模”。令人担心的是，机器采矿会使人们失业，而大规模地开采地下财富，除了会破坏中国称之为风水的地力平衡外，也会使人们脱离主要的职业——农业。

对于这些问题，王韬表现了改革者最突出的弱点之一：不能理解和真正严肃地对待社会惰性。他总是习惯于揭露反对变革的谬论，但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只要能在思想上瓦解对手，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带着内心的精英意识，他只是把辩论的矛头对准保守主义堡垒的理性外壳，从未形成解决其非理性基础的思想战略。

这样，王韬坚定地认为，发展现代采矿根本不会产生失业问题，其实倒会绝对增加就业机会。[注]但怎样去说服那些没有经济发展观念的劳动群众？他认为明代采矿业的混乱局面不是因为矿业本身，而是由于经营失当。[注]这种看法也许同样是正确的。但谁能保证新办的矿业不会有欺诈和无能的现象？“风水”问题怎么办？王韬把“风水”看作纯属迷信当然是很好的。[注]但对于一般中国农民，他们难免不认为损害地貌会造成世界失调，招致灾难。相信“风水”恰好是人们抵制采矿的最深层根源之一。（顺便指出，这也是人们抵制修筑铁路的原因之一。）[注]

这就是王韬在反对派那里遇到的问题。王韬是如何主张发展采矿业的？他强调，在蒸汽、铁路和机器时代，煤、铁是富强的主要基础，其重要性超过金、银。[注]他认为，事实上欧洲煤、铁日益缺少正是19世纪70年代西方殖民活动继续兴盛的主要原因。[注]

在西方地质学家如李希特霍芬男爵（Baron Von Richthofen）的报告中，断定中国矿藏丰富，特别是煤层不仅品位高，而且比欧洲的贮藏量丰富20余倍。[注]王韬说，中国开发这些自然资源有许多好处：第一，也是最常见的，从自然界开发财富是不加赋税而增加国家收入的一条途径；[注]第二，使用中国出产的原料，可减少制造武器、船舶和机器的费用；[注]第三，向来华西人售煤可以获利；（王韬指出，这明显合乎西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无须再从国外运煤而花运费。）[注]第四，已经提到过了，发展采矿业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直接造福民众。

既然开矿好处如此明显，为什么人们对它的抵制那么强烈？一个答案当然是，即使到了19、20世纪之交，大多数中国人仍没有投身于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开矿的好处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明显。王韬指出中国煤矿之多天下无匹，如继续“自域”，那也于事无补。[注]另一个解释是，中国近代采矿业是19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它被资金和经营问题严重困扰着，从而使一些可能的投资者常常对它避而远之。[注]简而言之，开矿遇到了困扰中国其他早期近代企业的相同困难。

技术和机器生产

虽然中国人的抵制是近代采矿业不能迅速发展的主因，但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可以从西方借鉴技术，雇用技术人员，它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这种发展方式却产生了很现实的不利因素：它费用高昂；它使中国处于更依赖外国人的地位；它将增大而不是减少本国抵制改革的情绪；而且它延缓了中国成为新技术的独立生产者。

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在19世纪，人们并不难认识到西方强盛与西方技术之间的关系。而被许多中国观察家长期忽视了的，乃是西方技术之能动、发展的性质。这种失误并不奇怪，因为当时人们是透过这样一种眼光看待西方威胁的，它为了有限变革而提出了一整套“体用”的论证。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借用技术者可以无须经过大的社会变革就与技术生产者并驾齐驱。但当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时，借用技术者则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继续借用技术、冒长期落后的危险，要么提高自己的制造

技术、经历变革，摆脱自身的局限。

王韬看到了这种困境，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爱丁堡参观了国外武器展览，从而亲眼认识了技术不断革新的事实。他惊奇地发现，几年前（1863）自己与人合著的火器制造方法已经过时了。[注]王韬看到欧洲技术的发展，因而警告国人说，随着国家竞争的激烈，至少在军事领域中[注]，不要以为欧洲人会停留在过去的成就上。相反，他认为各国都会不断努力改进现有技术，发明更新更好的类型。这里给中国的训诫是明显的：如果满足于一味仿造，那么在掌握某种技术之时，它就已经过时了。中国与西方有效竞争的唯一途径是跳出模仿，自己发明创造。[注]

并不是说王韬的一切见解都有先见之明，但他十分清楚——需要建立技术培训机构和促进发明的奖励制度。同时，王韬虽然早年谈论技术时注重军事用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生产领域中的重要性，在其思想中显得愈益突出了。

早在60年代后期，王韬就主张中国的所有生产领域都采用机器。[注]不过，他主要关注的一直是纺织业。他把纺织业看作仅次于现代采矿的致富来源。这里，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机械化的最大好处就是节省劳力和增加生产率。1865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指出，既然机器驱动的纺织器具抵得上100名手工劳动者的产量，那么，如果每10家配备一套近代纺织机械，则每家可获得原来10家的利润。[注]

王韬讨论纺织生产时，对中外贸易关系特别敏感。重商主义的观点是：外商获利必会牺牲中国的利益。部分是由于这种观念的作用，王韬担心纺织品的进口贸易会产生不良后果。在他看来，中国阻止利益外流的办法是自产布匹。他估计，由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运费，中国生产的纺织品将比洋货售价低，从而把它挤出中国市场。同时，这还可附带扩大中国人的就业机会。[注]

与洋货竞争只是王韬鼓励本国生产的动因之一。另一因素是要使中国能恢复传统出口市场并获得新市场。王韬注意到，最近中国已在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贸易方面遭受日本、印度的侵蚀。这里形势十分清楚，如果中国要恢复这些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就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必须发展新式生产技术，普遍地变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兴趣、标准和

需要。开拓新市场同样如此。如果美国可以向全世界出口日用品，印度骑兵可以从遥远的澳大利亚补充马匹，这对于拥有大量畜牧资源的中国来说，继续忽视整个畜牧业讲得通吗？王韬认为，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他在其他领域也运用了相同逻辑，并引用日本的显著成就为例。日本在吸取西方生产方法、根据国外需求调整国内生产方面获得了成功。

国外贸易和经济上的国家主义

在提倡现代生产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王韬总是几乎着迷地专注于跟西方的经济竞争。似乎中国参与竞争只是为了免于落后，如果中国停滞不前，就会在西方经济渗透的发展势头面前被迫屈服。人们有理由问：这些担忧是否言过其实？这日渐成为西方经济史家议论的话题。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王韬有过这些担忧，而且它们决定性地影响了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

当我们提出为什么发展经济时，问题就变得有点儿尖锐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原因多种多样。经济发展可能是不同程度地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果而自然发生的，或者如同20世纪更普遍的现象，乃是政府图谋社会福利或强权政治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王韬的思想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从而为提高国力奠定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韬摒弃了私人营利的目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和中国传统模式倒确乎如此。两者都把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商业上的）利益根本对立起来，以为后者财富的增长只能靠牺牲前者的利益。但当王韬和19世纪的中国其他改革者审视当时的西方时，他们发现了上述两种模式都无法解释的情况。他们发现的关键特点，中国只能在通商口岸才见得到。这就是商业财富与国力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财源，后者为前者提供保护。

罗伯特·L. 雷诺兹（Robert L. Reynolds）在论述近代早期欧洲时，说明了西方经验的这一独特方面：

> 对欧洲商人来说十分宝贵的是，他们的政府全力支持商业，认为谋求商人阶层富裕和强大的途径与手段都是正当活动。欧洲商人遇到的外国列强可能在战争中与欧洲人不相上下，但它们都没有在

> 促进贸易、提携商人方面如此有力……鼓励贸易的现代政府都效法六七百年前欧洲强国树立的榜样。那些欧洲国家的理论是：如果他们的商人阶层强大富裕，那么政府本身便会在战争和外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注]

毫无疑问，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的这种理论对王韬的思想产生了作用。王韬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如下论述：“英之立国，以商务为本，所至之处，以兵力佐其商力。美洲之新辟、印度之渐据，皆商人为先路之导。所设东方贸易公司，商人为之也。印度之取，中国之通，实维商人是赖。所资于群策群力者，岂不巨哉？”[注]

中国曾经不相信一个国家会为了推进少数商人阶层的利益而派军队远涉重洋。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这种怀疑迅速减少。一些人终于从欧洲的事例中得到启发，开始提出一些难题，要求注重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商业与增强国力间的全面关系。

中国传统的准则是：农业为“本”，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商业次之，是农业的副产品，或曰“末”。这种标准除了相当准确地反映出近代以前中国经济之基本的农业性质外，还表达了一种价值取向：农业是好的，商业是坏的。这种价值取向部分地来源于儒家的轻利思想，部分地源于国家对土地税收的依赖。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只有农业是实际创造财富的经济成分，并承认总的来说经济没有增长，结果必然是政府和商人成为多少有限的农业剩余产品的争夺对手。

尽管存在着否定商业的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有大量商业活动。许多世纪以来，商业市场结构发展了，就前现代的经济来说，这种市场的规模和复杂化程度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与近代西方商业相比，中国商业的某些特征严重阻碍了自身的发展。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考虑到商业完全是出于控制和税收的目的，而不是保护和促进它。第二，就中国的主要社会阶级而言，商人地位最低，至少在士大夫统治阶级的观念中是这样，而且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也如此。第三，中国占压倒优势的贸易是国内贸易。迟至1913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可能仍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小。[注]第四，中国的市场结构基本上是农村经济的延伸，交换的商品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第五，落后的交通运输（很费钱和时间）、不相适应的信贷和银行条件、中国通货

的混乱状况，都阻碍了国内一体化市场的发展（即使其中也有政治、文化原因），严重妨碍了中国商人去打破对欧美贸易中的外国垄断。

在所有这些领域，王韬都积极提倡变革。而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坚持重农轻商，因为中国历来如此。他们对发展商业导致的舍“本”局面十分惊恐。王韬公开地嘲讽道：

> 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
>
>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4页

正如王韬所看到的，多数士大夫除了十足的伪善之外，还坚持对新形势（尽管它已不算新了）视而不见。国外贸易的不良影响（王韬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不能以置若罔闻的办法来对付，只能正面解决。正因为这样，王韬像他的朋友郑观应一样（但并未受郑的影响）注，采取了许多具有经济国家主义特征的立场。王韬知道，如果说西方入侵中国靠的是优越的军事力量，那么其主要目的则是物质利益。在近期内，中国不能在军事上与西方竞争。但它可以采取措施在经济领域竞争。如果通过这种竞争能使待在中国的西方人日渐无利可图，到时他们或许会离开。王韬在19世纪60年代最先运用了这种推理模式。它使人们奇妙地联想到列宁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在王韬的最后岁月里，他经常给影响广泛、倾向改革的教会刊物《万国公报》撰稿。该刊成了他的主要评论阵地。

外国人在华的任何营利行为都对中国绝无好处，引起中国财富的外流——这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王韬和许多中国人的基本假设。注所以，问题在于如何恢复、维护或控制那些已经或将要被西方（还有后来的日本）掠夺的中国利源。在其他情况下，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提高国外进口关税。然而，中国在通商口岸丧失了自主权，大多数货物的关税率已固定为5%。虽然王韬痛惜中国关税自主权遭受限制注，但他又十分明智地看到，只要中国继续衰弱，就不可能成功地说服外国人放弃他们享有的特权。所以，如要阻止中国财富外流，就需要一种不同

的方法，不再指望西方列强的仁慈。

王韬的解决要旨是：中国在经济活动中摆脱被动，采取主动，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削弱西方的营利能力。[注]应该鼓励成立中国的轮船公司，从而在内河航运中与外国公司竞争。应该发展现代采矿业，从而使中国自身能满足西方轮船和中国工业的需要。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机器纺织业，取代从西方进口毛棉织品。在其他生产领域同样应该如此。王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增加国内鸦片生产，从而降低进口鸦片价格，减少外国人获利。[注]

王韬认为，首先在商业领域，尤其是外贸方面需要变革。正是在这方面，西方最易遭到中国的竞争。于是，1875年，王韬写信给丁日昌说："设使一旦（英国）通商之利为我所夺，则其煤铁机器之用，布帛制造之物，消流日狭，而工贾必多失业，外既不振，内且有变，而印度一隅，不几势成孤立，或恐作瘈狗之噬，困兽之斗，且奈何！"[注]

此处表现的早期列宁主义式的分析在其后一二十年的中国改革者中相当普遍，这也揭示了列宁在20世纪产生巨大号召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列宁主义的结论是，国家资本主义只有在打破外国经济束缚（大概以政治手段）之后才能获得生机。王韬的看法正好相反：为消除外国经济侵入，就必须改革和增强中国经济。

王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两个突出的主题。其一是他于1862年提出的观点：中国商人不要消极接受对外贸易，而要使用中国建造的船舶，由中国保险公司承保，学会自己向海外发展。虽然中国商人历来在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但他们很少到更远的地方去冒险。在远距离贸易比重很小的情况下，这原本无关紧要。但随着19世纪以来中西贸易的发展，诸如造船、航运、保险、银行等辅助业务日益占据了重要地位。上述每个领域都有获利的极好机会。而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欠缺，它们都被西方垄断了。王韬要求中国向这种垄断发起挑战。[注]他曾附带指出，国际法中绝没有阻止一个国家本身进行海外贸易的规定，而当中国商人开始向欧洲国家出口商品时，也不应该让他们交纳多于值百抽伍的进口税（中国通商口岸规定值百抽伍）。[注]

随着中国参与各种进出口贸易进程的增多，也会带来间接利益。它会给中国劳工提供更多技术性与非技术性的工作。遇到危急情况，政府

可以号召海外的中国商人以各种官方身份效力，并提供必需的物资（危机结束后，商人当然应得到大量补偿）。[注]在非经济方面，海外中国人活动的增加将使政府更熟悉西方情况，从而可能在影响中西关系的事务上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建立具有世界规模的轮船和保险公司也能张扬国威、扩大影响，正如过去的东印度公司对英国之所为。[注]

然而，发展中国的海外贸易事务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这里引出了王韬的另一重要主题：中国官方对商业的态度需要根本改变。王韬认为，“务财”与“理财”之间有本质区别。“务财”是私事，与自己有关，而“理财”是公事，与国家有关。掠夺民脂民膏以自肥与开发财源以利民，这两者泾渭分明。儒家经典谴责的只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注]

王韬至少在1865年就表达了要求政府改变这方面政策的意思。他当年致书李鸿章道：“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注]

简而言之，王韬希望政府改变传统的否定或至少也是轻视商业的政策，代之以积极关注和有力促进的商业政策。为此，他主张使用纸币，建立国家银行。[注]他也主张政府与商人合作建立新公司。当然，他又告诫：商人必须通盘掌管全部事务，以便官吏不“与其争利”。[注]王韬大胆地主张废除厘金。厘金是对内地商业征收的多种税，设立于19世纪50年代早期，目的是帮助政府筹饷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是，起义被荡平后很久，征收厘金并未停止。这使外商十分懊恼，认为厘金是他们扩展贸易的主要障碍，王韬反对厘金看似直接反映了外商的观点，仿佛证实了他的“帝国主义走狗”形象。然而，如果更仔细地审视一下，便可发现一些更复杂的内容。王韬同意厘金妨碍贸易的说法，同时他也看到，由于税收最终以商品的高价形式落到消费者头上，因而它有害于民生。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厘金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合理岁入的需要？第二，它是解决这种需要的最好途径吗？王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支配了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反应。据他估计，厘金总数中只有20%—30%真正用于政府需要，其余的都被官僚侵吞私饱。这就是候补官员中热衷于担任征收厘金官职的原因。王韬认为，这也是改变地方政府岁入来源的最好理由。提高鸦片税收和对国外烟酒课税都是可能的。或者，也许可以在不太扰民的情况下恢复过去的人头税。或者——这是王韬最后主张的解决办法——中国政府可向外国列强提出，以完全废除

厘金作为补偿，把进出口关税增至20%。[注]王韬估计，外国人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但也许可与他们讨价还价。

到19世纪90年代初，王韬发现需要官方更明确的赞助以推动工商业，因而提出为此设立商局。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商部。商局负责收集和整理情报、开发中国经济资源，并寻求防止中国财富外流和吸引外资的办法。归根到底，王韬认为，只要不因此遭受损失，外贸就是一件好事。但确切地讲，中国却正在遭受损失。世界丝绸贸易空前繁荣，而中国从中的获利却持续减少。其中原因何在？因为中国的贸易仍拘泥旧习，恪守过时的方法，对世界变局视而不见。商局的设立有助于扭转这种局面。王韬又认为，政府有必要设立特殊的商业和技术学校。这样，中国商人在出国从事贸易之前就能接受数学、地理和外语方面的训练。[注]

王韬在文章的最后问道：为什么中国经济成就不及西方？其回答是："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开其端，而官为之扶持，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十余年来，西商之为华人夺其利者亦复不少。"[注]

类似的言论出现在约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韬一篇论"变法"的文章中。在主张全局变革（"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之后，他告诫："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注]

这两段论述的主要意义是完全表现了王韬的家长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一切领域，王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改革的主动权来自政府。现在，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奇怪或反感的了，家长主义一直在中国近代改革者中蔓延不衰。但它产生了一个问题。王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地知道，指望中国政府在现有条件下扮演改革者是不现实的。如果中国经济领域需要巨大变化，那么，政治领域也不得不进行变革。

---

1. 费维恺，《中国经济：约1870—1911》（安阿伯，1969年），第1页。

2. 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1961年），第84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武汉，1957年），第55—66页；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北京，1957年），第53—56页；王维诚，《王韬的思想》，第47—49页；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1955年），第106—107页。

3. 见史华慈书，尤其是第二章。

4. 见本书第一章。早期提到富强目标的其他地方可见王韬给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约1859—1860年）；《弢园尺牍》，卷4，第19—20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2，第

31—33页。

5. 《弢园尺牍》，卷7，第7—8页。

6. 同上，卷8，第15—16页。

7.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4—16页，卷3，第22页，卷4，第25页；《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载《万国公报》（1893年10月），卷57，第9页。

8. 例如，见《甕牖余谈》，卷3，第5—6页。

9. 《甕牖余谈》，卷3，第5—6页；《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2页；《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第9页；《弢园尺牍》，卷8，第10—11页。

10. 《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19页；《法国志略》，卷16，第18页；伟烈亚力、王韬：《华英通商事略》，见《西学辑存六种》第二，第15页；《弢园尺牍》，卷9，第19页。

11. 例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4—16页，卷3，第22页，卷10，第22—32页；《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第2—4页。

12. 维尔纳·桑巴特认为，现代人的四个“人生价值”是迅速、规模、新颖和力量。见他的《资本主义精神》（纽约，1915年），M. 爱泼斯坦译，第176—180页。

13. 《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23—24页，卷7，第18页。

14. 《弢园尺牍》，卷4，第7—8页。

15.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8页，卷3，第12—14页，卷7，第16—17页；《致李鸿章信》（1865年），《弢园尺牍》，卷7，第9页。

16.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8页，卷3，第12—14页，卷7，第5页；《上当事书》（约1884—1885年），《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0页。

17.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3页，卷3，第12—14页；《致丁日昌信》（1875年），《弢园尺牍》，卷9，第18页。

18. 《弢园尺牍》，卷11，第3—4页。

19. 《甕牖余谈》，卷3，第2—3页。虽轮船招商局部分地由政府资助走海路运送皇粮，但1901年前并未完全取代大运河漕运。

20.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3、15—16页，卷3，第22页。

21. 1881年的记载提供了人们抵制铁路的情况，某些细节可参见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1840—1937》（剑桥，马萨诸塞，1965年），第242—243页。

22. 《弢园尺牍》，卷7，第18页；《漫游随录》，第9823页；《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18页。

23. 《普法战纪》，卷5，第10页，卷7，第1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1—23、25—27页；《法国志略》，卷17，第27—30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3页，卷4，第16页；《漫游随录》，第9840页。

24.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6页，卷3，第25—27页；《法国志略》，卷17，第27—30页；《弢园尺牍续钞》，卷4，第16页；《漫游随录》，第9840页。

25. 《法国志略》，卷17，第27—30页。

26.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5—27页；《弢园尺牍》，卷8，第11页。

27. 尤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6页；卷3，第22页。

28.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14—15页。

29. 《法国志略》，卷17，第30—3l页；《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3页。王韬讨论电报时忽视了它对世界银行、贸易的重要影响。

30. 《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5页。

31.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183页。

32.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6页，卷l0，第31—32页；《弢园尺牍》，卷8，第10—11页。王韬尤其主张在人口密集的广东、福建发展采矿，从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使这里的人不必到国外谋生。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4—25页。

33.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6页，卷10，第23—24页；《甕牖余谈》，卷3，第5—6页。

34.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4页。

35. 由于人们相信最容易的直线移动的不良影响，因而铁路的路线、隧道便产生了特殊问题。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上海，1917年），第1卷，第175页。

36.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4页，卷10，第23—24页；《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第8—9页；《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第5页；《弢园尺牍》，卷8，第10—11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2—13页；《甕牖余谈》，卷3，第5—6页。

37.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6页。

38.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5页，卷10，第23—24页；《甕牖余谈》，卷3，第5—6页。

39.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21页，卷10，第23—24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13页。

40.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4—15页，卷10，第31—32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5、12—13页。

41.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4—15页，卷10，第31—32页。王韬的这种考虑完全正确。由于中国的煤或者太贵或者质量太差，所以在华航运的外国轮船公司每年总是从远至英美的地方进口大量的煤。见侯继明书，第65—66页。

42. 《甕牖余谈》，卷3，第5页。

43. 王韬在《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中谈到近代采矿公司遇到的一些困难，见该文第8页。

44. 《火器略说》后序（1871年），重印于《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1—12页。1871年以后的著作中，王韬经常提到西方不断发展的技术革新进程。

45. 《弢园文录外编》，卷5，第16页；《普法战纪》后序（1871年）；《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8—19页。

46. 《火器略说》后序（1871年），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11—12页；《火器略说》后跋（1880年），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页。

47.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18页。

48. 《弢园尺牍》，卷7，第8页。

49.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5页，卷4，第20页；《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第2—4页。在一篇文章中，王韬表现了对进口棉布威胁中国手工产品的关注。见《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载《万国公报》（1893年2月），第49期，第6页。

50. 《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第2—4页。

51. 《欧洲的出现：向全球工业社会的转变，600—1750》（麦迪逊，1961年），第418—419页。

52. 《西学辑存六种》序，第2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25页，卷10，第23、27页；《华英通商事略》，第15页；《弢园尺牍》，卷7，第8页。

53. 费维恺，《中国经济》，第56页；R. 墨菲，《通商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何在？》（安阿伯，1970年），第46—47页。

54. 王韬最先知道郑观应的工作是70年代（最早在1871年）。当时郑观应把《易言》的手稿送给王韬，请他批评。然而，王韬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在1865年致李鸿章的信中就已表现出来（见下面正文）。关于王韬与《易言》（似乎初版于1880年）的关系见市古宙三的杰作《论郑观应的〈易言〉》，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0年），第107—115页。《易言》经济思想的论述，见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上），载《清华学报》新刊（1970年8月），8.1—2：398—4l0（422—425英文摘要）。郑观应成熟的观点表现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二册，第753—766页。见本书第九章第225页注释10。

55. 这种称之为“流失作用”的论点已为现代经济学家阐明。见侯继明书，第93—94、131、254页。

56. 见王韬，《厘捐弊论》，载《皇朝经世文三编》第一册，第739页；《致唐景星书》（约70年代后期），《弢园尺牍》，卷11，第2—3页；《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8页。

57. 王韬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时想到了日本明治初的情况。当时日本同中国一样面临外贸人超、白银外流的局面，日本政府通过协商提高进口关税来解决。所以，明治初工业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促进与洋货竞争产品的生产，从而把洋货挤出国内市场。见托马斯·C. 史密斯，《日本的政治变革与工业发展：1868—1880年的官办企业》（斯坦福，1955年），第26页。

58. 《弢园尺牍》，卷7，第10页。另一方面，王韬极力主张采取各种措施禁食鸦片。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1页，卷4，第12—14页，卷12，第13—15页；《救时刍议》（上），第12—13页；《甕牖余谈》，卷3，第11页。

59. 《弢园尺牍》，卷9，第20页。华商与外商竞争效果逐渐增强的资料，见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中西之间的桥梁》（剑桥，马萨诸塞，1970年），第117—120页。对王韬的论点做进一步引申，约翰·A. 霍布森（1902年）写道：“至少可以设想中国能对西方工业国转败为胜，或者采纳西方的资本和人才，或者更可能通过自我更新，以廉价商品打入西方市场，在贸易中限制商品进口从而得到西方支付的资金，扭转早期投资局面，直到中国逐渐从金融上控制从前的资助者和启蒙者。”引自入江昭，《帝国主义在东亚》，载克劳利，《近代东亚论文集》，第132页。

60. 费维恺指出，尽管王韬这些人提出了劝告，但迟至20世纪20年代，进出口的实际进程仍“几乎完全”操自外人之手。见《中国经济》，第59—60页。

61. 王韬最早提倡（1862年）中国商人开展海外贸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2，第3l—32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8—19、25页，卷4，第2—3页，卷10，第23、25—27、31—32页；《弢园尺牍》，卷7，第8页。最初，王韬为越南提出同样的措施（发展海外贸易），作为使越南避免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出路。然而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绝望地认为越南毫无解救办法。见《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5—9页。

62.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3页。

63.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6—27、31—32页；《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第7页。

64.　　《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第6页。

65.　　《弢园尺牍》，卷7，第8页。

66.　　《弢园尺牍续钞》，卷4，第5页；《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8页。

67.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5、27页。关于这一点，王韬经常提出政府在经济事业中应“与民共其利”。例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9—21页。

68.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3页；《厘捐弊论》，第738—739页。王韬对厘金的看法是否有根据当然是另外一回事。费维恺就此说道：“与15%—100%的运费和其他手续费相比，看来一般每个税卡2%的厘金不会对内地商业总数和全局产生很大影响。英国……发现很难在中国内地售出兰开夏布匹是因国内手工纺织业存在有力竞争。中国国内商业市场结构和规模受到压制主要不是由于政府过重的苛捐杂税，而是受落后的交通运输限制。”见《中国经济》，第47—50页。

69.　　《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第6—7页。

70.　　《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第6—7页。

71.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4页。这里我采纳的观点，见狄百瑞，《中国传统之源》，第720页。

第八章 政治改革

王韬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其改革方案中最激进的部分。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现王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古代的政治模式和理想并从中获得启发，开始时真叫人琢磨不透。其实，对一个仍与旧文化密切相联的人来说，这种思路必然有其吸引力。而且，它是具有改革倾向的经世传统的主要特征。但这是否具有思想的合理性？我想回答是肯定的。首先，王韬追寻的模式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性质，不限于特定的时间（古代）或空间（中国）。他对善良政府和政府反映民意的理想有着强烈的特殊感情，他表达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想的方式也同样一往情深。然而事实上，这很少与中国或传统有关。这种理想更像是各时代各国家的政治思想家都执着追求的普遍永恒的真理。

其次，密切相关的是，推动王韬惯于追求中国古代模式的因素是这种模式的模糊性和笼统性。例如，王韬经常从《尚书》中引用一句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脱离上下文关系，这句名言的含意则完全不能确定。诚然，我们被告知，国家的稳定依赖于人民的状况，但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使民"固"却并未讲清楚。把人民形容为国家之"本"时，也没有说明把他们看成是工具还是目的。[注]

最后，王韬根据中国古代政治理想论证变革的第三个（也是更本质的）基础是他历史观中的退化论。像许多人一样，王韬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秦以降每况愈下。所以，提倡先秦政治模式的复兴并不一定倾向于反动；它恰恰可以意味着赞成彻底的改革。由于同样的原因，当王韬称赞西方政府具有"三代之风"时，并不是说中国从前的礼仪内涵值得重视，而是乐于（决非礼仪上）承认最具有中国政治理想特征的模式在当代西方社会取得了成功。既然王韬没有对中国社会做出同样的评价，所以，赞扬西方意味着他极有可能与中国旧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分道扬镳。

良政方案

王韬对于政治或者所谓“治民”的热衷，可以追溯到他刚刚成年的时候。然而我们看到，他所关注的具体内容随着岁月的推移发生了巨变。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王朝面临的突出政治问题是人民起义。只是在主要暴动一一平息了之后，中国政治的注意力才逐渐转移到国家的积弱问题。这种转变自然影响了王韬对治国当务之急的看法。无论如何，他认识到的中国政治的主要缺点改变之小令人吃惊。它们可以分属两个题目：不合常理和不通下情。这样划分也许有点儿不当。当我们讨论这些缺点时，最好牢记在王韬那里它们是密不可分的。

走向更合理的政治

王韬的用语中没有“合理”这个词，但在我看来它最能体现王韬衡量中国政治行为的一种标准。集中地看，中国的政治行为日益变得怪异。诸如烦琐、奢侈、极端僵化和充满混乱等现象，根本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王韬对它们进行了批评。

王韬从19世纪70年代起谴责的许多现象都是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着重批评过的（见第二章）。然而，其中的某些现象在和平时期更为严重，王韬的批评相应地也更为激烈。以捐纳增加国家岁入的习惯就是一例。现在我们知道，1840年四至七品的地方官（包括道台、府、州、县的地方长官）中有29%是靠捐纳而来的。到1871年买官的比例增至51%，1895年仍高达49%。[注]王韬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他知道买官风气已极为普遍，并对它给政治带来的潜在后果十分担忧。如果把征收厘金这种肥缺委任给捐纳者的现象十分普遍，则捐纳便完全成为市场交易了。王韬认为，与此相比，科举制虽有种种缺点却是明显的进步。王韬主张立刻废除捐纳制度，开辟其他财源来弥补这一方面的损失。[注]

这里的一种可能性是裁撤一切没有必要的官员，这也适合其他方面的要求，除了从中自然节省开支外，还绝对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例如，王韬注意到一省之中存在着总督和巡抚权力重叠的问题。两个权臣意见碰巧一致时，则一切好办；但当他们意见龃龉时，则权力分裂，政事不能顺利进行。实质上总督并不总是常设官职。从明代开始设置的总督是为了统帅地方军队，而一旦地方平定之后，就立即裁撤。王韬主张，除直隶、四川、甘肃之外（这三省未设巡抚，故无权限纠纷），各省已成闲职的总督职位都可裁撤，从而恢复明朝实行的简便制度。[注]

王韬没有拘泥于这一件事（裁撤总督），重要的是应使政府减少繁

琐，提高效率，更为精简。为此，他反对一职数人的做法，并极力主张（如他1862年提出的一样）延长各级官吏的任期。注 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律例混乱导致中国行政程序的混乱是多种弊端产生的根源，故需要大量减少烦琐的律例。王韬大约撰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题为“尚简”的文章广泛论述了这个看法：

> 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牍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禀报之案，虚词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纭，互相牵制。不知此便于吏胥舞文弄法，索贿行私……
>
> 昔者汉高祖之入关也，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耳……然则治天下，岂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时至今日，在官与民皆患其繁，势不得不以简御之。
>
>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6—17页

这里非常隐晦地回应了黄宗羲有关“法之法”与“非法之法”的区分。前者是三代的简要法律，为民而设；后者是“全而密”的后世之法，为一家（统治家庭）而立，成为“混乱之源”。儒家总有些不相信积极的法律，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越需要法律就必定越倒退。然而，王韬并非这样来反对法律（正如黄宗羲一样）。他所反对的是无限制地、无必要地增加法律。正如黄氏指出的：“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注

律例的增加，再加上十分看重中国行政规程的先例，遂大大助长了律例和地方知识的重要性。既然掌握这些知识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官府衙门的职员（据估计，同治时期这些人总数在百万以上），因而，他们处于操纵全体、图谋私利的关键地位。这给人民带来无数危害。同时，因为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恰恰在那些最烦琐、最不合理的制度之中，因而他们成了改革的巨大阻力。王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注

他在1870—1871年间致丁日昌的一封信中更详细地考察了吏治弊端的整个问题：“至于佐官为治者吏也，舞文坏法，半由于吏，以吏无责

成而品望又卑贱，其惟利是视宜也。……官或一岁数易，吏则累世相传，官多深居简出，吏日周旋于民间，其足以欺蔽官者，势所必然。夫以世所卑且贱之人，而欲责以士君子之行，亦势所不能。”注

既然中国官场的多数文牍工作皆由吏担任，那么吏的职能本身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可以要求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具有较高的道德和知识素养。这正是王韬的主张。他尤其倡言今后吏的工作应由真正的士人充任，并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提升为地方官员，或者予以罢免。注王韬实际上要求大大扩展正规的政府机关。这是一种基本的解决办法（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类似的措施）。它所根据的前提正如芮玛丽所表述的：“儒教国家的吏治只能以儒家等级授职，从而使之受儒学的训导和控制。”注

更通下情的政治

正如“官僚下层”的吏妨碍官民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一样，官僚本身也成为君民之间有效沟通的巨大障碍。皇帝极为孤立，远离民众，因而他根本不可能体察民情，适应人民的需要。而官僚在这方面则完全像一个个小皇帝。他们非但对民生漠不关心，而且残酷地剥削人民。人民的回应则是对政府完全丧失信心，日益冷淡、疏远和不忠。这是王韬（或许受顾炎武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初思考过的问题（见第二章）。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它成了王韬政治评论的主线。

70年代末，王韬在题为“重民”的重要论文中生动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帘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
>
> 君既端拱于朝，尊无贰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飏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呜呼！彼

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至愚而不可诳也！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2页

王韬在该文中显然没有放弃家长主义。确实，他在下文说得十分清楚：“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注]有些历史学家从这里得到启示，赞扬王韬提高人民的重要性，同时批评他不充分的民主主义：“他只能谈论治民，不能谈民治。”[注]但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两分法过于专断和机械，没有准确地考虑王韬的政治地位。确实，王韬从未提倡“民权”，但拒绝民治并不意味着成为专制主义的朋友。在两极之间有一片重要的中立地带，王韬正是站在这里。

而且，王韬有许多同道。正如刘广京指出的——“亟于扩大士子与君主的沟通、改良专制制度”是19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持续主题。[注]持续并非不变。在初期，批判专制主义的言论还未受西方影响（包世臣、龚自珍和早年的王韬无疑是这样，后来曾国藩、冯桂芬的批评也许同样如此[注]），然而，大约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的言论开始明显受西方榜样的影响，从而增加了对西方议会政治的兴趣，并最终导致提倡议会。

王韬批判专制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已突出地表现在上述引文中，王韬也几乎借一切机会反复申述——这就是关注不同政治阶层的隔阂问题。王韬认为，巨大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把君与臣、官与民分隔开来，其不良后果不仅导致无能，还使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人性。在当今社会人们十分疏远的情况下，有钱有势的统治者由于远离贫弱的被统治者，已对后者的需要和困苦麻木不仁。由于没有目睹民众的苦难，他们很容易变成一种制造苦难的非人性机器。总之，王韬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人民为了政府而生存，而不是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怎样改变这种局面？既然归根到底，隔阂问题成了一种权力问题——在官员看来，皇帝大权独揽；在民众眼中，官僚拥有一切权力——因而，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分配两个层次的权力。关于第一层次（由君主和官僚组成），王韬大胆地批评中国皇帝（尤其是明清时期）采取许多措施以扩大实权和对付臣下。他主张根本扭转这种局面：“内而天子之权寄于宰相[注]，宰相分之于六部。外而天子之权寄于督抚，督

抚分之于牧令。皆必久其任，专其任，虽在远而信之不疑。”[注]

王韬特别关注授给总督、巡抚的权力，认为这是他们至关重要的职能。他主张扩大、加强他们的权力。他极力主张督抚行使这种权力时要看重其能力而不是资历，以保证选拔最优秀的人担任地方牧令。[注]因为，如果说督抚是省一级的重要行政长官，那么地方牧令的行政职责则使他们成为与民众联系最多的人。所以，这些基层官员的素质是良好政治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即使是优秀的地方官，想造福于民也需要时间。君主担心地方官在一处任期过长可能产生强大的地方关系网，而不再代表君主的利益。王韬反驳说，如果一位地方官知道他不过是短暂任职，那么他既无机会也无愿望较好地尽职：“其莅任也，朝履夕罢；其颁条教也，朝令夕改，几于视之若传舍，则官民何由相亲，地方曷克整顿也哉？”[注]

说到良政的另一方面——地方官本身的品质问题，王韬是十分清楚的。当好官的最重要品质就是能通民情。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表达民意的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能使官员自身顺从民意。正如王韬在一封信中指出的：“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注]或者，如他在《重民》一文中说的：“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注]

如果良政的目的是造福于民，那么人民不是最清楚该目的付诸实施的情况吗？王韬的回答是肯定的。与此相应，他至少曾经提出，人民或许应该参与选拔他们的官长。他在1884年的信中写道：“官之贤否黜陟，须以舆论之美恶是非为断。”他在该信中进一步提出选官的方法，这使人联想到西方的选举程序（他很可能受此影响）。王韬认为，现行的荐举制度权在上峰，而且被荐举的一般都是有官职的人。“窃以为荐举之权，当自下以达之上，采之舆论，参之公论，令一乡一邑，得以公举其所优，以所举最多者，呈之于官，然后择用焉，则其荐举公矣。”[注]

西方的良政榜样

王韬希望中国政府与人民更加接近、更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并受到民众某种形式的约束。这些愿望不可避免地导致王韬考虑西方各

国政治所展示的其他途径。参照国外观点的有效性，加上王韬有意运用这些观点，形成了与中国对专制主义的批评传统的鲜明区别。虽然就我所知，王韬从未明确地提倡在中国采用议会制度，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赞成这一措施。王韬反复陈述他推崇君主与人民分享权力的政治制度，而且，他大为称赞西方议会制度的作用。在《重民》篇中，他以下述文字比较了西方三种主要政治制度：

> 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
>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1—22页

王韬期待的政治制度，用他的话说是“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注]当时，与此最接近的就是西方的议会制度。王韬在撰写法国历史时评论了这种制度：

> 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睪然高望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
>
> 《法国志略》，卷16，第27页

虽然这番评论紧接在系统描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运转情况之后，但王韬赞扬的对象显然是一般的议会制度，而不是具体的法国（这说明了王韬为什么用“君”一词）。事实上，王韬对法国政治的技巧和成就的评价相当低。英国在这方面得到了一切荣誉，即使是在那讨人厌的

殖民统治方面。王韬说，法国失去和获得殖民地同样迅速的原因是——它统治人民的方法错了，获得殖民地也许是军事上的事，但保持它则必须知道统治人民的方法。可叹的是，法国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他们对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不但刻薄寡恩，而且驾驭如犬马，蹂躏如草芥。这样，土民虽愚，岂有不思报复之理？所以，法国殖民统治不断遭受土民起义的威胁。[注]

相反，英国人是巧妙的殖民者。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对国内和殖民地臣民一视同仁。香港在英国统治下得以繁荣，是因为治理良好。塔希提岛上的原住民由于开始受英国传教士的文化影响，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印度土兵不起来反抗外国主子，是因为一遇饥馑，英国统治者不乏同情，肯花大量金钱赈济灾民。[注]……当外国压迫中国的事情出现时，王韬本能地表现出早期列宁主义式的思想。但论及英国在全球的殖民主义行为时，他却完全丧失了警惕。因而，当听到英国有一部分人因巨大的财政开支而主张解散大英帝国时，他斥之为“浅薄”之见，并且毫不犹豫地站到帝国的支持者一边。[注]

如何解释王韬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出乎意外的温和态度？或许只能借解释将之消除？这种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很难否认，多年来王韬的观点已受到英国的某些影响。自1849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部分或全部由英国统治的地区（香港、上海公共租界、苏格兰），他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受雇于英国传教士。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为他而进行的干预，很可能救了他的命。在这种情况下，王韬在某种程度上以英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是毫不奇怪的。

但王韬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宽容态度也包含其他非个人因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英帝国充当了抑制俄国在远东扩张的角色。在全球战略格局中，英帝国主义做朋友比做敌人的时候多。王韬在许多场合主张英国与中国、日本结成防御联盟，以对付俄国的威胁。[注]

但人们在翻阅19世纪中国外交材料时，仍会对只给英国相对温和的指控感到愕然。英国是对鸦片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外国列强，开启了中国的百年羞辱史。它是在清帝国占有最大经济利益的国家，英国显然是西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代表。但当时的中国人（王韬为其中之代表），却偏偏把法国的宗教文化侵略或俄国、日本的领土吞蚀看得比英国的经济侵略更有危害。英国干的所有勾当很少被指责为罪大恶极。

在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中国人那里尤其是这样。把这些人看作亲英分子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们并未宽恕英国过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并非不为英国未来的野心而担忧。[注]然而，他们确实几乎无一例外地极为羡慕英国。

这种羡慕部分地基于对英国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理想化看法。王韬在《纪英国政治》中写到，英国官吏由荐举产生，任职之前必定有当地多数民众证明他们具有良好品行。而且他们一旦任职，对人民须仁慈正直，“从不敢严刑苛罚，暴敛横征，苞苴公行……腹万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英国人民大多数能够奉公守法。被怀疑触犯法律的人也将给予公平审判。如定为有罪，则送往监狱。其监狱制度也是中国三代以来所未有的。

王韬继续写到，重要的国家大事必定由上下议院讨论和同意，然后方能实行。和战问题必定征求全国意见，了解多数人的态度，“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

在赞扬英国政治制度的另一面——君主时，王韬间接地批评了中国相应的制度：“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舍，迤逦数十里也。国君只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嫔，从未有后宫佳丽三千之众也。”

在社会福利方面，中国也不及英国。虽然英国人民承担的赋税比中国人重得多，因为他们得到的福利也相应为大，所以没有什么怨言。公共工程和慈善机构都由政府资助。政府出资供养鳏寡孤独，努力帮助残疾人安置工作。在王韬看来，英国社会的良好状况不完全归因于政治，国家的经济实力（随之而来的低失业率）和每星期宗教礼拜的精神净化也都有益于此。因而，英国政治得到了最大荣誉，王韬立刻把它比作中国政治的远古黄金时代。[注]

如果说英国政治的仁慈特征是王韬高度评价该国政治制度的原因之一，那么它却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敢说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至少对王韬和中国其他改革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英国政治状况与英国国力的关系。他在《纪英国政治》中认为：

> 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

> 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通情，君民之分亲。
>
> 《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17页

对王韬来说，形成牢固的民族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我们发现，王韬在以大半生精力引进西学和西法之后（有时他明确地把这看作国家臻于富强的先决条件[注]），又在1893年重新提出："如欲真致富强，无论中法，无论西法，皆可以臻实效。首在乎上下一心一力，悉专工致志如此。"[注]

强国之道

在论及国力问题时，王韬对纯粹的军事因素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孜孜不倦地提倡改进军队的训练方法，实行更实际的军事考试制度，增加军饷，精简中国陆军，建立现代海军，建立广泛的防御设施网，采用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其他种种措施。[注]同时，有迹象表明，王韬认为中国的军事强大有赖于经济发展（见第七章）。而且，这充分表明——在王韬的方案中发展经济以及"治兵"的重要性仅次于"治民"。[注]用他的话来说，后者是真正的"国家之基"。

我们知道，虽然中国19世纪的其他改革者也认识到了密切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会产生良好政治，但第一个提出良好政治可导致一个强大国家的却是王韬。他尤其被西方社会表现的热心公益、急公赴义的观念所触动。他赞扬在1870—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时紧密团结所发挥的作用[注]，但真正令他动心的是促使远在雅加达、印度的德国商人自愿资助战争的无形力量。[注]法国迅速偿付战争赔款也同样令他钦佩："抑何速也？何一非取之于民间哉？然可见民之乐输好义以卫国家，而以千万人之心为一心，有可知矣！"[注]

在这些事例中，德国和法国人民支持政府的愿望最终是一种信任的表现。王韬对此十分清楚。他于1893年写道："夫天下之大患，莫患乎在下有不信其上之心。今试官出一示曰：'今国家兴大徭役，欲与民间贷债一千万，准以十年偿还，尔民具输将勿缓。'民间果有应之者乎？乃外

国银肆发出股票，民之趋者如骛……呜呼！民至不信上官，而信外洋。”注

既然人民对统治者缺乏信任，那就不能指望他们在危机时支持政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他们仍只是分散的个体，借孙中山爱用的比喻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国家。为何如此？在西方国家那么显著的共同利益观念和民族团结精神哪里去了？

与西方进行比较是新的课题。但这个问题以种种方式困扰王韬已经很久了。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英法联军远征中国骚扰广州期间，王韬就曾责备中国的总督、巡抚们表现出“其意视粤东一省之得失，无与朝廷之轻重，朝廷御戎之当否，无与于外省之休戚”。注数年之后，王韬又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提出了相同的问题。然而，这次他的解救方案是——有选择地恢复中国“分封”时代的政治传统。他似乎不能自圆其说地认为，“分封”制的内聚力在于它的权力分散。由于皇帝与全国的豪门巨族分享权力和领土以后，后者更明显地与朝廷的命运息息相关，故更易于与朝廷同舟共济（见第二章）。

当然，不能自圆其说只是其表面现象。在强调分权与利益一致的联系时，王韬事实上发现了在任何制度下使国家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更通俗地说，人民在一个制度中占有的利益越大，他们对制度的捍卫就越坚决。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浑然成为一体时，他们就会把政府面临的威胁当作自己遭受的威胁。

政府更多地分权与人民更多地参与是相对应的。这可分为许多方面，包括通过发展新闻事业和扩大教育机会，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如上一章所述，在经济领域则意味着取消对商业活动的限制，鼓励商人向未开发的领域冒险。政府也必须在诸如采矿、制造、铁路、造船等新兴事业中与人民共享其利。注

在军事方面，给王韬印象至深的是西方的“兵民不分”。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都是预备役士兵或民兵，因而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小国也能维持相当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和亲人而战，所以民兵的决心更大，士气更高。王韬主张在中国的每个城镇乡村都实行“全民皆兵”，然后就会有子弟保卫父兄的局面，而且，由于让民兵与正规军队一起训练，后者就不大会欺凌人民。注

在王韬看来，大众参与的最重要实践在于政治领域本身。当中国似乎即将与俄国开战的时候，他于1880年末在一封信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方面的强国措施：

> 夫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行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诚如西国之法，行之于天下，天下之民其孰不起而环卫我中国。
>
> 《弢园尺牍》，卷12，第25页

在别的地方，王韬特别提出西方国家实行的议会政治是使君民之情臻于一致的途径："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所以远涉重瀛，不啬本境，几忘君民之心，惟期国运之昌。"[注]

我们又看到了王韬思想中良政与国力间的密切关系。王韬十分羡慕议会政治，然而正如上引文字所示，这并不是由于他发现了这种政治形式包含着任何对民主或自由价值的深刻信奉。他认为，它的可赞之处在于这种政治促成了统治者与人民的紧密团结，而这是西方强盛的主要根源。这种逻辑是日本人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宪政主张时经常见到的。此后，它在中国也更加普遍，例如严复等人便强调在西方个人自由与国家强盛间的必然联系。

这是对西方政治传统崇高内容的完全误解吗？抑或是明显的无知阻碍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实际并非如此。史华慈认为，就严复而言，不同的认识角度、不同的问题背景促使他在西方思想中分辨出一种新的逻辑联系，而这种新的逻辑联系并非不能成立。[注]我认为王韬也同样如此。王韬对西学并不精通，但即使他精通西学，我想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最要紧的是，王韬和严复所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他们面对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论证个人自由，把它当作终极目的或充分发展个性的手段，而是如何最好地实现中国的强盛。个人与国家相对的西方式问题不宜于输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与西方的对立。

王韬与中国的早期民族主义

在本书中我考察了王韬思想的几个方面。照我看来，这些思想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早期表现。其中的一个方面在第三章及别处讨论过，这就是王韬放弃了旧式的“天下”观念（中国即世界），而接受了更具相对性的世界观念（中国是一个民族，是众多文明中的一员）。与此种世界观转变结伴而来的，则是强调民族竞争。这明显地反映在王韬以春秋战国比喻欧洲国家关系（见第四章）的做法以及他对经济领域所持的激烈竞争观点（见第七章）中。王韬强调民族竞争是直接出于国家富强的需要——这是王韬及19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普及的早期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富强的目标是相对的，衡量富强也只能是比较而言，所以竞争就成了参照系。王韬认为，达到富强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中国人民与统治者之间能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关系的标志首先是共利观念和认同感。

这在政治上就转变为一种民族观念。曾经令郭嵩焘感到惊诧的是——国人竟对鸦片进口明显地缺乏愤慨之情。[注]几十年以后，梁启超也说，看来中国人似乎对外国的侵略安之若素。[注]事实上，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20世纪的耻辱感似乎比在100年前遭受侵略时更为强烈。只有在民族观念形成之后，国家主权被侵犯才能唤起人们的耻辱感。

在这里，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王韬与同代人存在一些差异。王韬早年对西方的反感几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但这为时不长，当王韬接受西方教育后，他对西方的不满就很快变得更有识别力，而对国家之主权和控制的特定问题也更加敏感了。这种敏感经常表现在他对明显蔑视或侵犯中国主权所做出的反应中。王韬十分痛恨集中于澳门的不人道的苦力贸易。他提出了结束这种贸易的详细措施，极力主张总理衙门与葡萄牙谈判，收回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注]我们看到，王韬也坚决反对损害中国关税主权的条约限制。他是第一个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人，认为这种行为直接侵害了“国家之权”，只有在中国、日本、土耳其才能看见，而在欧洲是不存在的。[注]

归根到底，王韬认识到，如果中国当权者不采取新的思想方式，那么所有减少外国控制、恢复中国主权的建议都只是一纸空文。他在1880年写道：“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

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 16年后，他在为容闳有关中日战争的书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希望：现在惨败给小日本所激起的羞耻感，将唤醒中国进行根本变革。

王韬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激进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在把英帝国主义与更具恶劣特征的法帝国主义相比时，将英称之为仁慈的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像王韬那样，在1892年撰文赞扬哥伦布，表示中国对发现美洲400周年纪念的贡献。王韬的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只能如此。因为王韬形成民族主义的观点，不仅是对西方的反应，也是对其他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的反应。当时，刻骨铭心、强硬僵化地敌视西方是极端保守主义的特殊标志。极端保守主义者完全反对改革和现代化。只要极端保守主义仍有强大的势力，那么，任何一位主张现代化的人都绝对有必要把自己与他们的态度明确地区别开来。只有在像20世纪那样对变革的全面反对之情衰退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具有敌视西方的因素。

我曾提到，王韬的观点是早期或原始的民族主义。这里，说明一下我对这些词语的运用也许不无益处。不难把王韬的观点与19世纪下半期中国士大夫普遍表现出来的排外主义区别开来。排外主义产生于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它特有的表现方式是蔑视一切，在实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西方影响。与此强烈对照，王韬十分大度地承认——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不仅仅是枪炮、轮船）明显不如西方。这种体认给王韬的主要感受不是蔑视，而是羞愧。确实，正是这种根除耻辱的愿望，使王韬大力提倡有限的“西化”。王韬反对的不是西方的影响，而是受西方控制。他知道，在中国摆脱西方之前，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某些影响。

虽然中国的许多排外主义者以冷若冰霜的态度表达对西方的蔑视，但19世纪还有另一种憎恨西方的人，他们更好战。他们有着好斗的本性，一旦发生危机就准备诉诸武力。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表现在——几乎迷信地认为，能够靠唤起民众来克服原始落后武器的不足。史华慈恰当地把当时的这种思想称之为“刚健的儒教”。

王韬与这种排外主义的不同不仅是风格问题。虽然王韬坚决反对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但他对西方的强盛却十分崇敬。像郭嵩焘一样，当中国面临西方战争威胁时，他总是主张稳重节制，依靠外交手段解决。而且，虽然王韬确实看重人民的精神及其决定作用，把这种

品质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但这与军事排外主义者完全不同。那些人认为，只要民心稳定，中国根本无须什么现代化。

显然，王韬已超出了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但王韬是否已经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主义者呢？这很难说。如果成熟的民族主义需要自觉地抛弃整个“传统”，那么王韬无疑是不够格的。而且孙中山、蒋介石以及20世纪的许多人物都不能一般地被看作民族主义者。史华慈抛弃了这种十分僵化的教条，代之以基于相对优先原则的更合理的定义。他说：“如果赞同保存和推进作为民族象征的社会实体并把实现这种目的置于其他任何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如果对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取舍是根据它们与这个目的的关系而定，而不是相反，那么，明确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出现了。”[注]

王韬适合这种定义吗？差不多。人们认为，由于王韬在精神上的全部独立性，他的思路与冯桂芬、张之洞基本一致。就是说，像他们一样，他主张采纳西学，与其说是赞赏西学本身，不如说是相信此乃保存中国根本价值的需要。[注]王韬的部分言论确实符合这种假定，但更大量的言论却不是这样。总之，我们面临的麻烦问题是——王韬把何种中国价值看作至上的。如果这种价值实质上是儒学，那也许可以把王韬归为冯桂芬、张之洞一类。但如果王韬的主要意图是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如果富强成为他的终极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王韬的思想就极为接近史华慈所说的民族主义。

就我们的论题来说，史华慈定义的麻烦在于——它提到这一进程的终点，在这个终点上，一种新的信念被自觉地阐明，从而民族主义“明确地”出现了。显然，王韬尚未达到这一点。王韬从未正面回答孰先孰后的问题，当然也没有郑重表明：“我的旗帜是或不是儒学。”相反，王韬埋头于从事重新确定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当其他人坚持中国必须采取新方法维护旧信仰时，王韬不明显地也许是不自觉地暗示信仰本身应作改变，以保证中国的生存。王韬把孔子看作潜在的改革者，就是这种重新估价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他淡化了“道”的中国意义，深信“道”是各地文明人的共有特性。[注]不管人们如何估价这些变化的作用，毫无疑问，就儒学的客观命运而言，王韬在思想上已摆脱了强盛中国与儒学中国之间的冲突矛盾。相反，一个真正的儒学中国也应该是一个强盛的中国。在这种明了的主观意义上，王韬最大限度地接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太可能的混合型人物——一位儒家民族主义者。

1. 语义的模棱和重心转变当然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在19世纪的英国，查尔斯·金斯利对工业革命中的不公正现象十分恐惧。他引用《圣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训诫来为基督社会主义方案辩护。显而易见，一个着迷于适者生存理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可用这同一句话来反对任何国家福利。见克兰·布林顿，《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剑桥，马萨诸塞，1954年），第124页。

2. 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旧秩序的崩溃与西方的冲击》，见何炳棣、邹谠编，《中国的危机》（芝加哥，1968年），第1册，第114—115页。

3.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9—21页；又见《皇朝经世文三编》（一），第464—466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7—18页，卷3，第10页；《弢园尺牍》，卷8，第13页。

4.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1—12页。

5.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7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6页，卷4，第5页。

6. 狄百瑞：《中国传统之源》，第591—592页。

7.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9页；又见《弢园尺牍》，卷7，第5—6页。

8. 《弢园尺牍》，卷8，第13页。

9. 同上，卷8，第13页。

10.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支点》，第94页。

11.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2页。在《拟上当事书》中（约1884年末），王韬的家长主义倾向表述得更确切：“一邑如一家，令之于民，如父母之于子，推而之于府道督抚，无不皆然，而民安有不可用哉？”《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7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4页。

12. 王维诚书，第46页。

13. 《19世纪的中国》，第177页。

14. 《19世纪的中国》，第123—124、177页。

15. 据记载，宰相之职是1380年被明代第一位皇帝废除的。当时，明太祖警告子孙永远不要恢复这个官职，并规定提倡恢复者一律处死刑。明代从未恢复该职，清代也随明制。既然宰相通常是权力集中点（因而抵消君主的权力），所以废除宰相常常被看作帝制时代最后500年中国政治专制性加强的一种标志。见霍克，《明代的传统中国，1368—1644》（图森，1961年），第53页。

16. 《弢园文录外编》，卷2，第17页。

17.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6页，卷2，第17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6页。

18. 《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6页。

19. 《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1页。

20. 同上，卷1，第22页。

21. 《弢园尺牍续钞》，卷2，第7页。大约在1860年，冯桂芬提出了类似从下“荐举”的制度，这也很可能是受西方选举程序的影响。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1年2月）。

22.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3页。

23. 《法国志略》，卷24，第19—20页。

24. 《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18页，卷8，第2—3页；《甕牖余谈》，卷4，第2页；《法国志略》，第二序言，第2—3页。

25.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24—25页。

26. 见本书第四章第96页注释38。

27. 尽管王韬很尊重英国，但仍然对它在亚洲的长远野心存有疑虑。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6页，卷5，第6—7页；《弢园尺牍》，卷11，第20—22页。

28. 《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16—18页。这里的某些摘引根据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的译文，参见该书第140页。王韬对英国政治的高度评价的更多例子，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3页；卷3，第10—12页；卷10，第21页。

29. 例如，《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25页，卷11，第13页；《弢园尺牍》，卷10，第11页。

30. 《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第4—5页，《论宜得人以理财》，第7页；《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8页。

31. 这里提到王韬军事改革主张的许多要点，但在我看来，王韬并未分开论述。除太平天国时期的主张和正文中论及的《普法战纪》《火器略说》等著作外，有兴趣的读者还可查阅下列资料：《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3页，卷2，第4、5—8、13、18页，卷3，第12—14、16—17、22页，卷6，第5、11、7—9页；《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才论》，第41页；《甕牖余谈》，卷3，第2—3页，卷4，第11—12页；《法国志略》，卷17，第16—27页；《救时刍议》（下），第14—15页；《阅德国什好船厂章程书后》，载《万国公报》（1893年4月），第51期，第3—4页；《论巡阅炮台》，载《万国公报》（1893年9月），第56期，第10—11页；《弢园尺牍》，卷7，第8—9页，卷8，第14—15页，卷9，第13—15页，卷10，第14—15页，卷11，第9—10页，卷12，第16—17页；《弢园尺牍续钞》，卷3，第2—5、9—12页，卷4，第16页，卷5，第11—12、13—14页。

32. 关于“治民”重于“治兵”，见《法国志略》第二序言，第2—3页；《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5页，卷7，第3页；《弢园尺牍》，卷10，第12、14页，卷11，第17页。

33. 他写道：“有观于普法之战者，当知其所依赖不只在武器。普鲁士能战胜法国乃在于它能融南北德国于一体。”见《普法战纪》，卷6，第15—16页；又见《普法战纪》，卷1，第24—25页，卷3，第18页，卷15，第13。14页。

34. 《普法战纪》，卷2，第9—12页。

35. 《法国志略》，卷16，第13页。

36. 《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第5页。关于这一点，何启注意到举借外债的危险，抱怨（1887年）中国借内债的困难在于人们对政府缺乏信任。见史扶邻书，第26页。

37. 《致徐有壬信》（1859年），见《弢园尺牍》，卷4，第13—14页。

38. 例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9、20—21页，卷3，第22页。

39. 《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8—19页。

40.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7页。

41. 见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十二章。

4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1961年），第5册，第684—685页。

43. 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1页。

44.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25—27页，卷10，第27—29页。

45. 《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7—29页；《弢园尺牍》，卷8，第12页。

46. 《易言》跋，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2册，第1297页。又见《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3—14页。

47. 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第4页。也见《万国公报》，第89期，第5—7页。唤醒国耻也是《自强斋保富兴国论初编》的经常论题，这是王韬逝世前夕编辑的一本文集，收录了汪康年、梁启超、陈虬、陈炽等人撰写的有关改革的论文。其中许多文章最先发表在《时务报》上。

48. 参见《哥伦布传赞》。

49. 这可与列文森的阐述相对照：“文化主义阻挡了外来观念，但它却可能积极接收或不积极对抗外国物质力量。民族主义则颠倒了这些关系，它能容忍外来观念，但它将激烈地反对外国的物质侵略。”见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10页。

50.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5页。

51. 《弢园尺牍》，卷12，第3—4、15—16页和“书后”；《弢园尺牍续钞》，卷2，第16—17页，卷4，第2—3页；《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21—23页，卷10，第11—13页，卷12，第12—13页。关于郭嵩焘，见恒慕义书，第1册，第438页。

52.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9页。

53.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37页。这样刻画冯桂芬是否恰当是另外的问题。见本书下面的第九章。

54. 见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三部分引言。

第四篇
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

序曲

决定研究王韬这类人的生平和思想，是需要讲明理由的。有些人可能认为生平——任何生平——都因其发生过而具有意义。人的生存证明自身的意义。我想，在严格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中确乎如此。但像本书这样主要关注一国的历史时，光这样还不够。我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如果不是王韬具有比自身更大的启发意义，则他的一生对我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人生获得较大意义的途径之一就是影响别人。这里的差异当然是很大的，范围从仅仅影响某一件事的人，直至像耶稣或毛泽东那种（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对于后者，我们应当特别留神。因为这里涉及的麻烦也是最终难以解决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确定假如“伟人”并未存在的话，历史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出现，近代中国历史会改变进程。但我们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确定历史进程会有哪些不同。

另一种困难产生于个人在历史上影响的增长。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完全有理由认定：在一定自然环境的限制下（生物上的、地理上的等等），历史恰恰是个人影响的总和。社会阶级无关紧要，政治党派不能做出决定，制度不起作用。只有那些组成此类较大集团的个人才是历史事件的最终制造者。然而，个人的作用并非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人们注意到了，它也是细微得无法“追踪”。历史发生了变革，我们知道影响业已产生，但我们不能追寻这个过程。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现个人影响他人、个人生活总和转化成集体历史经历的过程。面对这种困难，许多历史学家发现——在洞悉集体经历的努力中去研究个人生涯仍属有益之举。这些个人不一定要有巨大影响。确实，不管个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可能都是很难觉察的。真正唯一的要求是——个人经历所集中的问题或体现的类型也以某些方式在其他人那里表现出来。这样，即使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他作为历史经历者的价值也可能是巨大的。

王韬正是这种例子。人们认为王韬可能对孙中山、康有为、郑观

应、伍廷芳等人的思想产生过影响。然而，我没有尽力追寻这种影响，因为我相信如果（像科学实验一样）能把王韬从中国近代史上拿开，那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换句话说，王韬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巨大历史画面。王韬的重要性在于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画面，说明这幅图画是怎样构成的。

基于此，本书前三部分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传记性的。也就是说，我试图通过详细考察王韬的一生和思想来阐明19世纪许多中国人（尽管各自都有着自己的方式）经历的转变过程。而在第四部分，我想采用某些不同的方法，即越来越为历史学家们所共知的传记特写集或集体传记的方法。[注]刚才提到过王韬的所有个人特征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中国还有其他人在许多重要方面同他一样。如果把这些人物作为一组来研究，我们便可以确定其共同特征；同时，在王韬的个人经历中也许仅以朦胧形式被发现的洞见，就可以被置于更牢固的基础之上。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曾研究的巨大课题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这种差异最迟也可追溯到16世纪。（这是我用“沿海”一词，而不用“通商口岸”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香港虽成为沿海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却不是“通商口岸”。）

自1842年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显著了。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成为内陆变革的重要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

在探究这些个人的意义和他们与内地文化之代表人物的相互影响时，我发现以分析文化变革的总体结构为出发点是十分有益的。一般说来，全面的文化变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出现一些先驱者。他们以自己的言论和活动把一度完全陌生的东西变得不太陌生，使人们逐渐对新的东西习以为常，不那么触目惊心，而更赏心悦目。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变革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不久前还只是被文化移入的接触地带所接受的变革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一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正统主义者，虽然转而适应由来已久的变革需要，却始终坚持这些变革

应冠以某种固有的合法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个阶段表现为沿海不断冲击内地，而每次冲击之后内地都试图通过中国化来使冲击合法化。第一次冲击是太平天国起义。然而，在中国化过程中[注]，太平天国失去了原来的创新精神。他们开始看上去不像基督教革命，倒更像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第二次冲击就不一样了，它来自早期改革者（指那些在1890年前活动或开始成名的改革者或具有改革思想的新派人物）。对这次冲击进行合法化的人物最初是寻求自强的官僚，后来是19世纪90年代的内地改革者。这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达到了高峰。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在证之以内地（儒学）语言同时保持沿海改革的原动力方面获得了成功。康有为的失败之处在于实施方面。来自沿海的最后冲击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而只有毛泽东，在合法化阶段，同时在思想和实施上都成功地取得了统治地位。

如此阐述这种不断的冲击和合法化的过程确实过于简略，并很可能会误入歧途。例如，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早期改革者、革命者都是沿海的产物，或者内地只可能是合法化的源泉。我也无意传达这样的观念——革新和合法化是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或者康有为、毛泽东只是使变革合法化的人物而不是重要的革新者。[注]

人们可以考虑无数限制条件，然而其主要论点仍然是成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巨大的彼此独立、性格独特的文化环境并肩发展着。虽然具有高度的自足性，但这两种环境在全局上却互相影响，且各自都在当时发挥了必要作用。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沿海承担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责任，内地则使变革合法化。而且只要两者的功能不可互相取代（或者至少不好完全取代），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共生关系就是持续的。一旦内地除了使变革合法化之外，也成为创新的主要中心，沿海的作用就衰退了。20世纪下半期的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也永远是地理和经济上的“沿海”，但在文化上它们却成了中国的新内地。

---

1. 该书的最后这部分实际上只是尝试探索性的，仅仅是一个开端。我希望将来把这个打算发展得更完备些。这种方法的定义及其利弊的讨论，见劳伦斯·斯通，《传记特写集》，载《代达罗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刊》（1971年冬），第46—79页。虽然“传记特写集”一词的常意是指很多人的传记和运用大量的调查方法，但理论上没有理由不可以引申为（如这里）研究较小的一群人物。

2. 有关太平天国中国化的论述，见苏均炜和尤金·博德曼的文章，第292—294页。

3. 这里整个激进主义的问题是令人迷惑的。谁更激进？康有为或容闳？毛泽东或孙中

山？我断然选择了康有为和毛泽东。这并不在于他们较之容闳、孙中山是“新人”（见我在第一部分引言中关于“新”的含义讨论），而是因为他们成了试图把变革与传统结合起来的重要先驱。（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手法是鉴定和重新解释传统，虽然在传统中中国人肯定有强烈的异端因素。）这或许可以归纳为：在近代中国人们变得越具有文化适应性，产生激进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文化适应使人更新，同时也使人离本国背景更为遥远。

第九章 早期改革者与沿海

作为文化类型的沿海和内地，代表了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如果要确定中国近代革命的三位领导人物在这种统一体中的位置，那么，毛泽东居于内地一端，孙中山居于沿海一边，而蒋介石大约居于两者之间。毛泽东和孙中山是相当接近于他们各自类型的典型代表，蒋介石则是一位混合的、同时带有内地和沿海特征的人物。

早期改革者作为某种群体，其重心完全倾向于统一体的沿海一端，但他们也可再分为可比较的亚型。[注]我们发现，属于最沿海的人物有容闳、何启、唐景星和伍廷芳。前两位完全与内地隔绝开来，后两位则大体如此。接下来的一组改革者虽与沿海联系极强，但他们又具有牢固的中国学术、文化基础。属于这一类的人物有王韬、郑观应、马建忠和马良。最后，还有少数早期改革者，他们直接与沿海或西方（或经由日本而间接地与西方）有重要联系，但他们基本上是中国内地的产物。冯桂芬、薛福成、黄遵宪和郭嵩焘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虽然在上述12位之外还有其他早期改革者，但人们也许会同意——无论是增加或减少一两个名字，这里都包括了大多数重要的早期改革者。在这最后一章，我将以他们的经历为素材，试图解释改良主义思想受沿海制约的特定道路，而且，在某种更普遍的意义上，19世纪中国的沿海充当了变革力量的角色。为了分析的需要，这些早期改革者将分为两组：其主要活动（至少在成年时期）属于沿海的（前8位）和主要与内地联系的（后4位）。

沿海的早期改革者

容闳（**1828—1912**）

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少年时期完全接受教会教育。最早就读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开办的学校。后来（1841—1847）在澳门和香港入马礼逊教育会的学校。马礼逊学堂的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塞缪尔·R. 勃朗[注]，1847年勃朗回美国时，带容闳和另外两名学生同行。[注]容闳在

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学校学习几年之后入耶鲁大学。1854年，他获得耶鲁大学的学位，成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同年，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容闳回到了中国。其后的十几年中，他在广州、香港和上海从事各种工作（为伯驾当秘书、当翻译和茶商）。1864年他再度赴美，奉曾国藩之命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作为对他工作的奖赏，容闳在1867年被授四品官衔。

容闳的最著名活动是他发起和推进中国幼童留美的计划。在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的支持下，这一计划从1872年开始实行，容闳是该计划的帮办专员。到这项开拓性的教育事业停止时（1881），有100多名中国学生在各种技术领域接受了实际训练。这项计划被废止，部分是由于保守主义者担心中国学生过分美国化，部分是由于中国官场的明争暗斗。

容闳在美国监督留学事务时，被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的“副使”，并于1878年参加了中国最早驻美大使馆的建立。他曾经（可能在马礼逊学堂时）皈依基督教，1875年与一位美国女子结婚。80年代初在中国短暂居留后，他在哈特福特定居下来。但1895年他应张之洞之邀，再次回到祖国。其后的几年中，他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并且参加了几项新的现代化计划。不过这些都没有结果。1902年，容闳又回到了美国。



何启（1859—1914）

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其父何福堂（何清山）是一位商人，曾任伦敦会香港分会的传教士。何启在香港中央书院完成了预备教育后，赴英国深造，入阿伯丁大学、圣·托马斯医学院和林肯法律学院学习。他在获得法律和医学学位后，于1882年带着一位英国妻子（雅丽·沃克登）回到香港，开始长期并杰出地充当律师、议员、教员、慈善家和改革者生涯。

何启最重要的慈善事业是创设雅丽氏医院，免费为中国病人治疗。这所医院以他的亡妻命名，据资料记载，其主要资金是他妻子留下的遗产。何启自己约定，医院由伦敦会管理和控制。何启也在香港为创设中国人的西医书院出过力。西医书院附属于雅丽氏医院，并成为香港大学的核心。何启在西医书院教授生理学和法医学。在这里，他招收了一位更有希望成为未来革命家的学生——孙中山。

作为英国殖民地上最著名的中国公民，何启担任过三届香港立法局的议员（1890—1914），参加了其他许多社会活动。作为对其工作的承认，他从英国政府得到了被命名为圣·米迦勒和圣·乔治会之友的殊荣，并于1912年被授为爵士。

在巨大的中国舞台上，何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生涯是从1887年批评自强运动开始的。一位学者认为，这是明显的“标志改革运动转折点的象征”。[注]何启有关改革的论文都是与胡礼垣合作撰写的。[注]他们主要论证了发展中国商业的重要性以及根本性政治变革的需要（包括采用某种形式的议会制度）。[注]

唐景星（唐廷枢，**1832—1892**）

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像他的终生朋友容闳一样，早年就读于基督教环境下的马礼逊教育会学堂。在该校学习了6年之后（1842—1848），入香港的另一所教会学校学习。他在50年代的早、中期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而后成为香港政府的一名翻译。1858年他开始在上海海关任翻译和职员。他也挤时间出版了（1862）一本汉英用语书，以便利广东商人与外国人的交易活动。从1863年至1873年，唐景星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任此职期间，他自己进行了许多投资活动。1872年，他被推选为怡和华海轮船公司的董事。

唐景星关于航运业的娴熟知识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不久，中国轮船招商局建立后，李鸿章聘他为招商局总办（1873—1884）。唐景星也是开平矿务局的主要组织者。从1877年到1892年去世，他一直是开平矿务局的督办。1874年，唐景星和容闳创办了《汇报》，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报刊之一。这样，他主持了许多中国早期的现代企业。1883年的欧洲之行增长了他的西方知识。他的能力、正直以及主张中国循西方路线现代化的决心，在当时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赞扬。[注]

伍廷芳（**1842—1922**）

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省新会县。在伍廷芳只有3岁的时候，经商的父亲便把全家迁回中国。他在广州郊外长大，早年完全受中国传统教育。他发现这种课程令人失望，便开始到附近的一所英国教堂学习英语。6个月后（13岁时），他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虽然圣保罗书院是教会建立的一所神学院，但其课程已基本世俗化了。伍廷芳在该校学习

了4年，得以专修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

从1859年毕业到1874年，他在香港警察局当翻译。1860年他帮助创办第一份中文日报《中外新报》。不久以后，他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70年代初，伍廷芳至少参加创办了另外两种中文报刊，其中包括我们已知的王韬的《循环日报》。

1874年，伍廷芳去伦敦学习法律。3年以后，他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律师。他回到香港，开始了不久便获得巨大成功的律师生涯。香港殖民政府任命伍廷芳为法官，1880年又兼任立法局议员。两者在香港都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

1882年，伍廷芳离开香港，成为李鸿章的幕僚，这是他一生的巨大转折点。在李鸿章手下工作的14年中，他在推动总督的重要政治改革方面收效甚微。他对李鸿章工作的主要贡献在法律、外交和铁路经营方面。他帮助谈判结束中法、中日战争。188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铁路公司督办，主持天津至塘沽间的铁路建设。铁路竣工时，他成为该路的经理。

伍廷芳社会生涯的自主阶段是从1897年开始的。他先后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奉召回国，成为法律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是，当清廷拒绝彻底变革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时，他辞去了刑部右侍郎的职务。虽然他再次担任了驻华盛顿公使（1907—1909），但在任期结束时，他对清朝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武昌起义使他坚定地站到了革命阵营。在民国头10年中，伍廷芳是孙中山的亲密追随者，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作为一位改革者，伍廷芳始终是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提倡者。他也是讲究养生之道的名人，写有一本名为“延寿新法”的书。在晚年，他以接受了洗礼的基督徒而闻名于西方。有理由相信他年轻时就进过教堂。但有关资料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能肯定伍廷芳与基督教关系密切。他的妻子是何启的姐姐，毕生虔诚地信仰基督教。

郑观应（1842—1922）

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出身于小康之家，其父亲是乡塾教师。他早年受的教育只是为了应试科举。17岁时，他应乡试不第，遂去上海经商。

在上海，他先从一位叔父、后随傅兰雅修习英文。在1860年后的许多年，郑观应为英商两大公司——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的买办。他1878—1879年为山西筹款赈灾的活动，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李鸿章请他开办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李鸿章又要他担任轮船招商局上海方面的帮办。两年以后郑观应离开该局，但1892年又回来复职，并于1907年被推举为上海招商局会办。这些年中，郑观应也办理过其他一些官督商办企业，包括国家电报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广东段。像唐景星一样，郑观应也捐了官，最后成为道台。

郑观应比大部分买办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好的知识素养。他贪婪地阅读有关改革的教会作品，因而渗透在其论著中的人道主义情感很可能具有宗教根源。郑观应强调制度变革和发展商业的改革言论，最初以“易言”为题出版（可能在1880年）。内容更丰富也更著名的《盛世危言》，则大约首版于1893年。该书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极大关注，遂诏令印刷该书分发给臣下阅读。注

马建忠（**1845—1900**）

江苏省丹徒县人。他生于一个博学的天主教家庭，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宋代学者马端临，其宗教传统则可追溯到利玛窦时代。虽然他的正式学业是在上海徐汇公学完成的（在那里他最先掌握了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但他也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1877年李鸿章得知马建忠的才能，便派他和一批学习造船的学生同去法国。1878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学士学位的中国人。次年又获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回到中国后，在80年代初期，马建忠迅速成为李鸿章幕僚中的主要外事专家之一。他执行着各种各样的任务，以至于高第（Cordier）称他为“一个真正的杂役”。1881年至1882年，马建忠为李鸿章到印度和朝鲜去完成外交使命。1884年到1891年，他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95年，他随李鸿章去日本马关订约。次年，随李鸿章游历各国。马建忠晚年潜心整理他的有影响的语法研究著作《马氏文通》（1904）。该书被现代语言学家称为“西方语义上的第一本中文语法书”。注

马良（马相伯，**1840—1939**）

马建忠之兄，比马建忠更具宗教色彩。完成神学学习和试用期后，他于1870年成为耶稣会的教士。但6年后，由于与上司发生矛盾，他又

回到了世俗生活。70年代他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在那里像年轻人一样学习。这里，他也对西方科学、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翻译了一些著作。

离开教士职位后，马良开始了他多种经历的第二个时期——为著名官员当技术、经济和外交事务顾问。在70年代后期，他曾一度任山东一家机器厂的督办。应李鸿章之请，他也调查了该省的开矿事宜。1882年，他以中国公使参赞的身份在东京会见了伊藤博文，并开始研究日本。但不久，李鸿章派他帮助朝鲜政府改革行政和军事。在其弟任职轮船招商局以后，他又在该局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从事审计工作。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请，他后来到了台湾。1886年他提出了一个利用外资帮助开发该岛的计划。回到大陆后，李鸿章又派他去美国协商贷款问题。但是，清政府阻止了贷款和开发台湾的计划。

从1887年回国到1896年，马良主要关注科学研究。这期间他担任过的唯一重要官职，只有1892年中国驻日本长崎领事。1896年，他开始与梁启超交往。梁氏的声名日著部分地归因于马氏兄弟。世纪之交过后不久，马良帮助建立了震旦学院（后来改为震旦大学），并与严复合办复旦公学。他一度担任两校校长。马良在中国教育、政治、宗教方面的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注

共同的经历类型和世界观念

胡适曾经这样评价王韬：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至少也是西乡隆盛注。这种评论有双重含义——既赞扬王韬，又抨击社会。不过，这种评论却不能用来恰当地刻画沿海改革者的一般特征和他们在19世纪中国的处境。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才能，但在中国的背景下，他们之中却无人得以把能力转变为权力和影响。恰恰相反，似乎他们越接近权力，他们作为改革者就越受限制。在晚清时期，权力和革新如同水火不相容。注

虽然上述改革人物的背景、经历和观点各不相同，但在更大的方面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也许最突出的是——他们每人都愿意大胆创新、大胆开拓、打破陈规办事。他们中有一半人获得了外国大学的学

位，其余4位中除郑观应外，都在1890年前长期考察过西方。除了王韬这个特例外，他们都能说一种欧洲语言。至少有6人（何启、容闳、伍廷芳、唐景星和马氏兄弟）能流利地阅读一种以上的西方语言。注而且，沿海改革者在不同时期所从事的职业，如新闻、法律、牧师、现代企业、驻外使节等等，大多是鸦片战争前闻所未闻的。确实，几乎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人的经历类型，更使人回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而不是19世纪的中国。

沿海改革者的一种特点是他们的多重职业倾向。这与20世纪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表现出的职业专门化倾向相反。由于在19世纪的中国，大多数新的工作中，某种类型的人才严重短缺，所以，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必须比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充任更多的角色。这种倾向在没有承认创新的积极价值的社会中尤其突出。在这种社会中，现代专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状态（与看法有关），而较少地表现为专门培训的结果。并且，只要具有“现代精神”，就常常足以使人胜任全部现代化的工作。

在19世纪具有“现代精神”（在我使用的意义上），就意味着认识到中国所面临局势的空前特点，并接受根本变革（现代化）的观念，且将此看作中国有效应付这种局势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具有现代精神。他们孜孜不倦地推动发展西方技术。马良、容闳、郑观应和王韬是现代科学教育的提倡者；伍廷芳和何启以提倡法律改革而闻名；郑观应、何启、王韬和伍廷芳表现了对代议制政治制度的初步热情。实际上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积极参与了创办中国近代报刊。注

根本变革的观念中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看法。沿海改革者的世界观念中不存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陈旧傲慢观念。相反，它是基于诚挚地尊崇西方文明和根本变革中华文明的崭新愿望。这种新的世界观念的两个最独特的表现是——热情赞赏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并在政治方面逐渐接受民族主义的观点。由于这种世界观念的两个中心点是贸易和民族主义，因而它看起来就像是对当时西方世界观念的直接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它无疑是这样的。但就根本的方面来说，它又不是这样。从这种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刚刚出现的时候起，它就暗含着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无声）向西方复仇的不满和义愤之情。

正如前章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看法是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对

外贸易尤其被看作无关紧要的，因为官方观念是中国无所不有。这种观念在鸦片战争以前也许不无根据。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西方海上的经济侵入开始向中国旧的需求观念挑战，而一种主要由国力因素构成的新观念开始出现。沿海的改革者处于这种观念发展的最前列。确实，他们很明显地与这种新观念认同，以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认为郑观应、马建忠、何启、容闳以及王韬表达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注]

在王韬那里，我已经考察了下述假设命题——主张发展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的人，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的阶级利益驱使他们这么做。其实，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认为商业利益就是民族利益。他们认为增加中国财富的最可靠的途径相对于西方来说，就是胜过西方的商业。为此，王韬、何启、郑观应特别主张中国政府应更加保护和鼓励商业，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海外贸易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并健全其辅助业务。[注]

意味深长的是，最早的有关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更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较少地考虑人民的福利（虽然后者也有一定位置，尤其是在郑观应的主张中）。就19世纪70—80年代的改革者来说，求富与求强的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在那些谈论中外经济竞争的人们当中，也十分倾向于考虑在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竞争。由此观之，毫不奇怪——沿海改革者乃属于近代中国人向民族主义转变的第一代。

有时这也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上。人们看到，唐景星为与外国人竞争而经营近代企业[注]；容闳调查和严厉控诉中国苦力在秘鲁的恶劣处境（1873年）[注]；郑观应后来在1905年抵制美货、抗议美国移民政策中的歧视内容的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注]；1899年伍廷芳谈判签订《中国墨西哥通商条约》，中国第一次获得了最惠国待遇[注]；年轻的马良拒绝担任法国领事馆的职务，宣布他的法语知识将用于为祖国服务。[注]

沿海改革者的早期民族主义也表现在他们的言论中，其中某些主题是经常出现的。其一是他们表现了敏锐的耻辱感。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很久，这种情绪就十分流行。[注]另外是对富强极为关注。还有一个主题在郑观应、王韬、何启的文章中表现最为明显，这就是他们认为，国家

强盛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信任关系。三人都认为，这种关系在西方受到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推动。[注]

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给这些现象冠以某种称号。第一个这么做的中国改革者是郑观应。他在1892年之前写到：中国贫弱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其社会习惯不同，中国是家族主义，而西方是民族主义。[注]顺便指出，郑观应的这番话也包含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巨大障碍：人们忠于和依附的中心是最接近、最实在的制度，如家庭、宗族、村庄，而不是遥远的、抽象的国家。

香港—上海走廊

沿海改革者的经历类型和世界观念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显然不同。如何解释这种区别？除开下文要提到的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之外，改革者们的经历表现了许多共同特征。最明显的也许是他们的出生地点、求学和工作的地理位置。他们8人都生于19世纪中国受到西方影响的两个主要地区——穗港澳地区和上海地区附近，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注]而且，他们的经历中来往于这两个地区的频率特别高，故可以把它形容为香港—上海走廊。关于王韬，我们知道他于50年代在上海工作，1862年至1884年的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度过，然后又回到上海。反过来，郑观应、唐景星和容闳虽然生于穗港澳地区，并且在那里部分地完成了教育，但他们的主要生涯却是在上海度过的。

当然，关键不在于迁移本身（到国外甚至是更常见的现象），而在于香港和上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某种高度凝聚性、自容性的沿海环境的可交替部分。归根到底，这两个地区的共同文化和制度特征使得这种往来活动十分自然。

沿海改革者的大部分生涯在这两个地区度过，产生了多种效果。最明显的——并被他们的海外阅历所加强的——简单事实是，他们深入细致地天天接触西方人、西方制度、西方行为方式，受到西方的文化和物质影响。这种接触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以不同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对大量新的可能性敞开大门。上海和香港为现代化过程的进行提供了缩影。

然而，作为一种城市环境，这两个城市既非纯粹的现代化也非完全

的西化。最好把两者看作思想文化的前线和不同文化间冲突的前哨。在那里，狭隘的（传统的）信仰容易受到不断的挑战。罗兹·墨菲对上海的刻画也适用于香港：“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国的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注]上海和香港提供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环境，在这里，内地那种阻碍革新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起作用了。

生活在上海和香港也与沿海改革者的某些特有观点直接相关，他们看重与西方商业竞争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看法不仅来自他们本身的经济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国威胁的直接估计。例如，王韬1875年写信给丁日昌，认为英国完全赞成中国采取自强政策，因为这样可减少俄国的威胁、增进该地区贸易活动所必需的稳定。他说：“彼所患者，不在我之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前时制造局设于上海，船政局设于福州……而彼绝无所猜忌。独至招商局一设，而群议蜂起，然此不过商力之滥觞耳，而已鳃鳃然顾虑之。”[注]

香港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证实了王韬的看法。尽管英国和非华裔商人曾经控制了该殖民地的商业，但到1881年，2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7家已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华人商业利益的稳定增长常常是以牺牲殖民地的西方人利益来实现的。英国商人已经对在中国市场的意外困窘而灰心丧气了，他们开始感到中国竞争者的威胁。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恐慌，以至于香港传遍了“中国人接管”的谣言。[注]

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地气氛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羞耻感和自卑感。这种情感对形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表现在相当明显的两个方面。首先，因为与敌人合作而存在一种个人羞耻感。毕竟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在某个时期与外国机构（教会、商业公司、政府机构、教会学校）有过联系。这样，由于他们与那些直接受益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所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益者——法语中称之为“合作分子”。[注]以中国内地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合作是彻底的“背叛”行为，凡这么做的人都叫“汉奸”。既然很少有人思想解放到完全不受内地行为准则的影响，那么，与外国合作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羞耻感。恢复尊严和自重的民族主义为这种感

情烦扰提供了完整的解救办法。

殖民地（香港）、半殖民地（上海）的社会羞耻感也是直接由殖民者的态度而引起的。如果说殖民社会一方面是非道德化，那么另一方面又是过分道德化。林达·欣（Linda Shin）令人信服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社会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和虚伪本性常常以加倍强烈的形态表现在殖民地社会中。这样，香港的英国居民们就把对社会地位的执着追求弄成了极端的势利行为，并建立了刻板的社会屏障，几乎把中国人完全排斥在社会政治机构之外。排斥无疑只是一种温和形式的歧视。容闳、王韬和郑观应更列举了当时上海普遍存在的比较露骨的社会歧视。[注]（另一种不属于殖民地的歧视是在通过排华法案以后取消了容闳的美国国籍。[注]）这样，过分道德化和非道德化无间地混于一体。而且，在上海和香港，西方人总爱夸耀西方的文明和强盛，贬低中国文化传统。这种侮辱不断加重了民族歧视的伤害。个人和国家的羞耻感融为一体，而个人自尊的伤害感、不安感、自卑感便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注]

内地入口：李鸿章和沿海改革者

虽然在20世纪内地与沿海的文化差异不太显著，但在19世纪这种差异却是巨大的。实际上，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真正的沿海人物孙中山才从沿海的出发点成功地消弭了这种差异。在此之前，如果有这种弥合趋势的话，也只是由内地文化来进行，其结果往往是沿海的许多革新潜力被破坏了。概括地说，这是沿海改革者面临的困境。如果他们要在沿海范围之外产生影响，就必须获得通向内地权力结构的入口。但是，既然这种权力结构中充满了大量的传统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那么，他们进入这种结构时就冒着不是取消也是冲淡改革形象的危险。

对19世纪密切认同于沿海的人来说，他们进入内地权力结构的主要门径是那些在洋务活动中负有广泛责任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丁日昌、张之洞、刘坤一，尤其是李鸿章。这都是中国官僚中相对开明的人物。他们一般克服了个人偏见和内地顾忌，愿意与沿海受外国文化影响的人交往，甚至请这些人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职。他们非常需要外交人才。而在19世纪，沿海几乎是这种宝贵人才的唯一来源。[注]对沿海的

人才来说，他们为这些官僚效劳，获得了内地声望和地位，但代价高昂地付出了他们的自由。作为中国官僚阶层的成员，他们为了保住官职而循规蹈矩。他们进行全面改革的努力失败以后，最大的希望就是充当有限的和“防卫性的”[注]现代化的工具。

大多数早期沿海改革者的活动时期，基本上与李鸿章掌管中国外交和现代化事业的1/4世纪（约1870—1895年）大致吻合。不过，李鸿章成为其主要内地门径的结果仍很特别。其中5位——伍廷芳、郑观应、唐景星、马良和马建忠——都或长或短地成了李鸿章的私人随从。第6位容闳经过李鸿章的直接批准完成了许多特殊使命。第7位王韬显然是谢绝了参加李鸿章幕府的邀请。[注]最后一位是最年轻的何启，他在李鸿章的心腹人物盛宣怀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注]

沿海改革者选择置身官场时遇到的挫折是显而易见的。容闳到美国完成教育使命时遇到的问题已经提到。根据最近研究，在伍廷芳为李鸿章工作的14年中，他被迫放弃或修改所期望的许多重要改革。他苦恼得好几次打算辞职。[注]马良确实辞职了，数年后，他披露了在李鸿章手下任职时发生的一件事。1885年他途经香港时，发现自从英国建立该殖民地以来，英国商业的巨大发展已经损害了广东商人和非英籍外商的利益。他想到可以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把香港对面的九龙变成一个主要贸易港口，以铁路与广州相连。因为马良不认识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所以请张之洞的一位同乡转交这个建议。张之洞读了马良的来信，热情地赞扬了一番，但没有任何行动。马良回到天津后，把计划提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他不愿自己来倡议，坚持必须由张之洞带头提出。“这样”，马良得出结论，“我的计划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注]

王韬和何启或许更有远见，或许更少耐心。王韬多年来自由地与李鸿章的幕僚通信，无疑希望以这种迂回的方式影响李鸿章[注]。但他从未接受官职。何启在伍廷芳的多次劝说下，于1896年同意参加了盛宣怀的幕府。但是，他对官场生活的腐败无能极感厌恶，因而没过几个星期就离开了新的职位，赶紧回到香港。他比从前更加相信：清朝官僚政治中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注]。

李鸿章碰巧成为19世纪70—90年代初沿海向内地发展的主要门径，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灾难吗？或者主要是制度上的毛病？我认为很难说不

是制度上的问题。我想李鸿章本人并非不想接受根本改革[注]。但是，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也不可能推动这种改革，而仍在积蓄他拥有的权力。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使他能达到中国官僚政治的权力顶峰，但当他掌握这种制度时，也就成了这种制度的奴隶。据说唐景星曾评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道：总督掌舵我推船[注]。这里唯一应该补充的是，当不威胁到李鸿章的政治地位时，他最远能被推到何处。李鸿章自己最清楚这个限度。

沿海的改革者、起义者和革命者

沿海改革者虽然在内地举步维艰，但算不上寸步难移。对他们来说，内地很像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他们能够随意出入，思想上也有类似的自由信奉改革。如果现代化经由其他途径如农民起义或革命看来更有希望，改革就可能会相对容易地被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沿海的共同经历就比信奉不同的变革道路重要得多。

沿海的共同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督教。在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是部分的起源于沿海、称得上现代化力量的唯一起义运动，它与基督教的联系已经受到广泛注意。[注]但是，基督教对于早期改革者的影响则完全被忽视了。确实，就整个19世纪来说，不能否认绝大多数改革者既不是基督徒也未受基督教的激励（虽然不少人深受教会世俗作品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注意中国改良主义的早期阶段，就会发现许多改革者（都属于沿海）在某个时期都并非偶然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本章谈到的8位沿海改革者中，有6人在少年时期曾进教会学校读过书，有2位在壮年时期与传教士一起工作过，至少有5位在一生的某个时期诚心诚意地信仰基督教。对于这些人来说，基督教是他们整个文化移入经历中的重要方面。它帮助他们摆脱旧文化的束缚。虽然看起来基督教并没有激发他们的具体改革主张，但显然却对促使他们走上早期改良主义路线起了作用。[注]

几乎和忽视了基督教对中国早期改革的影响一样，基督教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孙中山1884年在香港接受洗礼是人所共知的。但香港兴中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即世纪之交广州香港地区的早期革命者的核心人物，也多是基督教徒，这就并非人人知晓了。如果列举其

中的部分名单，则包括：陆皓东，孙中山少年时代的朋友；郑士良，孙中山在医学院时的同学，还是三合会的成员，他使孙中山注意到秘密社会的革命潜力；陈少白，为孙中山当了六七年的主要助手，中国第一张公开宣传革命的报纸的主编；谢缵泰，来自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人；左斗山，广州一家宗教书店的老板，该书店在1895年成了重要的革命活动点；史坚如，一位士绅革命家；王质甫和区凤墀，两位中国牧师。[注]这些人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曾在教会教育机构就读。其中之一是广州基督教学院（格致书院，后来成为岭南大学）。史扶邻认为它曾经“在早期革命运动中起过关键作用”。[注]根据史扶邻的研究，1895年广州密谋和1900年惠州起义的广州方面领导人主要是基督教徒。而且，基督教徒占了惠州战役总人数的30%。当这一连串事件发生时，如果惶恐不安的中国官员以为他们目睹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活，也是不足为怪的。[注]

改革、起义和革命人物的共同特性显然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和个人地位。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例如，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的现代化计划与沿海改革者的某些主张十分相似。[注]而且，有两位沿海改革者与洪仁玕有私交。容闳1856年在香港与洪仁玕成为朋友；王韬也在两年前于上海结识了洪仁玕。在这些联系中，意味深长是——1859年洪仁玕参加起义军以后，容闳和王韬各自旅行到太平军驻地与起义领袖交谈，并提出了旨在发展太平天国事业的主张。尽管这些提议都化为泡影，但显示出两人都愿意采取非改良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注]

表现得更明显的是，后来沿海改革者很容易跨越改革和革命的界线。这里的主要连接点是孙中山。当然，孙中山有过短暂的改革生涯。在此期间，他曾直接受到医学院的良师何启的影响，也可能受过郑观应、王韬的言论影响。孙中山改革生涯的顶峰是1894年，这时他进行过向李鸿章呈递改革请愿书的不成功尝试（据说曾受到王韬的帮助）。李鸿章当时正忙于更紧迫的事（与日本的战争一触即发）。此后，孙中山成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注]

从这以后，思想转变的潮流也加速了。尚健在的沿海改革者一个接一个地转向或至少是卷入了革命事业中。[注]第一个这么做的是何启，他早在1895年3月就参与筹划兴中会统帅部，秘密帮助他们的革命密

谋。注虽然郑观应在广州密谋中的作用（如果有的话）还不清楚，但他这时也与孙中山的手下有联系。注 1900年至1902年间，容闳显然支持了一系列反政府的起义计划。他被革命者看作事成之后担任政府高官的主要候选人。注当辛亥革命最后胜利时，容闳因年迈而不能接受孙中山发出的参加新政府的邀请。不过，坚决赞成共和主张的马良和伍廷芳却接受了官职。在最后使清帝退位的谈判中，伍廷芳从一开始就作为革命者的主要代表而获得了声望。注

虽然沿海是比内地更好的进行革命的场所，但远非理想的地方。外国官吏和其中国对手一样，极为重视治安。许多革命计划都是被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警察所破坏的。这有助于说明何启参加兴中会的秘密性质，并且也许可以解释郑观应、容闳与革命者联系的隐晦特征。这些人毕竟是沿海中外社会中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地位和名声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沿海在推动改革者向革命者转变方面极为重要。沿海的革命者如孙中山和沿海的改革者如何启、容闳，既象征性地也实际上在互相交流（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广东地区）。他们有共同的社会和地理背景，共同的宗教根源，共同的学习经历，共同的世界观念。归根到底，这些特征使得他们互相之间在社会文化方面比同思想与之对立的任何内地人物都更为接近。

内地的早期改革者

众所周知，在革命运动的最初阶段，社会文化差异使得沿海和内地的革命分隔开来。孙中山最亲密的同志几乎全部来自沿海，尤其是穗港澳地区。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前，他与内地革命者的联系不占重要地位。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早期改革者之中。确实，像郑观应、伍廷芳和唐景星等人都与官僚阶层中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所谓洋务派）有广泛联系，并从中获得了一定的职位。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沿海改革者的较多文化移入使他们得不到充分的敬重。1890年以前，他们很少从内地早期改革者那里得到公开的称赞，即使有过一些酬答也微乎其微。注

主要属于内地的早期改革者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沿海是中国19世纪推动改革之决定因素这一命题？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简略考察4位内地早期改革者的经历便可发现，他们也与沿海有联系，或者与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的西方或日本有联系。

冯桂芬（1809—1874）

重要学者、教师、官方顾问和经世传统的改革者。他生于苏州，1840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多年。他十分钦佩顾炎武（1613—1682），并以这位同乡为楷模。冯桂芬的治学兴趣很广泛，包括各种不同学科，如语言学（他的专长是研究《说文解字》）、数学、行政问题和国外事务。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他帮助组织防守苏州。但是，1860年起义军攻占了苏州，这迫使他和其他许多苏州学者、官吏逃到相对安全的上海。正是在上海，大约于1860年，他写了关于改革的名著《校邠庐抗议》（序言的日期是1861年）。李鸿章的许多大胆尝试都是冯桂芬推动的直接结果，包括1863年在上海设立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校。冯桂芬在60年代中期曾一度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后来（1869年）他从事主编《苏州府志》的工作。注

郭嵩焘（1818—1891）

湖南湘阴人。他在传统训练中深受湖南籍的清初异端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的影响。1847年中进士后，曾于翰林院任职。他在曾国藩手下参与过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实际经验。郭嵩焘担任过多种官职，包括署理广东巡抚（1863—1866）。然后，他于1877年成为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英国）的公使。作为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在工作中密切联系并极度依赖李鸿章。1862年他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短暂任职。虽然两个人在外交事务上的观点接近，但郭嵩焘的改革主张比李鸿章激进得多。李鸿章“不能，也许……不愿在很大程度上为郭嵩焘行使自己的权力”。注郭嵩焘的欧洲之行激起了轩然大波，使得他回国时（1878年末）没有照例去北京，而是直接回到了湖南。他被提前罢职后，继续在湖南以书信方式向李鸿章提出建议。注

薛福成（1838—1894）

另一位中国早期外交使节。他生于江苏无锡，是一位州牧之子。虽然他只是一个秀才，从未在官场中获得高位，却在曾国藩（1865—1872）、李鸿章（1875—1884）幕府中供职多年。他是有关改革和现代化问题上有影响的作者。薛福成关于改革的第一部重要文集《筹洋刍议》于1879年提交给李鸿章。而且，在此之前，他就在外交事务方面小

有名气。据说他1875年的上书对说服清政府同意设立驻外使节方面起过作用。薛福成也在签订1876年的《烟台条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年以后，他被举荐为中国驻德国新公使的参赞（但他拒绝了）。薛福成外交生涯的顶峰是1889年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他在欧洲4年多（1890—1894），此期间的日记给他带来作为改革者的巨大声誉。注

黄遵宪（1848—1905）

以诗人、改革者、外交官而闻名。生于广东省嘉应州的客家人家庭。他20岁刚出头儿（1870年）便游历了香港，对殖民地的市政治理印象很深（如同9年以后的康有为一样）。1875年，他到北方两商埠天津、烟台旅行，增加了对沿海文化的接触。他1876年中举，其后的几年中任中国驻东京使馆的参赞。在日本的6年中（1877—1882），他学过日语（程度怎样尚不清楚），会见了许多日本学者，十分羡慕明治政府在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由总理衙门印行。他的《日本国志》完成于1887年，初版于1890年，成为19世纪90年代改革者有关日本的主要信息来源。1898年光绪皇帝亲自阅读过该书。黄遵宪在外交经历中到过旧金山（1882年至1885年，他在这里任总领事）、伦敦（任薛福成公使头一年的使馆参赞）和新加坡（1891年至1894年任总领事）。1894年回到中国后，他担任了许多省级职务，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虽然他的改革生涯由于1898年9月的政变而缩短了。但他那富有创新风格和爱国激情的诗歌，继续激励着20世纪的中国人。注

内地早期改革者的主张与沿海改革者提出的主张在总体上惊人地相似，虽然程度不同，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和黄遵宪都表现了对西方的虚心态度。他们或明确地或含蓄地把西方当作中国仿效的模式。而且，他们对西方的尊重远远超出了“船坚炮利”。即使是4位中年纪最长的冯桂芬，虽然认为中国实际上只可在科技领域向西方学习，却也认识到西方在用人、开发地利（经济上）和君民不隔（政治上）的优长。注

郭嵩焘、薛福成和黄遵宪走得更远些。郭嵩焘在伦敦发现西方军事优势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后，便开始尖锐批评中国自强运动的狭隘军事目的。他特别赞美英国的经济政策、铁路发展、议会政治和法律。他感

触最深的是，西方制度能在政治与人民之间孕育一种共鸣和信任的关系。[注]薛福成同样对西方的制度组织印象深刻。他除了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之外，还极力主张对中国的主要制度进行变革。[注]黄遵宪在90年代成为梁启超的亲密朋友和思想导师。他也主张制度改变，或许在接受变革的程度上比郭嵩焘和薛福成都更为大胆。[注]

像沿海改革者一样，随着内地早期改革者普遍接受了变革，他们也明显地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这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冯桂芬认为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开辟以来最大的耻辱”，向同胞力陈要以此为耻，把这看作中国自强的心理前提。[注]郭嵩焘通过强调西方历史的自主和西方文明的伟大，并将其与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相比较，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注]薛福成关注更具体的问题，早在1879年他就主张中国应设法修改条约，从而取消治外法权、提高进口关税。薛福成关注国力的经济基础不亚于郭嵩焘。他痛惜中国财富流往欧洲，并主张在外贸中更多地发挥中国商人的积极作用以为补救。[注]黄遵宪的早期民族主义表现在他的诗歌和他对日本德川末期、明治初期英雄人物的生动叙述中。这些人为改革而唤起日本人民的坚定行动被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改革者所自觉仿效。[注]

指出内地和沿海改革者之改革方案的贴近（至少在他们表现出的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方面）[注]，那还有什么理由把这组人物划归“内地”之列呢？一个因素是，虽然内地改革者的经历并非完全没有新意（3人担任过早期外交官），但在其经历中创新的范围比沿海改革者要狭窄得多。除了冯桂芬这个个别例外，他们都是职业官员。他们是在官任上开始注意西方并与西方发生关系的。相反，那些沿海改革者只是在他们经历了相当的文化移入过程，并在其他职业中引人注目以后才进入官场的。与此相关还可以补充的是，内地改革者都是得过功名的，4人中有3位在秀才以上。而沿海改革者中却没有1人超过秀才，而且只有1人（王韬）考取过秀才。

也许还有更为不同之处。早期内地改革者似乎无人通晓西方语言，而且无人进过外国学校或大学，受雇于外国人（相反，郭嵩焘倒聘用过外国人，马格里曾为他工作），他们也无人信仰外国宗教。简言之，内地改革者虽然接受了沿海的思想意识和明显影响，但他们绝不是这种特殊文化环境的产物。他们是观察而非参与这种环境。湖南士绅对郭嵩焘的攻击正是在于——郭嵩焘是士绅中的一员。如果郭嵩焘是容闳或者何

启，也就没有人注意他了。

沿海与中国19世纪的变革

然而，内地早期改革者的经历似乎说明：在19世纪的中国，以某种形式接触沿海文化，是为广泛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因素。这种接触不一定要采取在沿海实际居住的形式（虽然碰巧冯桂芬居住过）。可采取的方式还有旅行（黄遵宪70年代前期游历香港、天津和烟台）、卷入受西方影响的太平天国活动地区（薛福成、冯桂芬都被起义军从江苏老家赶了出来，郭嵩焘参加镇压起义军的战争）、密切联系大量从事洋务活动的官员（如李鸿章、曾国藩）、在西方侵入的主要地区任职（郭嵩焘60年代中期在广州）、早年生活经历过或接近过这些地区（冯桂芬、薛福成在江苏，黄遵宪在广东），如此等等。

我强调内地改革者可以借各种机会与沿海联系，并不意味着轻视实际居住国外对黄遵宪、郭嵩焘、薛福成等人改革思想和观点产生的影响。然而，我仍坚信这些人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最初“震动”是在中国出现的，而不是在他们出国以后。确实，可以认为，他们比较成功地适应了这种震动，正是他们被率先派往国外的主要原因。

这里出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什么1860年至1890年间只有极少数内地中国人对西方侵入的刺激做出富有创造力和勇气的反应，而绝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回答这一问题时，考虑以下几点是有帮助的：第一，在沿海也只有极少部分中国人主动赞成现代化和改革（虽然在比例上是比内地大得多的少数，但无论如何，它只是代表了沿海极少数有条件在经历中被动接受新知识的人）。第二，某些中国人在西方有直接的生活经历（例如刘锡鸿[注]），但他们不是转向倡导改革，而是事实上变得比以往更固守内地偏见。所有这些都说明，在19世纪的中国，不管沿海对促进变革是多么必要，但并不充分。沿海的压力（和引力）是在一系列文化的（中国的）和超文化的（人类的）因素所构成的背景中产生作用的，正是这整个背景最终决定了——谁将接受变革，谁不接受变革。

虽然总的命题无可置疑，但当我们寻根究底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最简捷地说，问题就在于解释——为什么在接受同样一种刺激

的人们中间，有些做出了这种反应，而另一些则做出了别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在早期改革者中（包括沿海和内地的），一开始就可指出两种人的基本区别。一种人是从小就生活在沿海的，他们是自身控制之外的环境产物。另一种人是后来才与沿海发生联系的（从经历上来说），其深层的文化移入较少，他们是自觉选择的结果（至少部分如此）。我主要不涉及前一组人物（他们包括就读于教会学校的6位沿海改革者），因为论述他们将很少能解释接受变革的原因，而更偏重于解释他们何以成为杰出的改革者。我相信大多数进入教会学校的中国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赞同变革。

根据这里提出的问题，第二组人物（由王韬、郑观应和4位内地改革者组成）成为主要的关注点。这些人都在内地的环境中长大，都在年轻时接受了正统儒家文化训练。然而，与成千上万的其他中国士子不同，他们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禁锢，牢固地束缚在狭隘的中国传统上。相反，在西方文化影响的刺激下，在西方造成的政治、经济挑战（真实的或想象的）面前，他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再估价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偶然因素（比如在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时间）总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但这根本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人有特定的行为方式。我们必须把大量的因素考虑进去，尤其是在反对改革的压力很强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改革行为时。H. G. 巴尼特（H．G．Barnet）在他的不朽著作《革新：文化变革的基础》中认为，要理解某个人对新事物的反应，就必须考察三种可变因素：新事物或观念的内在本质（新事物的特征和价值），倡导者的说服力（提倡的力量），单个反应者的生活情况（经历的决定因素）。在分析最后一个可变因素时，他认为——在任何文化条件下，四类人最可能接受改革：反对者、淡漠者、不满者、怨恨者。注

虽然巴尼特上述分析中含有三个可变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产生作用的意思，但其重心却大不相同。无疑，在上述中国改革者的第二组人物（那些成年后才开始与沿海发生重要联系的人）中间，“经历的决定因素”具有首位的重要性。认为出生最早从而最使人感兴趣的冯桂芬、郭嵩焘疏远了儒家文化显然是错误的。不过，两人都明显受到了儒家文化内部的异端思想影响，这使得他们对现状不满。关于冯桂芬，虽然芮玛丽在许多方面把他看作是复兴儒学的真正体现，但近来更多的学术论著却

把他描述为——不但最迟在1860—1861年其富强思想已成为被接受的价值，而且还是激进的地方制度变革的倡议者（这里他实行了其哲学导师王夫之的主张）。[注]我们知道，郭嵩焘在其早年训练中强烈地认同于王夫之（王夫之是前近代中国少数几位阐述任何问题都很近似进步理论的思想家）。有人认为，王夫之的哲学可能决定了郭嵩焘接受变革。[注]

在这些特殊情况中，对改革的最初首肯似乎受到了本土哲学的影响，但给它刺激的也许还有个人经历中的失意（如王韬没有考取举人）、个性特质，或其他一些因素。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存在一些因种种原因而不满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相信改良社会的可能性。他们在受西方影响之前就具有改革倾向，因而他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态势中，一旦西方的挑战成为事实，他们就能灵活地评价挑战，把它看作部分是机会而不完全是灾难。

冯桂芬和郭嵩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长期被看作对“西方冲击”的“早期回应者”。但直到现在学者们才开始寻找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是他们？即使对该问题最初讨论（无疑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全部尝试）都会发现——19世纪开始逐渐与西方文明接触的中国文化绝不是没有生气的。它充满着紧张、矛盾和各种问题，完全可能从它自身内部产生变革的冲力。这并不是说沿海对于冯桂芬、郭嵩焘这种人不是至关重要的。但重要性的本质却需要重新认识。就他们而言，沿海没有产生变革的冲力，毋宁说，沿海产生了新的问题，并把旧问题塞入了新的认识框架之中，提供了根本不同的解决（新、旧）问题的思想和技术宝库。这样，沿海改变了固有的变革冲力赖以操作的背景。

对于那些出生较晚或经受广泛文化移入的早期改革者来说，沿海的作用更为重要。其中6位——马氏兄弟、何启、容闳、伍廷芳和唐景星——赞成变革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许多具体改革目标都直接来源于西方的榜样和启示。剩下的4位中至少有3位于内地生涯陷入绝境之际，在沿海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机会。[注]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随着沿海促进变革的影响不断增长，内地的作用也转变了。它作为变革来源的色彩逐渐暗淡了（虽然从未消失），在整个变革的过程中，它主要日益发挥了使变革合法化的作用。[注]康有为通过今文经学使源于西方的变革得到承认，这也许是这种现象中最引

人注目的事例。而具有意味的是，内地文化的真正产物最终几乎完全支配了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改革活动。改革也最终得到承认，唯一的问题是已经为时太晚。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尝试改革，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

1. 革命运动的初期（1895—1911）则不完全是这样。虽然最著名的代言人是孙中山，虽然他的资金和许多思想来源于沿海，但很多早期革命者（例如黄兴）都是中国内地的产物。见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斯坦福，1961年）；冉玫烁《顽强的传统：浙江的革命运动研究》，见芮玛丽，《中国的革命》，第319—361页。

2. 勃朗给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充分展示了学校发展时的课程情况。勃朗在许多报告中详述了课内外劝导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工作。例如第3、4、7、8年度报告，见《中国文库》第10卷第10号（1841年10月）；第11卷第10号（1842年10月）；第14卷第10号（1845年10月）；第15卷第12号（1846年12月）。

3. 两名同学黄胜和黄宽可以看作是第二流的近代化人物。他们发挥了重要的先驱作用，但并未在19世纪的中国获得真正的声望。两人都是基督徒，后来与伦敦会联系密切。1848年黄胜因身体不佳回到中国。他学习了印刷技术，因而主持伦敦会在香港的出版机构约20年（他以这种身份负责出版理雅各译的《中国经典》）。据说，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他帮助王韬购置印刷设备，创办《循环日报》（最初王韬和他合作撰写一部有关近代武器的书）。黄胜是第一位参加英国陪审团的华人。1874年他回到美国办理中国的教育事宜，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翻译。他的儿子黄咏商是孙中山早年的追随者，参加组建香港兴中会。黄家祖籍广东省香山县，是何启的亲戚。见白瑞华书，第45页；陈学霖，《黄胜：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之先驱》，见《崇基学报》（1964年5月），第226—231页；史扶邻书，第48—49页；王韬，《火器略说》前跋（重印于《弢园文录外编》，卷8，第9—11页）。

黄宽（1829—1878）也生于香山县。完成中学学习后，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西方培训的医生。他得到医学学位后，在伦敦会主持下回到中国（1875年）。其后的20年黄宽在广州行医。大约1860年，李鸿章任命他为医疗顾问，但他厌恶政事，因而6个月后就辞职了。1863年，黄宽被任命为广州海关医务监督，他终身担任此职。他一生的最后12年（1866—1878）在广州医院附设医疗学校讲授医学。这是由英美教会机构嘉约翰医师主办的学校。见王吉民、伍连德著，《中国医史》（第二版），上海，1936年，第371—372、391、395、405页；嘉惠霖，《博济医院百年史，1835—1935》（上海，1935年），第52、116—117、121—123、127、164、175—176页；容闳，《西学东渐记》（纽约，1909年），第32—33页；托马斯·E. 拉法格，《中国最早的一百人》（普尔曼，1942年），第21页。

---

1. 容闳的传记，见恒慕义书，第1册，第402—405页。使用容闳的传记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应慎重，因为它有为己服务和不准确的缺陷。关于容闳一生最详细的学术性记述，见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77—134页。着重容闳教育活动的

两种记载是拉法格书和小竹文夫《清代在国外的留学生》，载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1958年），第309—328页。关于容闳在美国的研究，见小埃德蒙·H.沃西，《容闳在美国》，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65年8月），第265—287页。

2. 易劳逸，《中日战争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68年8月），第698页。

3. 有关胡礼垣（约1847—1916）的传记资料很少。他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居住在香港。他接受了中西两方面的教育。他在国内科举中未获成功。后毕业于香港女王书院。胡礼垣是一位富商，何启的密友。曾在王韬的《循环日报》当过一段时间的翻译（1879—1881）。他在甲午战争时期访问过日本。见陆廷昌，《胡翼南先生事略》，载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1920年），第一册；《循环日报60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任继愈，《何启胡礼垣的改良主义思想》，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第75页。

4. 何启的传记资料，见史扶邻书，第20—26页及其他地方；布赖恩·哈里森编，《香港大学的前50年：1911—1961》（香港，1962年），第6、11、35页；阿诺德·赖特编，《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的20世纪印象》（伦敦，1908年），第109页；林达·P. 欣，《伍廷芳在中国转变中的角色（1842—1922）》，博士学位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1970年），第131—134页；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史略》（香港，1937年），附录，第1—2页；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135—178页；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1945年），第7—16页。

有关何启、胡礼垣改革思想的分析，见易劳逸，《中日战争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第695—710页及其他地方；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卷，第795—803页；任继愈：《何启胡礼垣的改良主义思想》，第75—91页；小野川秀美，《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渡边哲弘，《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载《立命馆文学》，1961年第11号，第939—955页。

---

1. 有关唐景星买办生涯的传记资料和详细研究，见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新刊（1961年6月），第143—183页；他参与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情况，见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官办企业》（剑桥，马萨诸塞，1958年），第110—111页；又见埃尔斯沃恩·C. 卡尔森：《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第二版），剑桥，马萨诸塞，1971年，第5—8、31、38页及其他地方；又见肯尼思·福尔瑟姆，《晚清的幕府制度：朋友、上宾和同事》（伯克利，1968年），第144—146页；恒慕义书，第2册，第956页；郝延平书，第196、199页及其他地方。

2. 有关伍廷芳的传记，见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纽约，1967—1971年），第3册，第453—456页。林达·欣的研究更加全面。两人记载不一致的地方，我以林达·欣的为准（例如，包华德认为伍廷芳进了香港不列颠中央书院而不是圣保罗书院）。林达·欣博士1971年6月22日致该书作者的信中指出，她认为伍廷芳甚至可能在去香港圣保罗书院就读之前就接受了洗礼，虽然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尚不充分。又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悉尼，1967年），这里（第234页）把伍廷芳描写为“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3. 郑观应的传记资料，可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第116—117页；郝延平书，第186—187、196—197、201—206页及其他地方；郑观应思想研究，见刘广

京，《郑观应〈易言〉》，第373—425页；王永康，《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第34—40页；周辅成，《郑观应的思想》，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第99—109页；郑观应著作的版本问题，可见市古宙三《论郑观应的〈易言〉》，第107—115页。

4. 有关马建忠的传记资料极为分散。这里的简介是根据下列资料综合而成的：高第，《1860—1900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巴黎，1901—1902年），第2卷，第499—500页；斯佩克特书，第282—283页；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第80—81页；福尔瑟姆书，第139—140页；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上海，1939年）随处可见；李迟（音译）编译《“暂定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及说明、评注》（伯克利，1960年），第173—176页。研究马建忠思想的两位中国共产党学者是：任静吾，《马建忠在适可斋记言里所表现的思想》，载《光明日报》1953年11月14日；任继愈，《马建忠的思想》，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第66—74页。马建忠1878年在法国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有关外交，另一篇关于外交机构）的详细介绍，见坂野正高，《法国留学时的马建忠》，载《国家学会杂志》（1971年8月），84卷，第5—6期，第1—37页。

5. 马良的传记，见包华德书，第2册，第470—473页；张若谷书，也提供了马良一生更多生动的详细情况。尽管事实上到清朝灭亡时，马良已年逾七旬，仍有非常活跃、非常突出的经历值得回顾，但他完全被研究晚清的学者忽视了（例如恒慕义没有提到他）。以下叙述也反映出他整个情况被遗忘的程度。几年前，一位有声望的学者简介了马建忠之兄的近代活动，指出这是一个叫S. P. 马的人。这位学者承认不能提供更完整的身份情况。（马良以他的字“相伯”最为人熟知，这在19世纪的英语材料中大概音译为Siang-Po，即S. P. 。）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第142、284及147页。

6. 《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1—12页。

7. 像大多数概括性论述一样，这里做一些补充是有益的。就19世纪下半期的大部分自强官员而言，其主要的重要性在于（我看来）他们是使变革合法化的人物，但他们自己也参与了某些革新活动。乔纳森·波特在有关曾国藩的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就是自强官员的这些革新活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的，多大程度上是无意的。见《曾国藩的幕僚》（伯克利，1972年），第16—17、129—133页。

8. 虽然似乎王韬会一点儿英语，但没有材料说明他能阅读英文。刘广京认为，郑观应的“英语可能没有达到流畅阅读的程度”。见《郑观应〈易言〉》，第148页。

9. 王韬、伍廷芳、唐景星、何启和容闳在新闻报刊方面的成就已经提到（见第三章）。郑观应可能提出了在某处创办西方报刊的建议。这种建议最初由王韬在1876年左右提出。这个未成功尝试的意图是在中西争端时为中国做舆论宣传。见王韬致唐景星的信，《弢园尺牍》，卷9，第21—22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4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台北，1969，原序年代是1909年），第3册，第1720—1723页。

10. 见本书第七章第169页注释2。

11. 有关郑观应的成熟商业思想，可见《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2册，第677—802页；尤其是他的论文《商战》（第753—766页）。又见郝延平书，第204—205页。至于郑观应的早期经济观点，见刘广京，《郑观应〈易言〉》，第398—410、422—425页。王韬的经济思想已在第七章做了论述。有关何启经济思想的论述，见小野川秀美文，第132—133页；渡边哲弘文，第943—946页。

12. 郝延平书，第194页。

13.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91—196页。

14.　　郝延平书，第205—206页。

15.　　包华德书，第3册，第454页。

16.　　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见马良，《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1947年），第2页。

17.　　见本书第八章；又见林达·欣书，第132页。

18.　　见本书第八章；又见林达·欣书，第133—134页；郝延平书，第203页；郑观应，《议院》，载《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1册，第49—85页。

19.　　引自郝延平书，第205页。

20.　　关于这里所说的出生地，有两个例外必须说明。王韬（1828年）和马良（1840年）出生时上海还不是受西方影响的地区。而且就王韬来说，他19岁第一次到上海之前并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王韬在某些方面是最少文化移入的改革者。

21.　　《上海》，第8页。

22.　　《弢园尺牍》，卷9，第19页。

23.　　林达·欣书，第49—50页。外国人害怕香港华商力量的发展是王韬一篇文章的中心论题，见《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1—3页。1873年以后对华贸易的停滞和商业逐渐转移到华商手中的趋势决不限于香港。

24.　　见米尔顿·E.　　奥斯本，《统治与反应：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柬埔寨（1859—1905）》（伊萨卡，1969年），特别是其第六章。

25.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5—116页；《弢园尺牍》，卷4，第6页；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7—73页。

26.　　沃西，《容闳在美国》，第283—284页。

27.　　林达·欣书，第132—133页。

28.　　福尔瑟姆书，第95—96页；波特书，第123—133页。他们两人都认为幕府制度为异端人才的求职提供了可靠途径。

29.　　布莱克使用了这个词（虽着重点稍有不同），见他的书，第71页。

30.　　《李文忠公致王韬》，见徐珂编，《清稗类钞》，上海，1928年；洪深文，第1034页。

31.　　林达·欣书，第229—230页。

32.　　同上，第120页。

33.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54—161页。

34.　　王韬与李鸿章幕府成员保持经常书信联系的包括其他人中的伍廷芳、马建忠、盛宣怀、唐景星和郑藻如。

35.　　林达·欣书，第229—230页。

36.　　论述李鸿章改革局限的文章，见刘广京，《爱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儒家：李鸿章的思想形成时期（1823—1866）》，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70年）。

37.　　福尔瑟姆书，第146页。

38.　　简又文强调了太平天国基督教的重要性，见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39.　　我较详细地探讨基督教对中国改良主义作用的文章，见《19世纪中国的沿海与内

地：信基督教的改革者》。该文是为1972年1月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举行的传教士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40. 史扶邻书，第16、19、47—48、52、66、89、172—174页。又见"陈少白传"，包华德书，第1册，第229—231页；及史扶邻书，第16、33、89页及其他地方。中国早期革命运动中其他基督教徒的活动，见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载《广东文物》（香港，1941年）。

41. 史扶邻书，第22页。

42. 同上，第89—90、228—229页。

43. 有关洪仁玕，见本书第二章。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洪仁玕最接近于典型的沿海类型。他的西化思想表现在1859年名为《资政新篇》的小册子中，他把该书上奏给了洪秀全。

44. 王韬与洪仁玕的关系已在本书第二章中有所论述。容闳与洪仁玕的关系以及他访问太平天国占领区和对起义军的建议，可见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80—82页；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7—112页。增田涉（见他的书第99—100页）认为，王韬、容闳的两面性行为似乎应置于当时主要的特殊政治环境背景下来考虑。他们两人都认识到西方是当时真正最关键的问题，因而认识到结束国内动荡局面是最紧迫的，而至于谁来收拾这种局面则是次要的。增田涉指出，这样容闳（如王韬一样，只是次序相反）先是向洪仁玕，然后又向曾国藩提出建议。

45. 史扶邻书，第20—38页。

46. 唐景星在1892年、王韬在1897年、马建忠在1900年相继去世。我认为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与新兴的革命运动发生关系尚不能确定。

47. 史扶邻书（第70—82页）说明了何启的作用，也讨论了（第211—212页）他作为革命者的局限性。

48. 同上，第65、67页。

49. 史扶邻书，第221、239、305页；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106—108页。

50. 包华德书，第2册，第472—473页；第3册，第455—456页。

51. 例如，王韬对本章论及的4位内地早期改革者中的3位公开表示了敬意。1880年他出版了（并亲自作序）黄遵宪有关日本的诗歌（见本书第四章第94页注释30），他再版了（并亲自作序）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上海，1897年）。而且，他在《循环日报》上登载了两段赞扬郭嵩焘的简介（重印于《万国公报》第13期，第82—83、92页，1880年10月16日、10月23日）。就我所知，这些改革者都没有公开酬答王韬的致敬之举（虽然1879年黄遵宪和王韬在东京结识并成为朋友）。

郝延平论述了郑观应的类似情况，他提出（见他的书，第221—222页）近代中国人（他以毛泽东为例）不愿把思想上的受惠归功于买办人物。又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剑桥，麻省，1971年），第4页。安德烈·希赫以马良、马建忠为例指出，基督徒在19世纪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产生重要影响。见他的《19世纪晚期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基督徒》（巴黎，1962年），第128页。

1. 关于冯桂芬一生最完整的英文资料是恒慕义书，第1册，第241—243页。对他思想的最新和修正性研究，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第1—8页。

2. 汉密尔顿书，第20页。

3. 恒慕义书，第1册，第438—439页；汉密尔顿书，第1—29页；斯佩克特书，第279—281页。

4. 恒慕义书，第1册，第331—332页；徐中约书，第175—176页；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40—146页；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第142—143页；斯佩克特书，第281—282页。

5. 恒慕义书，第1册，第350—351页。

6.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7—118页；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第127—128页。

7. 汉密尔顿书，第10—11页。

8.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7—118、142—146页；狄百瑞，《中国传统之源》，第714—717页。

9. 查尔顿·M. 刘易斯：《湖南的维新运动（1896—1898）》，载《中国论集》（1961年）；蒲池书，随处可见。集中论述黄遵宪对梁启超影响的文章，见张朋园：《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又见加斯特书，第70—72页。

10. 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第128页；又见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页。

11. 汉密尔顿书，第1、12—14页。

12. 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第142—143页；斯佩克特书，第282页。

13. 理查德·C. 霍华德，《康有为改革纲领中的日本作用》，见罗荣邦编，《康有为的传记和专题论集》（塔克桑，1967年），第285、304—305页。

14. 当然，冯桂芬、薛福成这类人的改革主张有些完全属于国内问题，几乎与西方没有关系。王韬、郑观应也同样如此，但这基本上很少是沿海改革者的特征。

15. 关于刘锡鸿，见徐中约书，第187—188页。

16. H. G. 巴尼特，《革新：文化变革的基础》（纽约，1953年），第378—410页。

17.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30页；又见H. G. 巴尼特，《革新：文化变革的基础》，第73—74页。又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考》一文中随处可见。

18. 汉密尔顿书，第3、24—25页。

19. 我们知道，王韬、郑观应是在科举受挫以后才选择沿海方面的新职业。黄遵宪直到1876年快30岁时仍未考取举人。他对科举提供晋升机会之少已经十分厌倦，因而，他没有去追逐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而开始了外交生涯（见张朋园文，第218页）。

20. 我特指19世纪和20世纪初。已经提到，到20世纪中期，变革的中心又回到了中国内地。